

編 村 漁 王 743.24

117
2

德國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行 印 局 書 華

王漁村編

國際叢書
德國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中華書局印行

序

本書雖題稱爲德國之過去現在與將來，但大體上祇算是一部現代德國政治經濟簡史。

由十九世紀上半期以迄現在，德國經濟形態曾經過幾度變更，相應着，其政治形態亦曾經過幾度變更。在普法戰爭前後，德國封建經濟已逐漸移向資本主義經濟，由是，其專制主義政治，亦緊隨着移向民主主義政治。此後空前的歐洲大戰雖阻害了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却不曾根本改變其本質，故德國在大戰告終時發生的政治革命，亦祇能在歷史法則許可的範圍內，把君主立憲的招牌，掉換爲共和體制；其名義雖經改變，其爲現代民主主義政治形態則一。但延至

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期階段，資本主義對於政治方面的要求，已經不能由此民主政治形態得到滿足，由是，被稱爲獨裁主義的新政治形態產生；德國這種新政治形態，係發端於布魯寧，中經巴本與施萊輒之促進，而完成於希特拉。

以上是幾十年來德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全般輪廓。本書的任務，不過是準據歷史法則與史實，一方面闡述其由過去演化至現在之連續關係，同時並證示其今後之必然推移。

至本書的撰述，係開始於留德期間，迨轉至日本始告完成。在遷流生活中，率爾執筆，知多苟簡乖誤之處，諸祈讀者諒而教之。

一九三五年三月編者誌于東京野馬軒

743.24

117

2



3 0662 8800 6

德國之過去現在與將來目錄

序

第一章 現代德意志國家之形成……………一

一、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德國政治經濟情形……………一

二、普奧戰爭與普法戰爭……………七

三、現代國家之出現……………一二

第二章 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推移……………一六

一、產業之發展……………一六

二、世界殖民政策……………二二

三、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之對立……………三〇

第三章 世界大戰與巴黎和約……………三四

目錄

1

一、帝國主義戰爭之發動者……………三四

二、戰爭與革命……………四一

三、在和平條約下支解的德意志帝國……………四九

第四章 戰後德國的難局……………五五

一、開藩政變前後……………五五

二、惡性膨脹與貨幣經濟解體……………六二

三、賠償問題的糾紛……………七四

第五章 復興之路……………八二

一、通貨安定與道威斯計畫……………八二

二、羅加諾會議……………八九

三、產業合理化政策……………九八

第六章 資本主義第三期中之掙扎……………一〇九

一、楊格計畫與合理化政策之破綻·····	一〇九
二、金融恐慌·····	一一〇
三、由經濟危機到政治危機·····	一一一
第七章 希特拉政權之確立 ·····	一四一
一、獨占資本與希特拉·····	一四一
二、國社黨勢力之膨脹·····	一四九
三、議會政治沒落與統一國家出現·····	一五七
第八章 國社黨綱領之試鍊 ·····	一七二
一、民族主義與反猶太人運動·····	一七二
二、反凡爾賽體系與外交孤立·····	一八〇
三、經濟與勞動的和平·····	一九四
第九章 希 特拉政權與國社黨之分裂 ·····	二〇五

一、暴露	在經濟復興計畫下的諸般兇相	二〇五
二、第二次革命事變	二一五
三、一黨領袖·一國領袖	二二六
第十章	第三帝國之前途	二三二
一、薩爾收回後之外交動向	二三二
二、第二次大戰與第三次革命	二四〇

德國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第一章 現代德意志國家之形成

一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德國政治經濟情形

德意志以現代國家資格出現於歷史舞臺，那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事。所以嚴格意義的現代德意志國家，還祇有數十年的歷史。在現代西歐諸國中，德國較法國發展為遲，較英國發展更遲。這種遲遲發展的原因，歷史學家曾提出許多說明，但歸根結蒂，仍不外政治之組織或形態，乃受決定於其經濟的客觀的環境。特社會的政治構造，雖然是以全般的經濟構造為基礎，但我們在肯定這個前提原則之下，同時還得承認前者對於後者的重大作用與影響。德國不能提前完成其現代國家形態，那固然是因其資本主義的遲遲發展，但一



究其資本主義之所以遲遲發展的原因，則又由於其阻害生產力發展之封建社會關係的牢固存在。

原來德國舊帝國時代之封建制度，是由第十世紀至十三世紀當中完成的。封建制度一經形成，在此種制度下之莊園經濟，乃迅速發達，由是導來中世都市經濟之勃興。當時德國全領域的商業，皆表現興旺氣象，就中尤以西南部及北部商業為最活躍。在北海及波羅的海一帶之德國北部地方，儼然成為歐洲北部之商業中心。這些地方的德國商人，曾組成許多稱為「漢撒」(Hans)的貿易組合(Kaufhergilde)。此後在成立此種貿易組合的諸都市之間，又結成攻守同盟的「漢撒同盟」(Hansabund)。「漢撒同盟」曾在各地設立商館，壟斷北歐一帶貿易，從而蓄積有大量商業資本。而在西南部繁榮起來的商業，且還積極促進了產業——特別是紡織業及鑛業——的資本化。當時的情勢，彷彿德國應當可以由商業資本形態，過渡到產業資本形態。不過，德國這時的商業資本，還祇是孕育於封建生產關係的母胎中，而尚未發展到足以破毀其胎盤而脫出的程度。十五世紀末

期前後的地理上之大發現，以及十六世紀初期的農民革命戰爭的失敗，那對於德國正在欣欣向榮的商業手工業，曾給予致命的打擊。中世歐洲之商業中心舞臺，大體在地中海、北海及波羅的海沿岸一帶，東西印度之航路發現後，此商業中心舞臺驟轉移至大西洋方面；由是北海及波羅的海一帶之德國北部商業，和地中海沿岸之意大利商業，乃頗形衰退；而同時介居德國北部與意大利間之德國西南部貿易，亦慘臨同一衰落的命運。加之農民革命戰爭之失敗，一般農民大眾所受之壓迫與榨取，更使商業手工業在國內市場上間接受到打擊。商業不況，手工業自無從發展。商工業由這兩方面所遭逢的阻害，封建領主們在某些方面，雖然亦會感到多少的不便與不利，但整個的封建制度，却無疑由其反對勢力——商業資本與革命的農民運動——的削減，而相對增大了不少持續的底力。因此，世界航路之開闢，在英法諸國雖為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大關鍵，而在德國則竟成爲阻礙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降及十七世紀上半期中，德國又不幸爲三十年戰爭（由一六一八年到一六四八年）中的主角。照德國有名歷史學家加爾·倫卜列希特（Karl Lamprecht）

所說，這次戰亂所喪失的人命，約計有一千二百餘萬；德國非經過兩百年的歲月，殆不易恢復其慘遭破壞的物質文化水準。然而在這空前大破壞的戰亂中，德國的封建勢力，不但因此摧毀，却反賴以苟延了。

至十九世紀之初，法國拿破崙（Bonaparte Napoleon）席捲全歐，德意志帝國治下之諸領邦，紛紛脫離此有名無實之帝國，另組萊因同盟（Rheinbund）。由是德意志帝國根本消滅。迨拿破崙於一八一四年慘敗，此依附拿破崙之萊因同盟瓦解，所有德國領土內之三十四君主國及四自由市，乃在維也納組織德意志聯盟（Deutscher Bund）。在此聯盟中，各參加盟邦都保有完全的主權，其中央機關，不過是在佛蘭克福特（Frankfurt）所開之聯盟議會（Bundestag）。此聯盟之盟主，雖為大德意志主義（即主張全德意志諸邦的團結）之老大的奧地利，而其有力的實際活動者，則為抱小德意志主義（即主張奧大利以外的德意志諸邦的團結）之新進的普魯士。普魯士於一八一八年實施新關稅，規定領土內一切內地關稅完全廢止，同時並對國外輸入之原料免稅。這種稅制的改革，其商

工業乃受到一大鼓勵。普魯士商工業的發展，結局必然要引起其他各盟邦之注意，由是促成各盟邦彼此間相互撤廢關稅的要求。一八三四年德意志北部十八邦所結成的關稅同盟，蓋不外此種要求之必然結果。關稅同盟結成後，所有同盟各邦的經濟，乃頓呈活躍氣象；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新興的工商階級，已漸感到封建政治形態，不能保障其利益，滿足其要求。所以，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的怒火，不旋踵間即蔓延到了維也納與柏林，而形成歷史上有名的三月革命。三月革命與一五二五年的農民戰爭，雖同為德意志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解放運動，但據恩格斯（Engels）所說：「由一五二五年革命得到利益的是普魯呢？各邦的諸侯；由一八四八年革命得到利益的是誰呢？普奧兩大諸侯。」

三月革命在維也納誠然嚇走了歐洲十九世紀上半期中的反動主帥梅特涅（Metternich），但其終局目的，即推翻封建權力，建立立憲君主制目的，無論在維也納、在柏林乃至在德意志其他地方，都沒有完全實現。此次革命失敗的原因，第一是因為德國當時資產階級的勢力，還未發展到足以克服封建勢力的程度；第二是因為在這次革命運動當中，

除了扮演主角的資產階級外，且還包含有一大羣反對政府同時也反對資產階級的都市勞動者。這些勞動者感染有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在羽翼未豐的資產階級看來，封建勢力固當摧毀，無產勞動者的勢力，尤不能不加以阻制；與其在推翻封建統治的運動中，讓無產勞動者擡頭，毋甯贊助封建的權力，同國王來進行妥協。所以在巴黎二月革命失敗的消息傳來不久，德意志領土內的三月革命，亦因資產階級與封建君主的妥協而告終了。

在三月革命以後，德國資產階級的勢力，無疑的有了一大進展，但他們所要求的，尤其是普魯士資產階級所要求的，不僅是各邦分別地成立立憲政體，而且熱望全德意志各邦（除奧大利）完成統一的憲政。一八四八年在佛蘭克福特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其目的原在制定統一憲法，但一八四九年所制定的統一憲法，終莫由使其實現。普魯士在同年與薩克森（Saxony）及漢洛威（Hanover）結成三王同盟，其用意亦無非是想以此同盟為基礎，締結德意志聯邦。但這種企圖，乃至一切其他統一運動，都因老大的奧大利的阻礙，而繼續

歸於失敗了。

二 普奧戰爭與普法戰爭

在德意志聯盟諸邦中，普魯士與兩邦立於正相對立的地位。普魯士代表新興自由主義勢力，而奧大利則代表保守的封建勢力。在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後，奧大利因反動魔王梅特涅之逃遁英國，與國內諸屬領如匈牙利、意大利等地之要求獨立自由，暫時雖有改組內閣，編訂憲法之舉；但自文狄希格納澤（Windichgrätz）將軍得俄羅斯軍隊之助，削平匈牙利之變叛，同時並鎮服意大利之獨立運動以後，其反動保守政策，更變本加厲；新內閣希登澤柏格（Shwarzenberg）之頑固保守，較之梅特涅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普魯士方面，則因一八三四年之成立關稅同盟，一八三五年之開始修築鐵路敷設電線，乃至一八四八年之變革政治組織，其經濟政治上之新興銳進氣象，與奧大利恰為相反的對照。惟其如此，奧大利希望維持現狀，而普魯士則希望改革現狀。

特普奧兩邦勢不兩立的焦點，與其說是在牠們進取與保守的傾向不同，却毋甯說是在牠們對於其他德意志諸邦所取的籠絡方策不同。奧大利所抱的是大德意志主義，牠期望一切德意志的聯邦，都各別維持獨立，而共同擁戴牠爲盟主。牠始終抱定此種方策的最大原因，蓋不外其領土內人種過於複雜，如由維也納以西至瑞士及巴斐利亞（Bavaria）爲德國人所居住之地，南部卡尼奧拉（Carniola）、斯體利亞（Syria）、卡林西阿（Carinthia）諸省，類多斯拉夫人；其北部爲波蘭人與捷克人（Czech），此外還有意大利人，以及匈牙利領土內的雜多種族。奧大利領域內既有如此複雜的民族，要想由民族的立場，把全德意志諸邦統一起來，絕無希望。所以牠對於這些小邦的要求，祇是在形式上不脫離牠的羈絆。但普魯士的政策不同；普魯士知道就國力講，就民族觀點講，都以不把奧大利包含在德意志國內爲有利。因此，牠主張小德意志主義。在此種主義之下，牠對於其他諸小邦的要求，就不是貌合神離的羈縻，而是名實相符的統一。因爲統一之實不舉，新興工商業的發展，仍存有極大的障礙。但普魯士的這種小德意志主義的實現，却正是奧大利之大德意志主義的消

滅——這是普奧勢不兩立的癥結。

普魯士有關稅同盟作武器，對於一大部分德意志盟邦，雖然便於聯絡操縱，但其實質統一或在統一組織下，消滅各邦之獨立的政策，頗為各小邦所不欲；加之普魯士在經濟上雖佔優勢，奧大利在當時的政治勢力，仍為普魯士所望塵莫及。各小邦不滿意普之政策，而又畏奧之威，故其向背實非常瞭然。

但普魯士知道問題的關鍵，不在各小邦的態度，而在奧國所保有的政治優越勢力。故打倒奧國，實為完成德意志統一的初步。由組織關稅同盟之一八三四年，至威廉第一即位的一八五八年，其間計歷四分之一世紀。在此時期中，普魯士的國力，已漸形充實膨脹。威廉第一之得以實行整軍經武，蓋不外當時普魯士之經濟實力，已足供應其龐大的軍備。迨一八六二年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出任宰相，解散反對擴張軍備之議院，高唱鐵血政策，於是以武力摧毀奧大利的策畫，乃迅速完成。奧大利斯時執迷不悟，竟在一八六四年二月，協助普魯士擊敗丹麥；丹麥既敗，普魯士因無後顧之憂，乃對奧開釁，於一八六六年

七月，大敗奧軍於沙多瓦（Sadowa）。

當普奧宣布開戰之始，德意志諸邦除麥克倫堡（Mecklenburg）及北部諸小邦外，莫不助奧以攻普魯士。迨戰爭結束，所有梅因河（The Main）以北諸邦，悉併入普魯士版圖。但梅因河以南諸邦，則仍保持原狀。由此可知普奧戰爭結果，德意志統一大業已完成一大部分。

普奧兩國戰爭，大體上是德意志諸邦之內訌。當時想站在傍邊趁火打劫的，是奧大利統治下的意大利人，而想坐收漁人之利的，則是法皇拿破崙第三。拿破崙第三一向標榜自由主義，在梅特涅主政的當時，對於奧大利早沒有好感。但普魯士之勃興，於法國亦頗不利。普奧兩國既發生戰爭，拿破崙第三自然認為交綏者兩敗俱傷，法國將拱手坐大。但出乎意外的，是戰事繼續不到兩月，在奧國方面雖大喪元氣，而普魯士則是所向披靡；其聲威與實力，頓形增大。由是拿破崙第三於失望之餘，隱然對普魯士已懷抱有對敵與戒備之意。同時普魯士在發動普奧戰爭之前，亦經安排對法作復仇戰爭的準備。況且普奧戰爭結局所造

成的北德意志聯邦局面，在普魯士是認爲頗不滿意的。南德意志諸邦毗連法國，一向對普魯士統一運動，表示冷淡。普魯士要用武力強併這南部諸邦，勢將不免促使其歸附法國。因此，如謂北部德意志統一的障礙爲奧國；南部德意志統一的障礙就爲法國。普魯士既掃除丁前一障礙，當然接着要掃除後一障礙。這是普法兩國在戰爭發動以前的一般情勢。

至普奧戰爭結束後四年的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終於因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而爆發了。拿破崙第三舉措失當，及其軍隊統率非人，致一敗再敗；而在拿破崙第三期望或爲己助的南德意志諸邦，至是反參加北德聯軍，而形成奧大利以外的聖德意志對法國的作戰。結果拿破崙第三被俘，巴黎幾被攻破。

普魯士既戰敗法國，其統一運動乃告成功。南部德國諸邦如巴斐利亞、如惠爾敦柏格（Württemberg）、如巴頓（Baden）相率加入北部德國聯邦之中。經各邦協商結果，北部德國聯邦易名爲德意志帝國。威廉第一乃被擁戴爲德意志皇帝。

三 現代國家之出現

德意志統一大業告成，當為近代政治史上一大關鍵。但吾人所當注意的，與其說是此種歷史事件之政治影響，毋寧說是牠的經濟意義。德意志從前是有過帝國的。此新德意志帝國與舊德意志帝國根本不同之點，就在前者為適應時代要求而產生的國家，顯言之，即為適應新興資本主義要求而產生的國家。而舊德意志帝國，則係與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相適應。故同為帝國，其本質與機構判然各別。

德國自一八三四年之關稅同盟結成後，北部德意志諸邦由各別繁重關稅所桎梏的經濟，已得到一大解放與躍進機會。但當時阻礙經濟發展的，並不僅只關稅一端；紊亂的貨幣制度，乃至各種封建的規制與義務，均為新興工商業難堪的障礙。至個人私有財產之沒有法律保障，尤為資產階級致命的打擊。資產階級知道擺在眼前的許多阻礙，祇有全德意志統一，及在此統一局面下，樹立他們親自參加的民主政體，始有撤除的希望。因此，他們對

於政府統一運動的大業，曾盡過不少的力量；統一大業告成，他們所期望的民主政體，也跟着實現了。

德意志帝國之政治組織，係根據一八六六年普奧戰後所制定的北部德意志聯邦憲法；因此聯邦憲法制定時，原已期望南部諸邦之加入。所以四年後全德意志統一帝國成立，其憲法上無所變更，其唯一之變更，不過以普魯士王威廉第一改稱為德意志皇帝罷了。照憲法規定，德意志帝國之統治權，理論上，不在皇帝，而在聯邦議會（Bundesrat），此聯邦議會係以二十二邦君主及自由市之代表組成。其議員乃政府之代表，而非人民之代表；表決議案，一照君主之意旨。全議會中之表決票數為六十一，就中普魯士王有十七票，再加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三票，共二十票。巴斐利亞王六票，薩克森王及惠爾敦柏格王各四票，其餘諸小邦類為一票。聯邦會議表決票數如此分配，故普魯士得在議會中處於左右全局之地位。皇帝對於帝國國會所議決之議案，雖無直接否認之權，然因有他種權力，故形同專制君主。帝國總理及海陸軍官由皇帝任免；帝國海陸軍由皇帝統率，由皇帝調遣。

皇帝有如此大的權力，無怪美大總統威爾遜對德宣戰時，力斥德國政府為「自由仇敵」的「專制政府」。像這種政府，當然非德國新興資產階級所殷殷期待的政府。

但帝國組織中，究還有一民主的政治機關，此即所謂帝國下議院（Reichstag）是下議院議員共四百人，各邦所選之數，以人口多寡為標準。凡年踰二十五歲之德國人，均有選舉下議院議員之權。議員任期為五年。然皇帝得聯邦議會同意時，得隨時解散下議院；且帝國總理，由皇帝於聯邦議會普魯士代表中選任，皇帝並可不過問下議院政黨之消長，而任意免除總理之職。總理僅對皇帝個人負責，聯邦議會之主席及聯邦官吏，通由總理任命。由此可知下議院在帝國政治機構中的作用實甚薄弱。然憲法使商工資產階級心滿意足之點，即凡關於商業，關於各邦間及與外國之交際，國幣，度量衡，銀行，鐵道，郵電諸業，均由帝國國會規定。此外，並得議定全國之刑民法律等等。

因此，帝國成立不久，國會即行使憲法所賦予之權力，於一八七三年議決國幣統一案；又於一八七七年議決關於法院之組織，民事刑事訴訟之程序，破產處置及註冊專利之規

定等議案。所有這些議案，均爲商工資階級切望實施的案件，即均爲剷除其業務障礙，並保障其利益，促進其利益的案件。所以帝國憲法賦予皇帝過大之權力，雖爲他們渴望實現之民主政體的美中不足之點，但他們在國會中既得到了這些權利，亦算是相當滿足了他們的要求。無怪德國經歷過多次磨折頓挫，以致蹣跚不前的資本主義經濟，直至統一大業告成，帝國憲政確立，方纔開始一大飛躍的發展。

第二章 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推移

一 產業之發展

產業革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德國產業革命之發軔期，約在關稅同盟結成的一八三四年前後，而其急進期，則在普法戰爭結束的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〇年間。普法戰爭結局所給予德國產業發展的助力，實異常鉅大。煤鐵區域亞爾薩斯·洛林之佔有，五十萬佛郎賠款之獲得，已大有造於德國產業之振興。至德意志帝國由此統一，由此確定其保護產業憲法，並由此得到產業所不可缺少的和平機會，皆於德國產業資本主義之成育發展，成就了非常的貢獻。所以，無論工業、農業、商業，乃至任何其他方面的事業，都是到了一八七一年以後，才表現飛躍的進展。

從工業方面之纖維工業說起罷。紡織業之發展情況，可從此種事業上所消費的棉花

量，予以說明。由一八四六到一八五〇年，其棉花消費量爲一六、〇〇〇噸；由一八六六至一八七〇年爲六八、〇〇〇噸；由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則竟增加至一一六、〇〇〇噸。纖維工業在德國工業上所佔的地位，本不甚重要，我們且看其重工業的發展情形吧。普魯士蒸汽機關使用數，在一八四〇年爲六三四，其馬力爲一二、二七三；但至一八七五年，其使用數爲三五、六八四，其馬力爲二、五一九、五一九。至與蒸汽機關使用數相關聯的炭礦鐵礦的產額，亦同樣表示了一八七一年以後的突躍增加的趨勢。其數字如次表。

年 度	石 炭 產 額(噸)	鐵 礦 產 額(噸)
一八五〇年		八三八、四〇〇
一八六〇年	一六、三七〇、五〇〇	一、四〇〇、八〇〇
一八七〇年	三四、〇〇三、〇〇〇	三、八三九、二〇〇
一八八〇年	五九、一一八、〇〇〇	、二三八、七〇〇

至於製鐵業的情況，可由生鐵產額而徵知。把盧森堡包含在內，其產額在一八六〇年

爲五二九、二〇〇噸，在一八七〇年爲一、三九一、一〇〇噸，在一八八〇年爲二、七二九、〇〇〇噸。在二十年中，將近增加五倍。

工業迅速發展，當然要引起農業的繁昌。農業技術上的進步，就採用人工肥料所需要的加里鹽之產額數字，即可知其梗概。在一八六一年，此種加里鹽之產額爲二、四〇〇噸，在一八七一年爲三七五、三〇〇噸，在一八八〇年爲六六五、九〇〇噸。至其農業機械之採用，在一八八二年，則有如下的數字。計普通打禾機二六八、三六七具，蒸汽打禾機七五、六九〇具，刈除機一六、九三四具，播種機六三、八四二具，蒸汽犁八三六具。農業技術改進，當然要導來農業生產力的增加。所以，以一公頃（Hectare）土地，在以次兩年度之收穫相比，大相懸殊。

年	度	小	麥	裸	麥	大	麥	燕	麥	馬鈴薯
一八七八—一九年		一三·五	一〇·四	一三·六	一二·五	七一·一				
一八九九—一九〇年		一八·九	一四·六	一八·一	一七·二	一二四·五				

生產力增加，其產額自相應增加，而與農業保持有交互關係之牧畜業，亦大體顯示同一趨勢。

工農業發展的結果，在國內乃至對國外的商業，皆極度繁昌。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德國尚是輸出農業國，至七十年代以後，乃一變而為輸出工業國，且因輸入農產品，而形成入超的傾向。此種事實，已充分證明德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了。

就交通事業而論，亦是以一八七〇年代為興隆期的起點。其造船業所投的資本，在一八七〇年以後的增加趨勢如次：

年 度	造船資本額
一八七〇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八八八年	一五、三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八九〇年	三六、一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〇〇年	六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由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的三十年中，造船投下之資本額，竟增加十六、七倍。而其中用以從事汽船製造的資本部分，且對帆船製造的資本部分，在不絕增加。如一八七一年的汽船隻數為一四七，至十年後即一八八一年，其隻數增加至四一四，而同時帆船的隻數則反由四、三七二，減到四、二四六。鐵路的建築，係開始於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五〇年，其全線長度為六、〇〇〇公里，一八六〇年為一一、〇二六公里，一八七〇年為一八、五六〇公里，一八八〇年為三三、八五六公里。

隨着產業及社會其他各種事業之發展，銀行業務亦相應擴張。但德國把銀行鈔票發行權，集中於中央銀行，亦還是一八七五年以「銀行法」改造普魯士銀行為德意志帝國銀行以後的事。國家銀行愈能發揮其機能，民間銀行乃愈能有健全的發展。所以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後半期中，德國金融界實呈現了非常景氣的現象。

總之，在普法戰後的數年或十年之間，德國已為其產業資本主義立下了強固的基礎。然而德國在此產業發展過程中，感到美中不足的，或者隨產業發展而益增大其不安

的，約有以下諸點。第一，人口過剩。——在一八七一年，德國領土內的居民，計爲四一、〇五八、七九二人，至一九〇〇年竟增至五六、三六七、一七八人。人口增加雖爲產業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其必要條件，但在有限的領土上，不絕增加起來，那不能不認爲是一個非常苦惱的問題。第二，製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的缺乏。——此兩者爲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但資本主義愈發展，此兩者又必然要愈感到缺乏。第三，勞動階級的撞頭。——德國剛走上產業資本主義的旅途，世界其他先進國家，如英如法等國之資本主義，已早釀成了種種惡害，從而產生了種種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不幸德國又正是這些危險學說的產源地。所以在其產業資本化的程序一經開始，勞動大眾便迅速感染了種種不能安分守己的思想，而使資產階級感到麻煩。鐵血宰相俾斯麥雖然根據着「貧富必然論」——彼始終認定貧富階級乃必然現象，無可變更，——作出了緩和「鬥爭」的勞動社會政策，但人口過剩與製品過剩問題一旦發生，勞動問題就會鬧到不可終日。

上面三個問題，通爲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要使這三個問題得到最後解決，惟有

推行世界殖民政策。

二 世界殖民政策

德國於一八七九年實施保護產業的新關稅。此新關稅實施，德國製造業即呈現異常的活躍；而蒙受此保護利益之製造業者，因預期其前途發展無限，乃進而要求政府推廣本國製品之銷場。俾斯麥對於經營海外的殖民事業，本來不甚踴躍，爲了應付此等製造業者及商人們之囂嚷，他雖不能不派人往非洲乃至小亞細亞一帶從事探察經略，但他的全部精力，却是集注在他的大陸政策上面。大陸政策包含有全德意志主義 (All-Deutschtum) 與汎德意志主義 (Pan-Germanismus) 兩種意義，據全德意志協會 (All-Deutschbund) 會長哈塞 (Ernst Hasse) 所說，前者是鄉土政策，後者是邊境政策，邊境政策當較鄉土政策推進一步。所以「汎德意志主義」云云，不僅是想把德意志帝國版圖內，多少具有日耳曼種族起源的民族團結一起，同時還是一種純粹的大普魯士主義，不問語言，不問種族，凡屬

認爲於荷亨佐倫 (Hohenzollern) 王家勢力有利的各方面的地域，通予以合併。俾斯麥大陸政策的這一方面的解釋，當然帶有極濃厚的帝國主義性質，但那畢竟是限於大陸的一種歐洲制霸政策，而非側重海上霸業的世界政策。

從積極侵略的帝國主義立場看來，這位老政治家還算是保守的。他的這種保守趨勢，乃由以次諸種原因所形成：(一)在他秉政的時代，德國產業雖在迅速發展，但對製品銷路與原料供給，還未感到急迫要求；而且使資本家社會感到麻煩的勞動問題，亦因實行社會政策而暫時解決；(二)帝國統一局面告成後，俾斯麥的主要任務，一在從事國內的基本建設，一在從事縱橫捭闔的外交折衝；(三)海外殖民地之獲得，雖於帝國之聲威與實力上都有幫助，但可惜世界比較有經濟價值的殖民地帶，都被英法諸國擄掠殆盡；要費大氣力去拾得人家殘下的不毛之地，實利主義十足的俾氏，當然認爲太不合算；而且(四)經營海外殖民，不能不有航行遠洋的汽船，以及保護殖民利益的龐大艦隊；這兩者在俾氏秉政的當時，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所以這也不能不說是他着重大陸政策的一個原因。

然而在俾氏推行其大陸政策的當中，德國乃至其四周的環境，却在不斷的改變。至新皇威廉第二（William II）踐祚的一八八八年，德國產業已頗有所成就，其膨脹的金融資本，亦已在非洲在小亞細亞各方面找尋出路，而同時英法等國之帝國主義政策的積極推行，更使後進德意志的金融資本與產業，在各方面受到局限。依此諸般實際事勢的推移，俾氏在新皇即位的當年二月，雖曾為擴張軍備，募集二千八百萬馬克之新公債而作大規模的演說，而進行帝國主義政策的準備。但他的政治主張，仍不能脫却老套的大陸政策。

新皇威廉第二是銳進而果斷的。老政治家的專斷行爲，固爲彼所不悅，其陳舊的政治主張，亦非彼所能接受，所以在新皇踐祚僅及兩載的一八九〇年，俾斯麥即由政界隱退。俾氏隱退後，德國大海軍論者及殖民論者更氣餒萬丈，他們都認定德國的興隆命運，不繫於陸上的霸業，而繫於海上的霸業，在這種認識下，一面積極擴大充實海陸軍備，一面則向世界各地從事殖民活動。但在德國開始從事殖民活動的時候，世界可供榨取的殖民地帶，都差不多分割殆盡。於是德國的殖民政策，就祇有三個途徑可循：第一是拾獲其他帝國主義

者視為無甚經濟價值的不毛地帶；第二是用經商或煽動土人或賄買土人的毒辣方法，在其他帝國主義者殖民地內作分離或露骨的搶奪活動；第三是在其他帝國主義者相互發生爭執，或在牠們與其勢力圈內弱小民族發生糾紛的領域，乘機而入，伺隙而動。德國在開始其殖民活動時，比較是採行第一個途徑，以後則完全採行第二第三兩個途徑。至其全般活動的地域及其所收效果，可分述如次：

(一) 非洲及南洋方面之殖民地的獲得 一八八四年德國納西德哥爾 (Gustav Nachtigal) 博士在非洲北岸發現塔果蘭 (Togoland) 及喀麥隆 (Kamerun) 兩地，經其活動結果，此兩地土酋皆願受德國保護。在同一年度，德國 柏列門 (Bremen) 商人于利茲 (Lüderitz) 樹德國旗幟於非洲西岸之安格那·培魁納 (Angro Pequena)，此後經商人及政府之經營擴充，總稱為德屬西南非洲。與前兩地合計不下五六十萬方英里，特土地雖廣，究無甚經濟價值。且土人好勇鬥狠，德國在一九〇五年與一九〇六年平定土人叛亂所用經費，計達一千八百萬馬克，而此諸殖民地進出口貨之合計價值，則不過四百餘萬，兩

相比較，實得不償失。在南洋方面之凱撒·威廉島及俾斯麥羣島，係於一八八五年獲得；次年，又佔領索羅門羣島及馬爾夏羣島。所有這些島嶼，均不適於白種人居住，且物產甚稀。至一八九九年德國利用美西戰爭之機會，又在南洋方面領有東西卡羅林羣島、馬利亞羣島、柏里羣島及薩摩亞羣島。

(二) 膠州灣的佔領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利用本國兩傳教士在山東被中國人殺害的機會，立派巡洋艦四艘佔領膠州灣，由是取得九十九年的租借權。膠州灣不但可為其東洋艦隊的根據地，且為對於中國經濟侵略之立脚地。此種有極大軍事商業價值之殖民地，既為海軍所獲得，大海軍論者益振振有辭；故在強奪膠州灣以後十日（即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數年間不能解決的海軍擴張案，即在國會通過。

(三) 在小亞細亞及波斯灣方面的侵略活動 德國想在波斯灣頭之米索不達米亞從事殖民活動，由來已久，但要向波斯灣方面進出，勢不能不結託土耳其帝國。土耳其自一八八三年以來，即藉助於德國軍官，改編其軍隊。在一八九七年希土戰爭中，土軍大勝；由

是土耳其對於德國已抱有莫大的好感。加之，土耳其皇帝亞多爾·哈密德 (Adul Hamid) 素有統一世界回教徒之遠大企圖；因忌英俄兩國之干涉與壓迫，急欲結託一強國，爲其支援，德皇威廉第二知機不可失，乃於一八九八年十月率皇后及宰相以下的文武百官，躬訪土都，在達馬斯、卡斯途次，且寄發土皇一電，謂「願陛下及以陛下爲教主之全。世界回回教徒，永遠信賴我之友誼。」禮重而言甘，當然使土皇心悅誠服，所以在翌年六月，德國安拿特利亞鐵道公司，即由土耳其政府獲得敷設報格達鐵道之特許權。此後，德皇復利用土皇短少資金的弱點，誘之以利，更結託土國青年派，盡量掃除英俄等國在土耳其的特殊權利，而同時德國則由土國政府獲得商業上交通上乃至其他種種利益。

(四) 摩洛哥的窺伺與侵奪 摩洛哥之氣候溫和，地質膏腴，鑛脈豐富，其廣袤則優於德國本土。加之人口稀薄，待開闢的土地，非常遼闊。從經濟價值上講，固爲一極好殖民地。況其地與直布羅陀相對，而形成地中海之西門，在交通上，特別在軍事上，具有無上的價值。此種地方若爲德國所佔有，不但可以解決國內經濟上許多問題，且可以制英國海上霸業。

的致命。但可惜這樣一座寶庫與砲壘，早經成爲法國北部非洲大領土的一部分；且法國還與英國成立有協定，約定前者允許後者在埃及的自由行動權，後者則承認前者在摩洛哥的自由行動權。然德國不顧這種協定，德皇威廉第二乘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之俄國失利機會，即法國不能由俄國取得幫助之機會，竟赴摩洛哥之但吉發表保護摩洛哥之獨立與主權的宣言。由是德法衝突，而有阿爾澤西那斯會議（The Meeting of Algiers），於一九〇九年二月成立德法協定：由法國尊重摩洛哥之保全獨立，並不阻害德國商工業在摩洛哥的利益，而同時德國則承認法國在摩洛哥之政治利益。這個會議，因在國際監視下進行，故結果於德國原來目的無所成就，但德國工商業既得在摩洛哥無所阻礙的進行，德國商人就可在政府的教唆與指派之下，煽動摩洛哥人叛變。一九一一年法國由阿爾吉利亞（Algeria）派遣軍隊平定叛亂，德國人大嘩，於是派出砲艦，寄淀於摩洛哥之阿格吉爾（Agadir）。卒因英國反對態度的強硬，以及德國當時金融上之暴露缺陷，致促成妥協解決，從此摩洛哥之管理權，全屬法國，而德國則取得法屬剛果（Congo）之一部分。

(五) 在波斯、印度及埃及方面的煽動。波斯向在英俄兩國勢力之下；其國內反對英俄侵略之黨人，因缺乏活動資金，漸漸上了德國「誘之以利」的圈套。後來英俄爲阻止德國勢力之侵入，乃一變其從來相互角逐態度，而相互提攜；把波斯北部劃爲俄國勢力範圍，南部劃爲英國勢力範圍，其中間則置於兩國監督之下，作爲波斯人之自治地帶。此種協定作成後，波斯人異常憤激，德國乃乘機予以援助，於是有一九〇九年之革命運動。波斯新王國出現後，德國在波斯之勢力，乃大大進展。同時，在印度及埃及方面，亦到處有德國陰謀活動之暗影。德國在這一帶所用的煽動手段，一是金錢，一是自許爲回教徒的友邦。然因英國頗具有統治殖民地的經驗與手段，德國似乎在這些地方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德國在上述各方面的殖民政策活動，大體（除第一項外）都是威廉第二踐祚與俾斯麥去職以後的事。所以威廉第二與俾斯麥之交替，是德國由大陸政策渡到世界政策的一大關鍵。但此種政策的轉變，實際並非基於個人之意向，而是因爲在個人意向後面，隱伏有社會經濟的實際要求。

三 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之對立

德國的世界政策，與大陸政策，雖是建立在不同的經濟要求上，但前者究不過是後者的延展與擴大，在世界政策裏，仍利用大陸政策所建築的政治外交的基礎。即如威廉第二藉以稱霸世界的三國同盟，不還是俾斯麥賴以制霸歐洲大陸的三國同盟麼？

三國同盟係於一八八二年五月結成。在普奧戰爭中，普軍本可長驅直搗奧京維也納，在維也納飽掠一個痛快。但俾斯麥知道此後還有利用奧國的地方，所以按兵不進，以緩和奧國對普的惡感。普法戰後，由普魯士擴大統一之德意志帝國，勢力日形膨脹。而同時奧國則因領內複雜人種問題，常起糾紛，致此老大帝國，漸有分崩離析之感。德國俾斯麥既有意以同一日耳曼民族關係，拉攏奧國，奧國自然樂得捐棄前嫌，結託一強大與國，以壯其對內對外的聲威。適意大利因法國佔領突尼斯（Tunis）問題，有求於德奧，德國遂利用此機會，結成歷史上有名的三國同盟。照此次同盟條約的規定：法國如侵略意大利，意大利可以

得到德奧的援助；法國如攻擊德國，德國可以得到意大利的應援；但當奧匈帝國受到俄羅
斯侵略時，意大利只要保持好意的中立就行。此外，德奧兩國則相互另有所協定。故三國同
盟之中，自始就含有利害不盡一致的差別關係。

一八八七年二月，三國同盟續訂，此次德國允許意大利種種利益，就中尤以援助意大
利取得土耳其之特利波里（Tripoli）一項，最關重要。此後德國與土耳其之反目，即由於此。
第三次三國同盟，續訂於一八九一年五月，第四次三國同盟，續訂於一九〇二年六月，第五
次三國同盟，續訂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一直繼續到大戰的發生。三國同盟在第三次以後，
其形式雖無大變改，但此三國相互的地位，則在不絕發生變動。德奧兩國之關係，日趨緊密，
而意大利對德奧關係則日漸疏離。意之加入三國同盟，其主要動機在懼怕法國侵略。自法
意關於北非問題相互諒解後，意大利對於同盟已漸發生離心作用，所以歐洲大戰爆發，意
國即藉口維持中立。

但三國同盟之各關係國的意志無論如何分離，德國由三國同盟之助，而完成其在歐

洲之霸業，則係事實。三國同盟於一八八二年結成後，首先受到威脅之法國，對俄更表示好感。助俄國改造陸軍，助俄國推銷公債，而與俄國在一八八九年結成俄法同盟。俄法同盟成立之動機，雖在對抗三國同盟，但法俄兩國，究非三國同盟之敵手。適會德國勢力侵入非洲，促成英法兩國對埃及及摩洛哥問題相互諒解，而結成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約。英法協約結成後，英俄兩國過去在遠東近東方面所結之舊怨，大可藉法國從中斡旋而得到緩和。俄國既在一九〇四——五年之日俄戰爭中爲日所敗，其在遠東之南下政策斷念，結果，又重復回頭來經營近東，但這時近東方面的對頭不是英國，而是德國。德國在巴爾幹半島、土耳其乃至波斯的露骨侵略與煽動，卒使英俄兩國相互諒解，而於一九〇七年結成英俄協約。英俄之協約結成，於是英法俄三國遂形成三國協約的局面。英法俄三國在世界無論那方面的利益，都是不易調和的。但其共同強敵——德國的強橫態度與優越勢力，却使牠們不能不暫時苟合起來。

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之對立局面形成，勢必要導來以次四種結果：第一，這種尖銳的

對立，一定會增加兩組國家間之惡感，並使牠相互發生更多的猜忌；第二，在此種對立局面下，每個國家都知道戰爭無可避免，而更加速從事軍事的準備。結局，軍備競爭，又成爲一促成戰爭爆發的原因；而且，大家既逆知戰爭絕難避免，在軍備已經優先準備好了的國家，或在不能勝軍費重大負擔的國家，就會覺得戰爭愈快爆發愈好；而且第三，對三國同盟處於劣勢的俄法同盟，一經把世界海上霸者英國拉在一夥，牠們就覺得勢均力敵了，此後牠們與德國或與三國同盟之任何國家發生糾紛，遂沒有示弱或讓步之必要，由是，戰爭必然爆發的彈性，就大大減少了；最後第四，相互對立的國數增多，且其陣線又明確決定，牠們中間的糾紛問題與牽涉範圍，乃愈多愈大，而愈非逼向總解決的絕路不可。

這是戰前的陣勢。

第二章 世界大戰與巴黎和約

一 帝國主義戰爭之發動者

各方面準備已成的世界大戰，最後是在巴爾幹半島爆發的。巴爾幹半島原先有一大部分是受土耳其帝國的統治。在一八五四——六年的克里米亞（Crimea）戰爭後，孱弱的土耳其帝國，乃完全在英法俄諸國相互對立的均勢下偷生。但半島中人種之複雜，回教徒對被統治的耶教徒所加之暴行，以及土耳其統治之失策，致半島中屢屢發生反抗政府之暴動。一八七六年塞爾維亞與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因俄國之慫恿，竟對土耳其發生反抗。當時英國雖竭力想維持土耳其之統治，但俄國不顧一切，斷然對土耳其宣戰。一八七八年俄軍所向披靡，土耳其迫而與俄訂立聖·斯特發洛（San Stefano）和約，承認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與羅馬尼亞之完全獨立，對於保加利亞，亦許其獨立，但得入貢土耳其。

其當時英奧兩國因此條約訂立結果，勢將使俄國在巴爾幹半島之勢力大增，於是共同強迫俄國將全部事件提交柏林會議討論。柏林會議對原和約修改之要點，就是把波斯尼亞（Bosnia）與赫塞哥維那（Herzegovina）兩地劃歸奧國管理。此即以後世界大戰之引線。

俄國戰勝土耳其以後，儼然以巴爾幹半島之保護者自居。其羽翼下之塞爾維亞則頗思聯合門的內哥羅及由柏林會議劃歸奧大利管理的兩地，以建立一大南斯拉夫國，因此兩地人民原屬斯拉夫人。但奧國自取得此兩地之管理權後，竭力經營。至一九〇八年，更乘土耳其國內青年派之立憲革命，實行宣布合併。奧國斷然將此兩地合併，塞爾維亞不獨大南斯拉夫之計畫不成，且其入海之希望斷絕；從此塞國的出產，勢不能不經過敵國以達於多腦河。又當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發生戰爭時，塞國領土之南向擴張，幾可經阿爾巴尼亞（Albania）以達亞德里亞海。奧大利又力主建立阿爾巴尼亞予以阻梗。奧國所以屢次阻撓塞爾維亞，蓋因塞爾維亞勢力之擴張，即俄國勢力之擴張。俄國如統治巴爾幹半島，德國須通過此半島之大報格達鐵道計畫，即無由實現。所以在塞奧交

惡的暗中，隱伏有德國東進政策與俄國南下政策之衝突。但俄國當奧國合併前述兩地時（一九〇八年），恰在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五年）敗北以後，牠既無力援助塞國，塞國自不能不隱忍以待時機了。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大利皇子斐迪南（Francis Ferdinand）大公偕妻出游波斯尼亞，在薩拉耶福（Sarajevo）城中遇刺。波斯尼亞即為奧國由土耳其強割兩地之一。其地之斯拉夫人，甚仇視奧國，故事先塞爾維亞政府，曾勸大公勿游該地，以免為人所暗算。大公既被刺死，奧政府遂根據此種勸告，以為塞爾維亞政府實有暗助此種陰謀之嫌，故應負責任。七月二十三日，奧大利致最後通牒於塞爾維亞，要求塞爾維亞禁止一切反奧宣傳，罷免反奧之文武官吏，並且奧國得派法官參預審判罪人之事。此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塞爾維亞迫而承認全部條件，惟最後一項，只允提交海牙和平法庭裁判。當時英法俄之外交家，均主張將奧塞之困難問題，提諸海牙法院解決，惟德國獨持異議，以為奧國應予塞爾維亞以懲創。七月二十八日奧大利對塞宣戰。俄國遂下動員之令。德國於八月一日對

俄宣戰，同時並通牒法國，請其於十八小時內表明態度。法國政府之答覆甚爲模稜，故德國於八月三日向法宣戰。此後英國亦因德國軍隊侵入中立國比利時加入戰爭。日本則因與英國在一九〇二年結有英日同盟，故繼續參戰。另一方面，土耳其則於十一月與德奧聯合。惟意大利以德奧兩國非被攻而爲攻人，故認爲無援助其同盟國之義務，嚴守中立。

大戰既已發生，德國內閣總理柏茲曼·荷維格（Pehman Holweg）在下院聲言，此次戰爭之一切損失，應由英國負責。其意以爲英政府果能勸俄國不干預奧塞之爭，則歐戰可以倖免。當時倫敦太晤士報曾對德總理此言，評論如次：「假使英政府果如德人之言，向俄聲明，則英政府無異宣言英國將援助德奧以反對俄國。誠如德人所言，所有交戰之強國，均須負責……假如法國不援助俄國，法國可以阻止戰爭之發生；假使俄國不關心塞爾維亞之存亡，俄國可以阻止戰爭之發生；假使德國不願援助奧大利，德國可以阻止戰爭之發生；假使奧大利不致通牒於塞爾維亞，戰爭亦不會發生。」要之，參戰之國，均當負戰爭之責任。

特戰爭責任的推諉，係法理問題。我們所當究明的，不是法理，而是事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必然的動向。換言之，即世界大戰為十九世紀末期以來之世界帝國主義政策之必然結果。開始參加大戰的主角是英法俄德，而主角中之主角，則是英德兩國。英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祖宗，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牠以這兩重資格所決定的對歐外交政策，就是均勢主義政策。即使歐西諸國的勢力，維持均衡。設有某一國逐漸膨脹起來，由制霸歐洲，進而危及英國的海上霸權，英國就一定要設法把這個國打倒。滑鐵盧戰爭中的法國，克里米亞戰爭中的俄國，都是在英國均勢主義政策下倒斃的。

在十九世紀末期發展起來的德國，其勢銳不可當。其經濟基礎，遠非過去法俄所期望。其項背。德國構成獨占資本主義骨骼的鋼鐵生產，在一九〇〇年中，已足與英國相埒。至一九一二年，竟超過英國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世界汽船噸數，至一九一三年，僅次於英國而佔世界的次位。德國不僅要成就「世界工廠」的理想，且要成就牠「將來在海上」的理想。加之，吸收有全國貯金一大部分的德意志六大銀行（如德意志銀行，帝國銀行，拆現銀行

等)一方面結託國內大資本企業團，支配政黨，支配國家的一切對外活動，同時更結託其他國家，特別是其同盟諸國之資本企業團與銀行，到處獲取投資機會，到處搶奪殖民市場。但牠們的猛烈活動，隨在都會碰着大英帝國的阻礙，在非洲，在小亞細亞，在波斯，乃至在遠東方面的中國，大英帝國都像安排了天羅地網，使這個千變萬化的毛躁的行者——德國，橫受束縛，而不得不作衝破此天羅地網的非非之想，所以在戰爭將要發生與已經發生以後，德國一般輿論都切齒痛罵英國。英國湯瑪斯·斯密斯(Thomas A. F. Smith)博士在一九一五年曾出版一部德國怎樣想(What Germany Thinks)——一名德國人所見的戰爭(The War as German See It)——其中有一章題名為「憎惡之文學」(The Literature of Hate)他在這章開頭列舉着德國數十種論著的標題，如「英國之罪惡」(England's Guilt)，如「海盜之邦英國」(England as Sea-pirate State)，如「歐洲的吸血鬼英國」(England, The Vampire of Europe)，如「打倒英國」(Down with England)，如「上帝懲罰英國」(God punish England)等等，接着他很冷靜的得出了

以次的中肯的結論，他說：「憎惡本身是一種缺陷的表白，在某種限度且是一種失敗的供認。一國或一個人的憎惡，可以解作是要求除去或破壞一種已經證明無法除去或不能破壞的障礙物的結果……在英國與德國的命運之間，已經安置有一塊決定其命運的磐石，那就是英國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英國海軍的優越。德國早以為這塊磐石阻止了，甚且危及了牠在世界上之正當的歷史的發展。牠會努力用可驚的力量、毅力、犧牲精神與英雄主義，來克服破壞其前途的障礙……」

英國人這種見解，德國人自己亦是承認的。「打倒英國」之著者法洛伊斯海軍上將（Admiral Valois）說：「不管我們的敵人怎樣宣揚，我們德國人全體上下，永遠相信英國是戰爭的唯一發動者……我們深信英國是我們致命的仇敵……無論什麼事體，我們都不妨放在一邊，只求達到一個目的：「打倒英國！」……」

就戰爭發生的表面現象說，塞爾維亞與俄國算是發動者，但德國人不責備牠們，也不注意法國，而肯定「英國是戰爭的唯一發動者。」這原因，就因為只有英國才是德國「前

途的障礙，『致命的仇敵』和阻礙其『歷史發展』的『磐石』。

要之，英德兩國是世界大戰的最後指導者發動者，就是英國人德國人自己亦承認。不過在英國是既成勢力，故自始即取守勢；德國是新興勢力，故自始即取攻勢。因其所處地位之不同，世人遂不期然而把戰爭的責任歸諸德國。而戰爭的最後結果，更足以加強這種信念。

二 戰爭與革命

但世界大戰的發動，德國雖然不能辭咎。而在德國，又當由誰負責呢？德國人民好勇尚武，但此種武勇精神，又由誰灌注促成呢？美大總統威爾遜（Wilson）曾宣言此種破壞力量，並非德國之人民，乃管理德國人民之兇暴主人。

事實正是如此。所以，兇暴主人力能控制人民時，人民不能不迫而從事戰爭，一旦此種控制力由戰爭失利而削弱，人民就要起來革命了。革命往往與戰爭相連。世界大戰告終，德

國荷亨佐倫王家的命運也隨之告終。

四年的空前大戰，大約可以分爲三個時期：自戰爭發動至一九一五年終爲第一期；自一九一六年初至美國參戰（一九一七年四月）爲第二期；自美國參戰以後至戰爭終結爲第三期。在第一期中，德國佔據法國東北部，迫近巴黎，征服比利時，在其國境東部，且驅逐俄軍於波蘭首都華沙（Warsaw）以外，更進而佔有俄國之柯爾蘭（Courland）、立佛尼亞（Livonia）、愛多尼亞（Ehonia）。同時其土耳其聯合軍又擊敗攻入君士但丁堡之英法聯軍，使英國政府自認此舉之失策。德國此時之軍威甚盛，其海軍雖被英國艦隊封鎖於漢堡、柏列門諸港及波羅的海海口以內，但其海底潛艇猶四出活動，不時擊沉英國之商船與戰艦。故德國軍國主義者斯時尙沉醉於征服世界之狂夢中，而不斷以德國之光明前途昭示其人民。迨戰爭進入第二期中，德國及其同盟諸國雖佔有塞爾維亞及羅馬尼亞諸國領土，然一九一六年二月凡爾登（Verdun）之役，同年七月至十一月之索謨（The Somme）之役，英法兩國之堅強抵禦力，使德國之精銳大受挫損。德國軍國主義者至是始恍然於征

服世界迷夢之不易實現，所以美總統威爾遜之和平提議，德國首先贊成。但協約國方面，因德國幾次頑強突擊，雖不得手，但仍佔有法、比、波、塞、羅諸國之廣大領土，遂與其商議和約，協約國方面必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由是拒絕和議，戰爭仍復繼續。

在戰爭開始時，美總統威爾遜本極力主張嚴守中立，不轉入戰事漩渦。但自德軍在法國及比利時領內之大破壞，暴行消息傳入美國，美國輿論已頗有改變。此後德國實行潛艇政策，危及美國對外貿易，更使美國人對德懷抱惡感。然激起美國實行參加戰爭之主要動機，却仍是人道觀念以外的實際利益。德國之電氣工業、石油業、海運業之迅速發展，在英國從事此諸般企業的大資本團銀行團，固然是直接感到威脅，但美國的同類企業公司，亦早受到了德國競爭的莫大影響。歐戰發生，美國電氣公司、美孚煤油公司等等，雖樂得坐收漁人之利，通過政府，主張嚴守中立。可是德國在各方面傳來的捷報，却不能不使他們另作打算，因為德國果真把英法征服了，他們不但收不到漁人之利，他們已有的利益，說不定要為德國惡魔所侵佔。在這種打算之下，由他們支配的報紙、刊物，立即製造出了「為正義人道

而戰」的濃厚空氣，呼吸在此種空氣中的人道主義者威爾遜總統，遂感應頗靈的在國會提出對德宣戰的議案，此議案在上下院得到大多數議員之擁護，於是在十幾個月之內，美國就有兩百萬戰士陸續運往歐洲，像異教徒樣的德國的運命，遂由這些新十字軍提早結束了。許多國際政治論者頗惋惜德國不應採用潛艇政策開罪美國，並以爲美國若不參戰，德國也許不致一敗塗地。但這都是似是而非的觀察。其實，德國即不開罪美國，美國亦會自告奮勇；美國即不參加戰爭，德國亦不免於慘敗。因爲單以後者而論，我們是不能只注意前方的戰情，而不參酌其後方的一般實況的。

戰爭推演到美國參加以後的第三期，德國不僅在軍事方面感到力竭氣餒，其多年積蓄的物資與軍需，已消耗殆盡。英國艦隊的封鎖，與其東西南三面之發生戰爭，致德國完全不能由外面取得供給。在戰爭發動的次年，政府已因食品的缺乏，實行食品比率分配制，翌年又實行食券制。而此憑券始能取得的食物，又祇限於粗惡的麵包與馬鈴薯、雞蛋、牛奶、牛油一類物品，已經不能在市場發現。至一九一七年，食鹽告罄，藥品斷絕。依德國科學家的努

力，雖然發明了不少的代用品，但那些關於食品方面的代用品，祇可充飢，不適營養，而且每個國民的食料，又減少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在這種半餓之下，益以過度的勞作，以致德國街頭上不容易發現精神飽滿面色赭紅的人。就在生活比較安逸優裕的大學教授一流人物，其體重皆一般減落，由六十磅到八十磅的減落記錄，極其平常。而在一般普通的人民，由此戰事所受到的磨折，當尤可想見。據正確統計所載，德國前後因封鎖而招致死亡的人口，竟有七十六萬三千人之多。而在開戰的第三年中，戰死者為二九四、七三四人，餓死者為二五九、六七〇人。餓死者幾與戰死者相等。

至食物以外的銅、煤、橡皮、蘇打等，殆無不感到極度的缺乏。肥料的匱竭，勞動者的短少，致耕地大減，農產物大減，進一步增加人民的困厄。所以，戰爭延到第四個年頭，德國國內已經造成了一大破局將要臨頭的嚴重局面。然而視「戰爭為人類防腐劑」的德國軍國主義者，却仍期望藉一個勝仗來挽回大局。

美國參戰的前一月（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發生革命，協約國之一的俄國發生革

命，顯然使德國在東北戰線上去了一個大敵。但俄國革命的影響，却很迅速的傳播到德國來，予德國以致命的打擊。一九一七年六月，德國普林佐·魯伊特波爾特軍艦上發生之斷食同盟，馬上以暴動的姿態，波及於腓特烈大王艦；畢洛軍艦中百四十名水兵，亦不服休養日的限制，離開軍艦。騷擾擴大，怠業流行。至九月二日，普林佐·魯伊特波爾特軍艦之四十九名機關兵，因觀劇特權撤廢而離艦。翌日，復有其他軍艦之四百名機關兵，組成隊伍，脫艦上陸。此外，威斯脫甫里亞艦的水兵，萊因蘭德艦的水兵，均不服從命令，自由活動。

這種騷擾事件，竟發生於有鋼鐵般紀律的德國軍隊中，這不能不使德國軍事當局，特別是自信為「天與神授」之威廉第二皇帝，感到異常狼狽。結局，雖然用「軍人名譽」與「愛國大義」的懷柔的手段，暫時把這場風波平定下去，但「不安分」的種子，却已撒播好了，只等待威烈的嚴寒過去，即發揚滋長起來。

德國革命信號之所以發端於海軍方面，主要是因為德國艦隊都被封鎖在自國港灣裏面，海軍人員比較都有相當知識，閒逸無聊的生活，使他們相互間增加了密切的感情，從

而彼此毫無忌憚的閒話政治，閒話國內一般人民的慘狀，閒話俄國那邊傳來的革命消息，並由是議論到當前戰爭的意義。就這樣，他們醞釀起不穩的行動了。

在陸軍方面的情形比較不同。延至一九一七年終，德國因東北部對俄戰事鬆懈，乃集中全力於西部，冀以一戰挽回頹局。總攻擊於翌年二月廿一日開始。德國全國人士都在緊張與焦急中，等候前方的捷報，然而在英法聯軍及美國新銳軍隊的頑強抵抗之下，德國不但所圖不遂，且從此形勢逆轉，對於七月以後聯軍的反攻，簡直感到抵擋不住了。當時德國已沒有預備兵可調，遂致動員十七歲的孩子兵上前線作戰。這些孩子兵恐怖戰爭，不耐戰爭的勞苦，相率逃亡。逃兵在前線及後方都引起極大的不好影響。延及九月，奧匈相繼向聯合軍請求休戰。至是德國全軍動搖，魯敦道夫（Ludendorff）大將且有「軍隊今日雖可支持，明日如何，却難擔保」的聲明。

在此種緊迫形勢下，以前在軍國主義壓制下的潛勢力，漸漸昂起頭來。波羅的海諸軍港的海軍，重又唱起黑花臉，他們因反抗命令的水兵被捕，大開會議，且進而與陸軍及勞動

者結隊遊行。他們的要求，不單是釋放被捕的水兵，且提出了荷亨佐倫王家退位以及普選制採行等十四個條件。這種醞釀，不旋踵間即擴大到了全國，全國各帝都發生罷工和暴動的騷擾。以前擁護政府爲「祖國而戰」的社會民主黨，這時遂到處宣傳，說戰爭是由軍國主義者獨裁者所促成，非驅除獨裁的軍國主義者，成立民主政黨政治，不能阻止以後的戰禍。適會以戰爭調解人自居的美總統威爾遜氏，又在德國請求其出任調停的時候，詢問德國是否尙在舊政府的治下。他這種探問，就是暗示德國不推翻舊政府，絕無調停可言。

在此內外夾攻的難局下，桀傲頑強的德皇威廉第二，還以爲可藉軍隊的力量，鎮壓反動，使他做停戰以後的太平皇帝。然而在決定荷亨佐倫王朝命運的五十個高級軍官的御前會議中，視察過柏林情形的格洛奈爾（Gloner）將軍雖大膽作凱撒非退位不可的陳述，奧登堡元帥以下的所有軍官，竟沒有一個表示「勤王」的意見。最後席倫伯格（Schölerberg）爲提起凱撒頹唐沮喪的苦悶，表示軍隊或可爲皇帝效忠，此不可一世的皇帝，乃像得到救旨，立即改容詢問「兵力是否充分？」但格洛奈爾的回答是：「陛下，軍隊都在士

官指揮下，整隊向故鄉移動，但他們已不受陛下的指揮。德皇跳躍起來，怒不可遏，然而他祇能說：「軍隊不是對余發過誓的麼？不忠者啊！」這是「固一世之雄也」的皇帝最後的怒鳴。他離開議場了。十一月十日五時，他乘一輛汽車逃往荷蘭。從此德國政治上沒有皇帝的字樣。德皇常激勵國人，謂「戰爭能創造事物」，但他却從未夢想到戰爭能創造「革命」啊！

三 在和平條約下支解的德意志帝國

德皇遁走荷蘭的消息傳出後，社會民主黨領袖腓特烈·愛柏爾特(Friederich Ebert)氏，乃被推為臨時政府總理，出當休戰講和的大任。

在德皇遁走前二日(十一月八日)，德國政府已因國內革命危機迫切，派代表越戰綫與法國福煦(Foch)大將會晤，並探得休戰條件歸來。此休戰條件規定德國在兩週內，撤退佔據比利時，法國東北部，盧森堡及亞爾薩斯·洛林諸地之軍隊。德國軍隊須退出來。

因河西岸以外。其河西之德國領土，則由協約諸國之軍隊佔領。所有在奧匈、羅馬尼亞、土耳其及俄國境內之德國軍隊，均應立即撤退。此外，德國並應將所有的戰艦、海底潛艇及軍用材料，交給協約諸國。其鐵道亦當交由協約國處置。此等條件之目的，原在使德國無再戰能力；但德國既迫而承認此等苛刻休戰條件之後，協約各國却又進而講求如何可以使德國永難再起的方法。

本來履行了休戰條件的德國，已無再戰能力了；被詛為「兇暴主人」為大戰發動者的威廉第二，已由政界退隱了。「仗義與師」的協約諸國，尤其是美國，對於德國新政府，對於重為戰禍苦折的德國人民，理應有所愛惜。在休戰以後的數月中，德國人民確在這樣期待着。但自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五月，由美大總統威爾遜、英總理路易喬治（Lloyd-George）、法總理克里曼蘇（Clemenceau）『三巨頭』（Big Three）所包辦的巴黎和平會議，却竟是一幕毫不顧惜德國人民的分贓把戲。五月六日的和平條約，於翌日提交德國代表，德國代表雖因條件過苛，屢屢提出抗議，但徒刑已經判定，祇好忍痛於六月二十三日簽字。和約

中關於宰割德國的部分，計有四點：（一）領土割裂，（二）軍備剷除，（三）損害賠償，（四）殖民地瓜分。

關於領土割裂部分，規定德國割亞爾薩斯·洛林於法國，割優本（Eupen）、馬米底（Malmédy）於比利時，割西勒維格（Schlewig）於丹麥，唯後者須徵求當地人民之同意。依路易喬治的主張，上部西勒西亞（Upper Silesia）依國民投票方式，讓渡於波蘭。西普魯士大部分割讓於波蘭，東普魯士亦有一部分依國民投票方式讓給波蘭；從此，在東西普魯士之間，插入一個隔離的大楔。條約並還規定東普魯士對西普魯士雖然保持政治的獨立。但澤爲波羅的海岸的重要港口，條約上規定改爲自由港，此後由國際聯盟指定英國委任管理，構成德國關稅同盟之一單位，在經濟上儼如德國之一屬邦的盧森堡，此後永由關稅同盟分離，並且德國與盧森堡聯絡的鐵道統制權，亦概被剝奪。至德國國內所有的河川，幾乎都變成國際共管性質。

條約上對於德國武裝之解除，實絲毫不留餘地。二千五百門重砲，二千五百門野砲，三

萬挺機關槍，三千具地雷，二千架飛機，通通引渡於聯合諸國（在戰勝國方面，不包含美國，稱協約國；包含美國，則稱聯合國，下做此。）海軍飛行機全部解除，最令英國頭痛的潛水艇，全部引渡。六隻巡洋艦，十隻戰鬥艦，六隻輕巡洋艦，五十隻驅逐艦，則規定在聯合國監視之下，沉於海底，並規定沉於蘇格蘭海底。此點使德國海軍人士驚異不置，然俎上之肉，祇好由其宰割。至德國將來的海軍，以戰艦六隻，巡洋艦六隻，小型艦數隻為限。不得有一隻海底潛艇。其陸軍之軍官與士兵，總數不得過十萬人。海軍官兵不得過一萬五千人。參謀部解散，軍火製造亦加監視限制。

關於大戰中損害賠償的數目，因一時難於確定，先規定德國在短期中賠出二十萬萬馬克之現金與貨物。此外還有以次諸款：(1) 聯合諸國以德國潛艇擊沉其船舶之理由，要求德國引渡七百七十一萬噸之船舶（其中含有五百一十一萬噸之優秀船）並且此後五年間，德國還得提供二十萬噸的新造船舶。此種用意，無非是要降低德國的造船能力，使其不克與聯合諸國，特別是不克與英國競爭。(2) 根據德國侵入法比諸國破壞其產業之理由，

德國人使用中的機械，沒收百分之三十。在此後五年中，德國應向聯合諸國引渡其染料及染料產物百分之二十五。(3)條約對於石炭的要求，每年爲四千三百萬噸。此種數量，竟超過德國每年能夠產出之最高額的十萬噸。法國在此後三年內，每年得向德國要求黑煤油五〇、〇〇〇噸，亞姆尼亞三〇、〇〇〇噸。此外，還要求德國在條約實施當時存在的化學品百分之五十。德國之薩爾煤鑛區，由法國管理。至十五年後，則由投票決定，究返還德國，抑仍由聯合諸國囑託法國繼續管理。

德國本國的領土、軍備、產業既經支解破壞，其殖民領地當然應當瓜分。但這種贖物是不容易分得妥當的。於是憑「人道正義獨占者」的智慧，發明了一種所謂「文明神聖信託」辦法，把德國所有的殖民地，分別委託他們自己代管：德國東部非洲，委託英國管理；德國西南部非洲，委託南非聯邦管理；太平洋中之德國屬地，在赤道以南部分，劃歸新西蘭與澳洲代管，赤道以北部分，劃歸日本代管。至塔果蘭德與喀麥隆兩地，則由英法瓜分。此外，德國在中國山東之一切權利，概移轉於日本，而成爲此後華盛頓會議中爭論問題之一。

德國經過這次支解手術的結果，其歐洲領土喪失百分之十三。炭礦喪失百分之二十。鐵礦喪失百分之七四。五。錫產額喪失百分之六十。人口且分裂去百分之十。食糧產額亦大大減少。

然而，在四年長期戰爭磨折過後，又經過這樣無情宰割的德國人民，並還課加有異常艱重的賠償負擔呢！

第四章 戰後德國的難局

一 開蒲政變前後

戰後德國社會的一般現象，全都軼出常軌，顯示極度不安，而在此極度不安的社會狀態下之政局，尤有飄搖不定，無所適從之概。當時德國政治上相互傾軋的，有三種勢力，一是主張採行蘇俄式之社會主義體制的極左派，以獨立社會黨為代表；一是主張恢復荷亨佐倫王朝之帝制的極右派，軍人方面以魯敦道夫，官僚方面以開蒲（Kapp）一流人物為代表；此外，就是反對蘇維埃制，同時也反對帝制，而主張實行民主議會制度的中間派，此派以多數社會黨為中堅，如中央黨一類比較穩健的派系，皆贊同這一個政治路線。中間派在反對極左主張上，可與極右派合作，在反對極右主張上，可與極左派合作。德皇威廉第二遁走後，一般軍國主義者暫時低下頭來，臨時內閣的六位閣僚，獨立社會黨與多數社會黨各得

其半。此兩黨對於德國以後政體的決定，意見懸殊，由是政府內部發生齟齬而予帝制派以復活的機緣。所謂開蒲政變或開蒲騷動（Kapp-Putsch），就是在這種政情下發生的一種反動的復辟運動。不過，在敘述此種運動之經過及其意義之前，須得把此種運動之反對對象的社會黨（獨立社會黨與多數社會黨）弄個明白。因為德國這個黨派，曾在政治史上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其名稱屢易，離合無常，很不易令人摸着頭腦。

德國最初的勞動黨，係由拉塞爾（Lassall）於一八六三年創立的全德意志勞動者協會（Der 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此會的綱領，單為要求普通選舉，其會員祇限於普魯士及北德意志；同時，在薩克森及南德意志，亦存有以教導勞動者為目的的勞動者組合。此等組合以前本沒有政治目的，迨北部由拉塞爾所領導的「協會」成立，此等組合始開聯合大會，於一八六九年組織社會民主勞動黨（Die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以建設自由人民國家為目的。北部「協會」信奉拉塞爾主義，國民主義，而此南部「社會民主勞動黨」則比較信奉馬克斯主義，帶有濃厚的國際主義色彩。因之，

此兩派間之鬥爭頗烈。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後，資本家階級勢力漸增強固，此兩派漸知無產者政黨內訌之失策，乃於一八七五年哥達（Gotha）大會中，併合為『德意志社會主義勞動黨』（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兩派併合之結果，其對資本家政府之鬥爭勢力，頓形增加。俾斯麥知其勢不可侮，乃藉社會黨人謀刺威廉第二未遂口實，於一八七八年宣布所謂社會主義鎮壓法，使其不能公開活動。一八九〇年，俾斯麥去職，威廉第二撤廢社會主義鎮壓法，於是社會黨為刷新陣容起見，乃改『德意志社會主義勞動黨』為『德意志社會民主黨』（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並把哥達綱領，改為純粹立脚於馬克斯主義的綱領。至一九一二年，社會民主黨在帝國議會中之議員，竟有一一〇名之多。一九一四年七月大戰爆發，全體社會民主黨議員，雖於八月四日之帝國議會中，通過五十萬萬馬克之戰費，但對於此後第三第四次之戰費預算討論，已有人表示不滿。對第五次戰費，竟有二十名社會民主黨議員投票反對。當一九一六年三月之緊急預算票決時，此二十名議員中，復有十七名投票反對。由是愛國主義

的社會民主黨幹部，乃開除彼等之黨籍。彼等遂另組獨立社會民主黨（Die 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簡稱獨立社會黨，而同時因舊社會民主黨人數較多，故相對稱爲多數社會民主黨或多數社會黨。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成立的革命臨時內閣中，此獨立社會黨與多數社會黨之閣員，雖同爲三人，但後者勢力較大，所以對於德國正式政治制度及當時其他重大國策之決定，大體仍是依照多數社會黨的意見。此後之柏林三月騷擾及開蒲政變，均係由此發端。

照獨立社會黨之主張，由勞兵會所支持之新政府，應當澈底打倒舊軍閥及官僚，開始社會主義的統治，根絕一切反革命運動，然後始可召集憲法會議。而多數社會黨則主張從速召集憲法會議，由憲法會議確定新政權後，然後再徐圖社會主義之實施。即前者以社會主義的經濟革命爲第一義，而後者則以民主共和主義的政治革命爲第一義。前者企圖確立單純左翼的權力，而後者則有意與中央黨、民主黨提攜，以反對立即樹立無產階級之革命政府。

結局，獨立社會黨之三名閣員，脫去臨時內閣，而著名的斯巴達團（Spartacists）之領袖——李卜克內西（Liebknecht）與盧森堡（Rosa Luxemburg）復遭毒手，由是多數社會黨之主張勝利。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召開制定憲法之韋瑪國民會議（Weimarer Nationalversammlung），有名之韋瑪憲法，即於同年八月制成。然而在獨立社會黨閣員離去（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後不久，左翼之反政府高潮，即由是激成。一九一九年三月在柏林東部發生的巷戰，同年四月在敏亨樹立的蘇維埃共和政體，同為多數社會黨之主張與措施，不能滿足當時革命大眾要求的結果。全國各地之反政府暴動發生後，多數社會黨為要維繫其政權，乃不能不乞憐於當時還擁有軍力的軍閥：一方面藉軍力以靖難，一方面則藉舊時的軍事長官，以統率其日在醞釀暴動的兵士，就這樣，舊軍閥勢力乃至與舊軍閥勢力相結託之一切反動勢力，遂漸漸昂起頭來，而為此後開蒲政變開一端緒。

開蒲政變頗類似中國之張勳復辟。其中心人物為開蒲（Wolfgang Kapp）。全事變的發動，雖祇五天工夫（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但此次事變却是德國極反

動勢力或帝制系軍國主義勢力之最後一次的反攻。獨立社會黨離去後之多數社會黨之政權，一方面固爲左翼社會主義者所不滿，另一方面亦爲極右傾的反動勢力所不滿。政府雖然可以利用右傾勢力阻制左翼運動的擡頭，但此種政策不但增添了反動勢力的氣餒，且減弱了自身應付反動勢力的力量。一九一九年六月巴黎和約調印後，由協約國苛加懲罰條件所激動的德國愛國主義者，以及須依和約解除武裝之德國軍人，遂益對新政府表示不滿，而醞釀政變。開蒲爲東普魯士邊鄙地方之農業財務署主任，他一向反對共和主義及社會主義。他與魯敦道夫大將互通聲氣，並與前柏林警察總監雅果（Tangoth von Ja-gow）及當時衛戍司令于特維茲（Lüttwitz）相結合，企圖乘機推翻政府。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于特維茲偕同反政府派奧芬（Oven）等共訪愛柏爾特臨時大總統（非根據韋瑪憲法選舉的大總統），要求由國民投票改選議會及大總統，設立專門家之超然內閣，並停止實行解除武裝條約。當時國防大臣洛斯克（Gustav Noske）見此事態嚴重，乃於翌日罷免于特維茲衛戍司令之職。同月十二日，由愛爾哈爾特（Ehrhardt）大尉所率領之反政府

軍隊，忽進迫柏林。政府於倉皇中遷駐脫勒斯登。由是開蒲爲先鋒的叛軍，乃於十三日晨入柏林。奉舊貴族馬克司（Max）公爵爲首相，威廉第二之第二皇子愛特爾·腓特烈（Friedrich）爲大總統，冀與政府方面妥協。迨開蒲因此妥協不成，乃自爲首相，以于特維茲爲軍務大臣，而從事復活帝制的準備。但開蒲自身爲一無能政客，國內除東普魯士若干地域外，又無何等積極之應援。同時政府則與其他左翼社會主義派、中央黨結成一氣，發動全國總罷工，以反對開蒲一派的反動勢力。在此廣大民衆力量威脅下，開蒲不能不遁逃瑞典。全國總罷工於同月二十日宣布停止，舊政府復歸柏林，約定於七月改選議會，改造內閣，普選大總統。自經此次變動以後，德國勞動階級勢力，乃更爲一切反動派所忌憚。致不絕如縷的共和政制，得苟延下來。此後，負責簽認巴黎和約之馬哲斯·尼爾斯卜澤（Mohr Erzberger），雖於一九二一年八月爲反動派所暗殺；政府中堅人物之雷田努博士（Dr. Dathenan），雖亦於次年六月爲反動派所刺死。但自一九一九年三四月之極左革命運動失敗及此次極右傾的開蒲政變結束後，德國政府所最感困難的，與其說是政治問題，却毋

寧說是經濟問題。

二 惡性膨脹與貨幣經濟解體

德國的政治形態，雖由戰爭所導來的革命運動變更了。但那種革命運動，終於沒有動搖德國的經濟組織。即戰後的德國經濟，依舊是資本主義經濟。

特德國資本主義的體制雖無所更改，其實質却與以前迥不相同。四年大戰的摧毀，包含在和平條約中之殖民地的瓜分，煤鐵鑛區域的割讓，交通工具之引渡與限制，許多重要化學工業品之強制奪取，在在皆為德國資本主義之致命打擊。而聯合諸國所課加的苛重賠款負擔，尤足以制其死命。至戰爭結束後之國內政治上之騷擾，比較起來，還算是一個無大關重要的原因。

帶着這許多創痕，同時又帶上這諸般枷鎖的德國經濟，將怎樣走上復興之路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臨時革命政府關於經濟上的重大工作，就是設立一個動員解消

局，使戰時經濟回復到平時經濟。戰時經濟的特徵有二，一是強制的，一是計畫的。這兩個特徵，都有使經濟趨於社會化或社會主義化的功能。不幸標榜社會主義的革命政府，竟在這「解消」工作上，把戰爭的這種可貴的遺產棄擲了，且進而把戰前已經社會化或由國家行使統制的若干重工業或大企業經營，都返還或付與私人企業家。這第一步經濟工作鑄成了大錯，以後當然是順着同一方向進行。即所有關於私人方面的企業，都讓私人自行處理，自行設法恢復原狀。由是，德國由戰爭改變了原形的資本主義經濟，至是又得到一重新確立其基礎的機會。

本來私人企業讓私人自己設法恢復，政府方面是省事多了。但由戰爭破毀的許多小規模企業經營，仍非仰賴政府的助力不可。而政府本身在戰後所需的龐大支出，試一覽其一九二〇年之全年歲出總額及其項目即可明白（表列后）。

德國戰後這種非常的支出，究將怎樣彌縫呢？對於超過歲入以上的額數，通常多半是採行增發公債與增稅的兩種方法。但德國大戰中的戰費，只有百分之六，是求諸賦稅財源，

一九二〇年之歲出總額

(單位一萬萬馬克)

爲履行和平條約的支出	425	
爲舊軍隊解散的支出	41	
從軍者及遺族扶助費	51	
國債利息	117	
爲廉賣食品飼料肥料的支出	111	
新建築促進費	34	
鐵道郵政事業損失補助費	175	
其	他	150
總	計	1,101

其餘則悉由長期短期公債填補。公債的積累，致一九二〇年度（見右表）的國債利息，竟佔其戰後非常歲出總額十分之一強。政府鑒於國債增積過鉅，戰後乃從增加稅收入手。一九一九年七月，開始增加以金爲基礎之關稅。同年九月，對戰時利得課加重稅，並創設高率累進承繼稅。此外對於火柴、骨牌、煙草，通通課以重稅。同年十月更對土地買賣實行新國稅。

至同年年終，又設定一種國家非常時捐款 (Reichsnotopfer) 名目，對資本課稅。一九二〇年三月，復改革稅制，將從來各邦之邦稅所得稅，改爲國稅，同時並創設資本利子稅。延及一九二二年四月，又全般改革現行稅制，並增添不少新稅。此諸般增稅政策實施結果，戰後國家財政上之賦稅收入，雖頗有增加；無奈支出過鉅，致維持預算上之均衡的收入，約有百分之六十（在一九二三年竟有百分之九十）是靠發行短期公債（主要爲財部證券）政府爲填補戰時戰後財政赤字而增發的鉅額短期公債或所謂政府證券，通由國家銀行發行。國家銀行依此種公債或證券爲準備基礎，再發行銀行鈔票。證券增多，此銀行鈔票亦因而增多。

本來，國家銀行如採行公開市場政策，即能使其手中所持的政府證券或財部證券，向其他商業銀行或市場發賣，則發行多少證券，就可吸收多少通貨，這一來，證券增發，並不一定就會成爲助長通貨膨脹的原因。然無奈政府信用掃地，致民間所收受的財部證券額逐漸減少，而國家銀行所保有的額數，反逐漸增加。至一九二三年年終，財部證券的百分之九

九（計一八，九八〇，一四六，八一八，七四〇萬馬克）皆保藏在國家銀行手中。國家銀行有權發行三倍於其準備額之銀行鈔票。由是，以這鉅額財部證券為基準所發行的紙幣，就如狂瀾一樣的氾濫起來。

通貨膨脹之必然結果，即是物價騰貴與對外匯兌低落。物價騰貴，勢必刺激產業，喚起更多的通貨需要；而由匯兌低落招致原料及其他輸入品的騰貴，亦會使原有的通貨量感到不足。此外，政府方面對於物價騰貴與匯兌低落，又必然要由財政膨脹，而促使赤字公債增加，從而加速的增殖通貨。所以通貨膨脹直接造成的結果，同時又會成為通貨膨脹的原因。據一九二三年度德意志帝國統計年鑑所載，德國自一九一四年以來的紙幣增加趨勢，有如下表。

德國紙幣的增殖（單位一萬萬馬克）

年 度	紙 幣 總 額	紙幣增加率（一九一三年為一〇〇）
一九一四	三五·九六	一五二

一九一五	六七・八五	二八六
一九一六	九一・六一	三八七
一九一七	一四三・七三	六〇九
一九一八	二二六・五四	九五六
一九一九	四〇九・二四	一、六七三
一九二〇	六七七・一八	二、八五九
一九二一	九〇四・三二	三、八一七
一九二二	三、五一七・三九	一四、八四八

據右表所示，一九二二年對一九一三年之紙幣增加率，竟達一百四十八倍。然而紙幣增加達於極頂的年度，還是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三年諸月份的國家銀行鈔票流通額，顯出爲以次反常的進度。

一九二三年度之國家銀行鈔票流通額（單位十萬萬馬克）

一月 一、二八〇

二月	一、九八四
三月	三、五一三
四月	四、九五六
五月	六、〇九六
六月	七、五八七
七月	一三、〇九二
八月	四三、五九五
九月	六四三、二〇〇
十月	二八、二二八、八一五
十一月	五二四、三三〇、五五七

僅是國家銀行的鈔票，即膨脹到上表所列舉的程度，無怪該銀行總經理夏哈特（Schäfer）氏說：「一九二三年為國家銀行製造紙幣的印刷所，計有一百三十三處；其印刷機為一千七百八十三臺；至專門為同銀行製作鈔票紙的製紙工廠，則有三十所之多。」為填

補財政赤字而增發紙幣，紙幣因增發而低減貨幣價值，而反過來增大財政赤字，更進而要求增發紙幣。在這種惡性循環上所造出的惡性膨脹，結局乃使德國整個貨幣經濟歸於瓦解。就匯兌率言，美金一元在一九一五年值四·八六馬克，至一九二二年則值一、八八五·七八馬克。降及一九二三年，其變動竟達到次表所顯示的程度。

一九二三年之匯兌率

月份	美金一元等於馬克數
一月	一七、九七二
二月	二七、九一七
三月	二一、一九〇
四月	二四、四五六
五月	四七、六七〇
六月	一〇九、九九六
七月	三三三、四一一

八月	四、六二〇、四五五
九月	九八、八六〇、〇〇〇
十月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十一月	二、一九四、〇〇〇、〇〇〇

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以後，德國紙幣對外幾一文不值，而其對內由物價指數所表示之價值，則如次表：

一九二三年度之物價指數（一九一三年＝一〇〇）

一月	二、七八五
二月	五、五八五
三月	四、八八八
四月	五、二一二
五月	八、一七〇

六月	一九、三八五
七月	七四、七八五
八月	九四四、〇四一
九月	二三九
十月	七、一〇〇
十一月	七二五、七〇〇

（以下以百萬爲單位）

由以上物價指數及對外匯兌率的兩種數字所示，德國貨幣經濟，至一九二三年度，已經完全解體。

在此惡性膨脹或貨幣經濟逐漸解體的過程中，社會各階層間之財富，無異重經一次分配。受害最烈的，爲工資勞動者、自由職業者、官吏、公司職員及其他一切薪金生活者。他們的工資與薪水，雖在隨貨幣價值的跌落而增加，但其收入增加的程度，往往總是落在其支

出增加的程度以下。並且，他們由多年勤勞所得積下的少許貯金或保險金，都化爲烏有了。金融資本家無疑的要因貨幣價值的暴落，而在對產業資本家融通資金的關係上，蒙到莫大的損失。但當時最感困苦的，除都市工資勞動者外，究還是農民大眾。他們賣出的農產物，儘管因中間商人的壟斷與捉弄，祇賣得低廉的價格，但其購入的肥料與生活必需品適用，却不能不付給高價。不但如此，他們對於地主的債務，且還要迫而償付現物。在另一方面，地主自身所負的債務，則可因貨幣價值的低落而激減，而其由地租形式由現物收回債權形式所擁有的食料原料價格，又不斷增加。故在此種場面下，地主實受到了兩重利益。然而當時還有得到三重利益的產業資本家呢。

產業資本家對於金融資本家是債務者，對於勞動階級是僱主。實質債務的減少，實質工資的減少，都是他的利益。此外，生產品價格的騰貴，由匯兌下落所促成的輸出增加，亦都於他有莫大的利益。所以通貨膨脹在一方面使勞動者工資及薪金生活者之薪金實質低落，從而使產業資本家之榨取率強化，使其利潤額增加，資本蓄積額增大；而在另一方面，則

使產業資本家對於金融資本家之支配力強大化，並由是促成中小資本家之沒落。

產業資本家在此惡性膨脹中，雖然獲得非常利益，但德國全般的經濟狀況，却顯然由此蒙到了莫大的損害。據一九二四年度之統計年鑑 (Deutsches Jahrbuch) 所載，大戰後數年中之德國生產指數，乃如次表。

由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之德國生產指數

年 度	石炭及褐炭	鐵 礦	生 鐵	鋼	農產物	礦鐵完成品
一九一三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二〇	113	98	65	64	63	62
一九二一	119	91	81	76	64	78
一九二二	116	92	99	92	71	89
一九二三	64	81	53	52	72	56

右表除石炭及褐炭因聯合諸國強求實物賠償結果，雖在一九二〇年、二一年、二二年

有超過戰前水準的增加，其餘則概行減落。至一九二三年，各種生產指數皆大減特減。一九二三年爲比法聯軍因賠償問題進佔魯爾（參照次節）的年度，同時亦爲德國貨幣經濟完全解體的年度。這兩件大事體緊相關聯。我們不妨說德國貨幣經濟解體，係由比法進佔魯爾所促成；我們尤其可以說，戰後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一大部是由於賠償問題作祟。

三 賠償問題的糾紛

巴黎和約所苛加於德國的諸般懲罰條件，有許多是可以馬上執行的，如領土的割讓，殖民地的瓜分，武裝的解除以及船舶和其他實物之引渡等，皆屬於此類；但同時也有許多條件，不容易切實執行的，如德皇的處罰，軍備的監督限制，以及賠償之決定和履行等等皆是。德國在強敵威壓之下，雖不能不迫而承認這一切苛刻的條件，但對於其中不容易履行的部分，却就難免不提出異議和抗拒，因而發生許多糾紛。然在協約諸國認爲無可讓步，而在德國則認爲無法履行的最關重要的條款，即爲賠償的條款。此種條款不但爲戰後德國

經濟困厄之癥結，同時且爲全世界經濟復興與發展上之一大障礙。

當決定賠償問題時，聯合諸國頗費了一番斟酌。把一切戰費都推歸德國負擔罷，在英法諸協約國固然是利莫大焉，因爲：（一）牠們可以藉此嚴厲懲治德國，以雪其憤；（二）德國在賠償的重壓之下，不會與牠們作商工業上的競爭；（三）牠們有此鉅額賠款，可以恢復並振興其工業商業。然而牠們就令專從本國利益上打算，究也不能不顧慮到對方的支付能力。所以，美國總統就人道主義的立場，主張德國所擔負的賠款，應只限於私人方面的損失，牠們終於勉強承認了。

然則協約各國人民私人方面的損失，究有多少，德國究應賠償多少呢？這個數目是難於馬上概算出來的。由是在簽訂和約當時，各協約國只是決定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以前，德國應向各協約國支送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至於賠款的總額，則留待後來估定。迨此總額已經估定後，這二十萬萬金馬克，得從總額扣出，作爲德國已經清償的部分。此外，和平條約並設定一個賠款委員會（Reparation Commission）。此委員會僅由聯合國的

代表所組成。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以前，委員會應將德國賠款的總額規定。

賠款委員會既單由戰勝諸國代表組成，賠款的數目，當然可以由牠們任意決定。但比較維持幾分公正精神的美國拒絕參加後，賠款委員會的實權，便完全落在英法手上，最後且爲法國一國所操縱。法國是主張嚴懲德國最力的，現在由牠來決定賠款的總額，當於德國極其不利。然而問題的焦點，究還是在德國的支付能力。在總額還未明確規定出來之前，德國對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以前應支付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已經發生了不履行條約的問題哩！

德國對於這宗款項，是用煤、車輛及其他物品，繳納於協約各國。照德國估計，牠已經繳納的物品，至少要值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較其應支額數爲多；而在協約各國估計，則還不足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彼此估價相差過遠，其中又缺乏一種仲裁的規定。延至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賠款委員會乃宣告德國不履行賠款條約。接着，協約國軍隊即奉令占領德國的杜易斯堡（Duisburg）、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和魯洛爾

特 (Ruhrort) 各處，並在萊茵一帶建立起高率關稅，使德國運往協約各國的貨物，非在此等地域上納稅不可。在這種糾紛發生不到兩個月中，賠款委員會即在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把德國應支付的賠款總額宣布出來。

賠款總額較之巴黎和會時為專家所建議的總數多了三倍。其數字是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賠款委員會大發慈悲，對此鉅額賠款，並不要德國一次清償，同時也令其擔負全部利息。其規定是：德國政府應發行三種公債：第一為甲種公債，其總額定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第二為乙種公債，其總額定為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第三為丙種公債，其總額定為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在此三種公債中，德國首先只發行甲乙兩種公債，至於丙種公債，則可俟賠款委員會認定德國已有餘力時，然後發行。對於甲乙兩種公債（共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德國政府須付利百分之五。照此計畫，德國政府每年當支付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在此類數中，賠款委員會又特別體恤德國，只要牠支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其餘三分之一，

則由其出口稅收——稅率定為值百抽二六——抵銷。

賠款委員會定出的賠款總額及其償付辦法，雖然是多方體恤與周到，但戰後德國異常疲竭的經濟狀況和其羅掘俱空的財力，每年究難支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的鉅額賠款。在德國不能由國外挪借新債償付賠款的限內，鉅額賠款的本身，便含有一種不能存立或「否定」的意味。因為按照現代國際經濟原則：一國對於國外支付的基本手段，一是現金，一是外國貨幣，一是貨物。德國現金在戰時戰後消失殆盡，故其對外支付，只有用外國貨幣與貨物。但外國貨幣不用金去交換，就須用貨物去交換，所以要德國支付鉅額賠款，計惟有使其工業恢復，使其對外貿易發展。但工業恢復，勢必致其軍事基礎重新確立；對外貿易發展，又必致侵奪他國市場。這兩種結果，都是協約諸國，尤其英法兩國所非常畏忌的。牠們所以必欲課加德國以非常苛重的賠款負擔，無非是要藉此阻害其商業的復興。但是這鉅額賠款在消極方面成就了「絞殺敵人」的功能，在積極方面就無由實現其「滋潤自國」的效果。這是存在賠款本身的一種矛盾。在賠款總額宣布後，在德國強迫承

認償付此總額後不久，賠款的這種內在矛盾暴露出來了。

當賠款委員會以賠款總額及其償付辦法通知德國，引起德國幾次抗議時，協約各國即商定一種強硬辦法：即德國如違拗不肯承認，即出兵進佔其工業中心區域魯爾。德國政府在這種恫嚇下，屈服了，隨即着手準備償付第一年度——由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的賠款。但在政府從事此種準備當中，德國經濟界財界即感到一大重壓的緊迫。同年度預算表上的虧空數目，竟因此達到了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紙馬克之多。要填補此虧空，政府只好利用專印紙幣印刷機。紙幣就由此大跌特跌了。

在此種情形下，德國自然要要求協約各國允許其展期支付；協約各國當局不反省鉅額賠款對於德國經濟界財界的影響，却責難德國不增加稅率，改良財政，但結局終於附上這兩個條件，允許了德國的請求。德國延付賠款的請求邀准後，嫉惡德國最深和渴望賠款最切的法國人民的輿論，乃一致攻擊德國償付賠款的缺乏誠意，和其政府當局的軟弱。結果，白里安內閣倒臺，普恩加齊出組內閣。普恩加齊雖是克里曼蘇一流人物，主張對德採取

強硬高壓政策，但延付賠款既爲各國所承認，他要懲治德國，只好另尋口實。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法國藉口德國未繳足一九二二年度之電線桿——規定須繳二〇〇〇〇〇根，而德國至同年末尙祇繳納五九〇〇〇根——煤及畜類爲理由，竟不商之表示異議的英國，與比利時合同佔領魯爾。魯爾是德國的命脈，其煤與鐵的產額，佔有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八十，而鐵路收入，則佔全國鐵道總收入之百分之七十。法國立意佔領這種重要地域，一方面固在藉此強制德國屈服，同時還打算：德國萬一不肯屈服，牠可以自行開發魯爾的富源。結局德國果然以消極的不合作的方法，對法國表示反抗，而法國也居然毫不客氣的暫時把魯爾當作殖民地，牠自己是開發殖民地的主人。

由一九二三年一月起至八月止，是德國廣續反抗法國的期間。在此時期中，魯爾地方有十四萬七千德國人，以不服從法比聯軍命令，而被逐出境。當地一切煤礦工人拒絕發掘，一切鐵道人員拒絕運輸。法比當時雖用高壓手段強迫德國人勞作，同時並以自國兵士，接替鐵道運輸業務，但最後終不能不承認這種高壓政策，實際並沒有多少好處。牠自己開發

魯爾所得到的煤額，僅相當於一九二二年由德國輸供額數的四分之一。

然受禍最烈的，究還是被壓迫宰割的德國。在法比開始佔領魯爾的一九二三年一月，兌換一塊美金，須一六，二四〇馬克，但至同年十一月，兌換一塊美金，竟要四，四六〇，〇〇〇馬克。從此德國的財政與貨幣經濟，完全瓦解。活動資金迅速外流，工業衰退，失業大增，全社會已陷入極度悽慘與混亂不安之景象中。

財政上經濟上毫無辦法，致內閣時常更迭。一九二三年八月，斯特萊斯曼博士（Dr. Stresemann）出組一包羅各黨各派的聯立內閣，即所謂「大聯合政府」（Grosse Koalition）。國會為打開當前難局，作成一非常議案，使內閣總理在財政、經濟、社會三方面得自由採取任何手段。斯特萊斯曼博士既取得此種得便宜行事的大權，乃毅然決定採取兩種打開危局的方策，一是停止對法的消極反抗，一是設法穩定貨幣。在幾個月中，德法關係漸復原狀，而新貨幣政策亦漸形確定了。

第五章 復興之路

一 通貨安定與道威斯計畫

在斯特萊斯曼出組內閣的一九二三年八月，德國的貨幣狀況，乃至一般的社會經濟狀況，雖然尙在向着險惡的程途邁進，但自斯特萊斯曼博士宣言願與法國妥協以後，此險惡之前程，似乎已顯示幾分轉機。然資本主義經濟，係以貨幣爲根基，在支持資本主義體制的限度內，首先是非安定通貨不可的。

斯特萊斯曼爲安定通貨，曾經考慮許多專家關於貨幣制度改革建議。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政府制定並頒布關於永敦銀行（Rentenbank）設立的法律，隨即根據此法律，創設德意志永敦銀行（Die Deutsche Rentenbank）。此銀行之創立，不外是以救濟政府財政難局並穩定國民通貨爲目的。其出資者爲農工商業及金融業者之代表。故對於銀

行之業務與管理，政府不得過問。新銀行發行之新貨幣，稱爲永敦馬克（Rentenmark），此新貨幣發行之辦法，係以農地所有者與商工業者之土地及其他財產所抵押之土地抵押證書（Grundschulden）和財產抵押證書或金債務證書（Goldschuldverschreibungen）爲基礎，發行附五釐息之永敦債券（Rentenbriefe）。此債券以五百金馬克爲一單位，總額爲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新貨幣永敦馬克之發行額，與此債券額相等。永敦銀行負有貸借政府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永敦馬克之義務。每一永敦馬克，規定值一兆紙馬克。

此永敦銀行及永敦馬克之創立與發行，原是一種安定人心與「騙取信用」（Confidence trick）的過渡辦法。此辦法雖然在實際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但德國財政上致命的難關，究還是鉅大的賠款，永敦馬克不能用以支付賠款，德國的危難依舊無法解除。在此種情形下，所謂道威斯計畫（The Dawes Plan）應運而生了。

德國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宣言取消對法之消極抵抗後，德法間之對敵關係漸趨和緩。

同年十一月，賠款委員會即聘請各國專家，組織兩個專門委員會：第一個委員會的任務，在討究如何使德國預算均衡，並如何使其通貨安定。第二個委員會的任務，則在調查德國流出海外的資本，及此種資本如何可以由本國收回。前一委員會之委員長為美國所派出之查理士·道威斯（Charles G. Dawes），經過許久之審議與考慮，該委員會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向賠款委員會提出報告。此即所謂道威斯案，或道威斯計畫。

此計畫專從經濟上着眼（雖然在道威斯委員會本身，亦承認未忽視政治上的困難），其原則在企圖不破壞德國財政經濟之限度內，盡可能的獲取多額賠款。至賠款的來源，該計畫中決定有兩種：一是通常財源，如歲計剩餘、鐵道債券利息、運輸稅及工業債券利息屬之；一是特別財源，如酒精、煙草、砂糖、關稅屬之。把此等財源精確核計，權其緩急輕重，作成德國在最近五年的支付表如次：

道威斯案支付內容（單位：百萬金馬克）

年 度	源 泉		預 算	運 輸 稅	鐵 道		工 業 債 券	公 債	合 計
	鐵道債券	鐵道優先股變賣							
第一年度一九二四—二五	—	—	—	—	二〇〇	—	—	八〇〇	一〇〇〇
第二年度一九二五—二六	—	—	三五〇	—	五九五	二五〇	—	—	一二二〇
第三年度一九二六—二七	—	一一〇	二九〇	—	五五〇	—	二五〇	—	一二〇〇
第四年度一九二七—二八	—	五〇〇	二九〇	—	六六〇	—	三〇〇	—	一七五〇
第五年度一九二八—二九	—	一二五〇	二九〇	—	六六〇	—	三〇〇	—	二五〇〇

由右表所示的支付輪廓，須加以下面這幾種補充解釋：

第一，賠款的支付，大體是逐年增加支付額數。前四年為過渡年度，至第五年，才是標準年度。德國在標準年度須付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至此年度以後，則視德國經濟復興之指數如何，而追增其額數。

第二，特別財源為德國政府預算中之重要收入部分，為緩和德國政府之財政困難，第

一年度第二年度之預算中，不列入賠款部分。至第三年度以後，則因政府財政可漸入佳境，故其預算中之賠款支出，亦逐漸增加。

第三，第一年度之賠款支出，雖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但因政府財政預算中不能列入，同時鐵道債券及運輸稅方面又不能有多大期待，故德國在本年度須向外國借入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第四，鐵道運輸及工業，平均負有逐年賠款總額一半以上之負擔；此後德國之厲行產業合理化，蓋不外此重壓下形成的必然結果。

第五，為保證德國按期支付右表所記的賠款，道威斯委員會還創設有兩種制度，一是收入抵押制，一是國際共管制。收入抵押制的意義是：德國應將酒精，煙，啤酒，砂糖和關稅幾項收入，特別劃出，在牠沒有把額定賠款清償之前，這幾項收入不得移作別用；至這些稅收的管理權，也須由德國讓交各協約國，由各協約國委派收入監理委員，直接監視。此外，關於德國鐵道債券及工業債券之利息支付，乃至鐵道之行政管理，皆須受賠款委員會及其所

直接委派之機關人員監督。

第六，在道威斯計畫中，還特設定一個發行紙幣的銀行。此銀行為獨立性質，其任務有二：（一）管理紙幣之發行，使德國紙幣能應實際經濟需要而伸縮，不得濫發；（二）承辦賠款的支付。這個銀行的管理權，得由德國人組成，但此管理部須對於一個由總部——總部部員之半，由外委派——所選舉出來的外國銀行負責。

第七，有了這個承辦賠款支付的銀行，還不能解決賠款移送的問題。因為德國的貨幣並不能直接充當賠款之用。牠要支付英法意諸國之賠款，須將馬克轉換成鎊、佛郎和里拉。或者把德國貨如鐵、煤、鋼、製造品等換得此類貨幣。為應此種轉換需要，道威斯計畫中又特設一轉賬委員會。德國政府先將牠籌得的款項，交付其發行紙幣的銀行，然後再由此銀行轉付轉賬委員會，此委員會則將馬克兌換法郎、金鎊以及其他的外國貨幣。

這個計畫的最後目的，雖然不外是為多掙得幾個賠款，但同時也還算顧及了德國的困難。所以道威斯氏在此計畫草案的序言上說，「此種計畫乃樹立於正義、公正及共同

利益的原則之下。」「正義」一類名辭儘管有多種多樣的解釋，但在德國人看來，終不免有許多疑慮與難堪的地方。賠款的總額，計畫案中全未道及；至一九二九年度以後，且須視德國之繁榮程度，而在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鉅款以外，酌量增加。這無異在德國經濟復興前途上，投下一大暗影。況且外國人管理監督德國的財政，那是德國人所非常痛心疾首的。然在當時的形勢下，却又不能不隱忍接受此種計畫。一九二四年夏季，德國與協約各國在倫敦開會，簽訂一採納道威斯計畫原則的協約。此協約簽訂後，法比即宣言至相當時期撤退魯爾的駐軍。

道威斯在前述計畫草案序言上說：「此計畫案的性質，公正而合理，如其採用，則終局的永久和平可期；若德國政府拒絕此提案，那就無異故意選取經濟解體之路，而使其國民立即陷於絕望的深淵。」假使德國當時不採取此種計畫，其結果是否如道威斯所云，吾人殊難測知。但既經採行過道威斯計畫的德國情形，該是怎樣呢？桑脫（Soulter）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新德意志帝國主義（Der Neue Deutsche Imperialismus）中，曾有以次的說

明：「以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的德國，與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德國相比較，實有可驚的差異。在前五年間，其政治與經濟的基礎，根本擾亂。由是生產力減殺，國際競爭力削弱……國家組織瀕於崩潰。然至今日，與此完全相異的德國出現。德國資本主義乃得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爲伍，而演着重要的經濟鬥爭。」

這是事實。但這種事實裏面，滿含有悽慘毒辣與危險的成分。浮在「道威斯景氣」表面的肥油，乃是由道威斯計畫促成的合理化政策，向德國勞動大衆搾取的精血。這種精血一旦被吸盡了，馬上就要露出殘骸枯骨的兇相。不過，在敘述德國產業合理化的實況以前，我想把德國在道威斯計畫實行後的對外關係，畫個輪廓。

二 羅加諾會議

如其把道威斯計畫的終局結果暫置不論，則這種計畫在實際上，就不僅應視爲德國經濟復興的樞紐，同時且應視爲其外交局面打開的起點。

戰敗後的德國國際地位，是一落千丈的。法比軍隊侵入魯爾，致促成其經濟破局以後，德國大有「國幾不國」之概。當時人民及政府在對外關係上，形成兩大派別：一是強硬派，他們不承認德國應負戰爭的責任，從而巴黎和約所苛加的一切條件，都當由聯合姊妹國蘇俄，而徐圖予以推翻。由是他們的外交政策，即所謂東向政策。同時與此派相對立的，則爲妥協派，此派相當承認德國過去的錯誤；協約各國對德國那種錯誤所加的懲罰，他們雖亦認爲過苛，但他們以爲要減免懲罰或翻改巴黎和約，勢須與協約各國妥協。由是他們的外交政策，就是所謂西向政策。主張對法比佔據魯爾軍隊作消極反抗的，是強硬派；主張取消對法比反抗的，則是妥協派。斯特萊斯曼是妥協派的代表人物。所以在斯特萊斯曼出組內閣，及他此後繼續掌握外交實權當中，德國的外交政策，都是向着妥協一途邁進。這種妥協外交的成果或實效，可由羅加諾會議及德國實行參加國際聯盟而得到解釋。

原來在法比佔據魯爾以後，在德國的外交動向，固然有上述之推移，同時法國人民方面對於德國的態度，亦逐漸有所改變。他們認爲，法國對德採取高壓手段，德國固蒙受大痛

苦，而在法國實亦有害無益。魯爾糾紛發生後，法國佛郎一落千丈，政府財政更弄到無法開交。設長此與德立於對敵的戰亂狀態，法國的經濟前途亦是不堪設想。加之，德法雖為世仇，巴黎和約及此後實行和約對於德國所加的種種難堪的懲罰，實亦够發洩法國人的舊怨。在法國不能完全消滅德國的限度內，法國人究有與德國維持相當友好關係之必要。此外，法國在魯爾的舉動，曾引起世界各國的非難，就在其協約的英國，亦始終表示法國操之過切。在這諸般情勢下，一味主張對德蠻幹到底的普恩加齊，終因違反一般人民的意嚮，而於一九二四年五月的選舉中失敗下臺。繼普恩加齊持法國政局的，是急進派社會黨首領赫里歐（Heriot）。而當時英國執政者則為勞動黨魁麥克唐納（MacDonald）。這兩位比較開明人物出登英法政治舞臺，同時德國的斯特萊斯曼又主張採行妥協的西向政策，故戰敗國與戰勝國間之僵局，乃容易打開了。

一九二四年七月，國際聯盟第五屆大會開幕。這次會址仍在日內瓦。因為到會的人物有赫里歐和麥克唐納，故會議的結果，遂產出了有名的日內瓦和平草案。赫里歐和麥克唐

納出席此次會議，本來都具有改善國際關係之決心，但因他們各各代表的國家的實況不同，致使他們謀世界和平的見地，頗不一致。照麥克唐納所說，只有在各國肯將彼此爭議移付法庭或其他機關仲裁的唯一條件之下，世界和平才有達到之可能。赫里歐所見不同，他以爲仲裁的規定雖關重要，但如其一國不願國際條約拘束而妄興兵戎，則被侵犯的國家，何從得到保障。所以爲要保證各國之安全起見，各國應即商定一種國際司法制度，藉以維護公約之效力。英國爲一島國，不虞四周外敵之驟施侵略，故麥克唐納主張仲裁，法國位於大陸之核心，其邊境又多半爲歷史的敵國，故主張安全保障。結局，前者的仲裁理論與後者的安全議論，都被融合在和平草案中，此草案規定：一切侵略戰爭，都是國際的罪惡。爲防止此種戰爭起見，各國間一發生爭議，即當將爭議移付國際法庭和其他仲裁機關。此外，並規定：各會員國只有在以次兩條件下，方得從事戰爭：一，純屬自衛；二，奉國聯之命，應付「侵略的國家」。至「侵略的國家」之界說，和平草案中不曾規定明白。只此一個缺點，全案幾乎否定無餘。況此草案發生效力，還待各國政府批准。英代表麥克唐納回國後不久，他的內閣

塌臺了；由他極力支持的和平草案，竟被保守黨內閣的外交大臣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完全擱置了。

特和平草案雖如此變成廢紙，但這次草擬和平草案的精神，却在此後數年間之國際關係上，發生了極大極好的影響。在羅加諾會議所產生的羅加諾條約，蓋不外此和平草案之繼續修正與擴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德國路德（Luther）政府鑒於法英諸國在道威斯計畫及和平草案上，有意改善彼此間之相互關係，且進而圖謀世界的永久和平，遂正式向協約各國提出以次的建議：（一）法、意、英、德四國應即成立一互不侵犯協約，特此協約須請美國作擔保；（二）各國對於萊因蘭的現在法律地位，應予保障。此建議首先得到英國贊同。法國因德國主張互不侵犯，即無異承認亞爾薩斯·洛林永歸法有，故亦大體認為滿意。一九二五年秋，各國——英、法、比、意、波蘭、捷克斯拉夫及德國——代表齊集於瑞士之僻靜城市羅加諾，共同協議製成了五個條約，就是最關重要的，是互相保障條約。參加這個條約的國家，計有

德、比、法、英、意五國其大體的規定是：（一）對於德比間和德法間的國界，和萊因蘭禁止軍事行動的區域，予以不受侵犯的保障；（二）德比和德法互作不相侵犯的允諾，但在下列三種情形之下，此種規定不能適用：（甲）正當防衛；（乙）奉國際聯盟之命，抵禦侵略的國家；（丙）對於引起戰爭的爭議判決，國際聯盟並未會取得各會員國之一致可決。

在這個條約（一）項中，德國雖然取得了協約各國對於萊因蘭現狀保證的允諾，但德國須對亞爾薩斯·洛林表示絕無奪回野心，這是羅加諾協定所由成立的焦點。因為會議中尖銳對立的德法兩國，一方面是怕萊因蘭再度被侵，一方面則是怕亞爾薩斯·洛林得而復失。有此交換條約，兩方面都得到了保障。

除右述「互相保障條約」外，關於德國此後與其隣國的爭議，還由一個條約定有種種和平解決方法，參加此種條約的，計有比、法、波蘭和捷克斯拉夫諸國，牠們彼此約定，此後彼此間如發生爭議，應由各國領域中常設之調解委員會（此委員會由五關係國各派一代表及其餘中立國派代表三人共同組織）和平解決。如其該委員會的解決方案，不能取

得各方同意，則應將此爭議移交國際聯盟理事會或國際法庭依法判決。

由上面兩條約看來，羅加諾會議對於侵略的限制和安全的保障，已算審慎周詳了。但小心謹慎的法國，猶恐怕其夾袋中之波捷兩國橫受侵略，同時又與此兩國訂立保安協約，規定波捷兩國如受他國侵略時，法國允即出兵援助。這一來，本來像是友愛滿堂、光明透頂的羅加諾協定，不期然又投下了鈎心鬥角的暗影。

然而，從大體看來，這次會議總不失為戰後比較有效果，比較保持有幾分平等精神的會議。戰敗的德國，從此得與戰勝諸國立於對等地位，而為德國加入國際聯盟開一捷徑。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國路德代表由羅加諾攜歸的諸種協定，雖然在國會中痛遭強硬派的攻擊，但因新大總統興登堡（於同年四月選出）的支持，和外交部長斯特萊斯曼的奮鬥，卒以二七一票對一七四票通過，國會通過此決議後，隨即議決德國應即作加入國際聯盟之請求。

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本為羅加諾協定之必然結果。但牠對加入國聯所提的附帶條件

中，第一項就是以永久會員的資格，參加國際聯盟理事會。這項要求，在德國是最關重要的，因為國際聯盟事實上係爲英、法、日、意四個常任理事國的代表所操縱。德國如不能以常任理事國資格參加理事會，牠將來不但不能取得種種要求修改和約的便利，且不免仍然要受戰勝諸國無理的宰制。但德國要求爲常任理事，古巴、西班牙及波蘭諸國亦相繼作同一要求。常任理事席既不能爲無限制的增加，操縱國際的英法諸國自然不免要感到頭痛。然幸而波蘭係由法國所撐持，西班牙係由英國所嫉使，古巴又是不足輕重，可以任意抑制的國家，所以這場風波，結局仍由英法調解下去了。被視爲戰爭元兇之德國，其代表竟與「正義護持國」之代表，歡然團聚於國際理事會中，德國之國際地位從此提高了。

但一國之國際政治地位，是不能與其經濟地位分開的。德國之加入國際聯盟，是羅加諾會議以後的事。羅加諾會議之召集，雖然是由於協約諸國在日內瓦和平草案中已對德國透露有協調的友好的精神，但此種精神裏面，實潛伏有根本的物質利益的要求。工商業家在物質利害衝突時，固然最容易惹起惡感，在那種利害關係需要調和時，亦最容易消除夙怨。

德國在爭奪海外市場的場合，誠爲英法的勁敵，但德國本身，同時又是英法的市場。爲了前目的，牠們固然希望對德國加以無情的破毀，爲了後一目的，却又不能不予以復興的機緣。「大仁大義」的日內瓦和平草案及此後之羅加諾協定，蓋不外基於此種動機。誠如一位德國著者所說，「此種和平運動的促進者，實爲商業；唯有商業，才是實現和平運動的要件。」

但此種說明，一方面固可適用於協約國，同時尤可適用於德國。事實上，德國是羅加諾會議的發起人。德國西向政策派之所以能制勝東向政策派，要不外德國代表工商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勢不能不迎合工商資產階級的要求。發展對外貿易爲復興工業必由之路。而對外貿易的發展，又必待對外政治關係的改善。所以在羅加諾協定簽訂後幾個月中，德國國內工商業即呈現異常的活躍。國際鋼鐵組合於一九二六年十月成立；美國的大量資金，亦在這前後源源向德國流入。已經受着道威斯計畫束縛的德國經濟，益以這諸般事實的促進，遂使德國產業的復興與改造，不能不趨向合理化一途。

三 產業合理化政策

國際關係的改善，以及前述道威斯計畫的成立，都是使德國的全面問題，由政治方面轉換到經濟方面之極大關鍵。但德國的經濟復興，是有許多困難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德意志全國工業同盟」（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對於全德國資本家階級，曾發表一種宣言式的德意志工業綱領，其中有云：「戰爭及戰後的損害，破壞了我國經濟的基礎。」百分之十的領土割讓，百分之一五的燕麥、小麥耕地面積和百分之二〇的馬鈴薯耕地面積的失去；百分之七五的鐵礦，百分之六八的亞鉛礦，百分之二六的石炭產額的喪失；殖民地的全部瓜分，千百噸以上之船舶的全部引渡……：「所有凡爾賽和約中的諸條件，莫不妨害德國經濟的復興。」不但如此，道威斯計畫規定德國每年付出的廿五萬萬馬克（此係標準年額，即一九二八——九年度以後，每年至少應支付的額數）其中就有三萬萬馬克直接由工業債券利息支出，廿五萬萬馬克鉅款所給予德國工業的間接不

利影響，即令暫置不論，至少這三萬萬馬克，每年是非由工業利潤方面擠出不可。況且在貨幣經濟解體後，一方面形成固定實物價值之巨大堆積，同時又使一切流動的經營資本感到異常缺乏。所有這些情形，都是德國在經濟復興路上痛切感到的難關，所以德國工業資本家在前述德意志工業綱領中，提出自己須待解決的以次諸般問題，說：『我們對於國外價值全部的喪失及內地資本一部分的喪失，必須補償；對於戰時及戰後無比消費所擴張的生產設備，必須應經營資本的減少與販賣市場的狹隘化，而以有機的方法縮小；在另一方面，爲要能與其他生產諸國在世界市場上作成功的競爭，又必須重新編組生產設備；最後，我們還得重新樹立戰時及戰後中斷了的對外通商關係。』

在這諸般問題裏面，存有三個基本的要求：（一）資本的補充與蓄積；（二）工業的整理與改造；（三）對外貿易的重新樹立。如其說資本蓄積，即資本利潤的增殖，要靠貿易擴展，而喪失了全部殖民地市場的德國對外貿易，又要靠其製品的低廉與精良，那蓄積資本與擴張貿易之間，就存有一個矛盾：即價廉物美與高率利潤是正相背離的。加之德國工

業所負擔的賠款重擔，更使此種矛盾增大，換言之，就是使利潤增殖與價廉物美的現象，愈加不能並存。然而在事實上，價廉物美又成爲增殖利潤的必要條件，而德國工業資本又非掙得較高率的利潤不行。在這種進退維谷的情況下，德國資本公司當然知道解決困難的關鍵，就在削減工資。

然當施行通貨膨脹時，資本公司雖頗容易利用貨幣價格的跌落以減低勞動者的實質工資；可是通貨一旦由膨脹轉到收縮，資本公司即令祇想保持實質工資的原狀，亦非低減其名目工資不可；若要低減其實質工資，其名目工資就不得不大減特減了。故資本公司用此種方法增大利潤，實屬萬分困難。爲圖此種困難的解決，他們遂發現了一種比通貨膨脹還要容易隱蔽勞動者的削減工資的方法，那就是全般產業改造過程上之技術合理化。

產業合理化，原爲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顯著特徵之一。然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却以德國爲最有推行此種方策之必要。因爲在前述德意志工業綱領中，德國資本公司雖然把合理化解作是「爲提高人類勞動生產性，對於一切技術及組織手段之合理的使用」，其

實是爲提高企業利潤所使用的一切手段，或使提高利潤的事體變爲「合理」。我們已經知道德國非特別提高利潤不可的事實，同時又知道德國資本家不能直截了當的由縮減工資而增加利潤，所謂「殺人不見血」的合理化政策，就恰好適應德國資本家階級的要求，無怪在推行此種政策的一切國家中，德國算是首屈一指了。

德國推行產業合理化的實相，可以從生產行程及流通行程兩方面加以解說。在生產行程上，有三種方式增大剩餘價值，增大利潤。其一是延長勞動時間，其次是縮減必要勞動時間，第三是增進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是最直接有效的增大利潤的手段。德國自着手實施合理化政策的一九二五年起，各種工業上的勞動時間，幾乎是一般的延長，就中尤以化學工業、紡織工業、金屬工業爲最甚。例如每週超過四十八小時以上的勞動者，在化學工業上，一九二四年五月，佔其全體總數的百分之三八·八，一九二七年五月，則爲百分之四五·五；在金屬工業上，一九二六年四月佔其全體總數百分之三二·一，同年十月爲百分之四八，至翌年十月則爲百分之五三·三；在紡織工業上，一九二六年四月佔其全體總數

百分之二七，同年十月爲百分之六三，至翌年五月，且達到百分之七五。在工業方面如此，在農業方面亦有同一趨勢。

至於縮減必要勞動時間和增進勞動強度，則是從改良技術機械，並以最科學的方法，改組企業和勞動入手。關於德國實施合理化期間的一般技術發達情形，可就其特許專利統計而徵知。據德意志帝國統計年鑑所載，在一九二五年年終，全國有效的特許件數爲六四、九一四，一九二六年終爲六四、二三六，一九二七年終爲六六、九八二，一九二八年終爲七〇、九五二。特許件數不絕增加，一般勞動能率當因而不絕增大。

特種種技術改良與機械發明的結果，必要的勞動時間固會縮短，勞動的強度亦會大大增進。因爲技術與機械一旦改良，機械的配置變動，勞動的組織亦因而變動。例如合理化中通行的新勞動組織方法，即所謂流動勞動（Fließarbeit），就是把勞動者聯繫於流動傳送帶，而使其隨流動傳送帶流動的速率，而支出其勞動力。流動傳送帶的速率加大，勞動者在一定時間內所支出的勞動力，亦不能不相應增大。然此不過一種適例而已。德國在實

施合理化期間的勞動能率增大及勞動強度增進情形，可由次二表而知其梗概。

(一) 鐵鑛及岩鹽採掘業之勞動能力增大指數

	指				數	
	鐵鑛採掘業	岩鹽採掘業	生產額	勞動者	鐵鑛採掘業之勞動者數	岩鹽採掘業
一九一三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四年	六四	六八	七二	七二	一〇六	一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七九	七九	一〇一	七六	八七	七五
一九二六年	六二	五三	八六	六六	四四	七六
一九二七年	八七	六八	一一〇	八〇	七八	五九

(二) 勞動強度增進指數

	鑄鐵爐事業		碾鐵業		紡織業		製紙工業	
	生產額	勞動者	生產額	勞動者	生產額	勞動者	生產額	勞動者
一九一三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	—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三三	五八	五七	七〇	—	—	八六	一一二
一九二五年	四三	五六	九〇	七三	一〇〇	二〇〇	一〇二	一二七
一九二六年	三九	四九	九一	六〇	一七五	九五	一〇二	一〇八
一九二七年	五四	五一	九五	七二	一〇〇	八二	一五二	一一六

右二表所提示的一般概念，即各種工業之產額大體不絕增加，而其所用勞動者數，則大體不絕減少。此種事實，皆足說明勞動剩餘價值即企業利潤之非常增大。

然以上還係就生產行程上之合理化而言，至與生產行程相關聯的流通行程之合理化，那還可從兩方面增大企業利潤。利潤在生產行程中係與工資相對立，而在流通行程中，則在由剩餘價值形成之總利潤中，又引起產業資本利潤與商業資本利潤在配分上之對

立。即商業利潤之分額增多，則產業利潤之分額減少。爲要從這方面增大產業利潤，每種企業都從事獨占的組合，而一切大規模的獨占企業體，幾乎都備有自己的商業機關。比如德國鋼鐵業上之合同製鋼股份公司，就爲國內市場及國外市場設有相異之商業機關。產業而兼營業，不但原來應由總利潤中分割去的商業利潤，可以大行縮減或消滅，即可大大增加產業利潤；同時產業獨占體因免去商業資本家之操縱與牽掣，且因增大其規模與勢力，更可在生產行程的合理化上，盡量發揮其功能。即是一方面由其資本力的豐富，容易採用新技術與機械，另一方面則可因其促使能率差的經營中止作業，使生產集中於比較優秀的工廠之中，而益增大勞動之生產性。德國的獨占事業是向稱發達的，在一九二三年，全德國的工業加特爾，已達一千五百個，至一九二五年，則增加至二千五百個，此後更續有增加。獨占組織與合理化之相互作用，致德國安定期中之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皆異常增大。德國資本家們儘管動輒宣稱資本缺乏，以爲其加緊蓄積資本之口實，但據德意志國立統計局的推算，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其貨幣資本形成的總額，約如次表：

一九二四年	五·六 (單位十萬馬克)
一九二五年	五·八
一九二六年	一〇·一
一九二七年	七·二
一九二八年	七·五
合計	三六·二

據右表所示，德國於此數年間在國民經濟內形成的貨幣資本量的純增加額，計已超過三百六十萬萬之鉅。若把同一期中，由外國融通的長期信用總額五十四萬萬及短期信用總額六十一萬萬加算起來，則對德國經濟新提供的貨幣資本量，合計有四百八十餘萬萬。然此係就貨幣資本考察。若從生產資本及商品資本方面予以推算，則如次表所示。

一九二四——八年間之德國經濟上之「實物資本」增加額（單位百萬馬克）

設備新投資

貯存品之增加

發券銀行之金
保有量增加

合計

一九二四年	二、七〇一	五、五一一	二九六	八、五〇八
一九二五年	四、五三二	二、七〇三	四五五	七、六九〇
一九二六年	五、一五六	二、四五〇	六二四	三、三三〇
一九二七年	七、一六八	四、一〇四	三三三	一、一三〇五
一九二八年	七、二七三	二、六二四	八六六	一〇、七六三
諸年度合計	二六、八三〇	一、二、四九二	二、二七四	四一、五九六

此四百十六萬萬總『實物資本』中，有二六八萬萬馬克，是對固定設備的投資額，亦即是主要用以充當技術合理化的資金。據德意志國立統計局所出版之一九二四——八年間之德國國民經濟之資本形成及投資所提示，德國資產階級在此期間蓄積的剩餘價值總額，將近二二萬萬馬克。這是德國經濟復興之全貌，同時亦是德國合理化政策之實績。

賠款償付總監督巴爾克·基柏爾特 (S. Parke Gilbert) 在一九三〇年五月提出的關於道威斯案履行監督之最終報告有云：『……此後（按即道威斯計畫成立的一九二四年以後）數年間，德國經濟已成就了顯著的發展；德國國內國外的信用恢復，產業再

建，生產能力復興，一般生活水準大加改善。此種成果，主要固由德國國民之勤勉與精力所完成，而其他諸國國民爲德國經濟之再建，而提供其貯蓄之基金，亦有不少幫助。在這段報告裏面，除了「一般生活水準大加改善」一語，須予斟酌以外，其餘都是事實。但可惜造成「此種成果」之「德國國民之勤勉與精力」以及其他諸國國民所提供之資金，在某種限度內，勢將不免發生相反的作用哩！我們試一考察德國資本主義第三期的險惡形相，就知道德國借用外資，以採取「國民之勤勉與精力」的合理化政策，自始就是一種不合理的嘗試。所以，甫經走上「相對安定」的坦途，隨即就陷入困難萬分的苦境了。

第六章 資本主義第二期中之掙扎

一 楊格計畫與合理化政策之破綻

道威斯計畫中之標準年度，是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在此標準年度以前的諸年度，如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統爲過渡期間。德國在過渡期間所應支付的賠款，各年度多少不等，但都少於二十五萬萬馬克；二十五萬萬馬克是標準年度應當支付之數。至此標準年度以後，則視德國之經濟繁榮指數而增加其額數。——這是我們在前面敘述過的。

這所謂過渡期間，恰好是德國的經濟安全期間。故德國逐年都能按期支付其應當償付的賠款。然到標準年度的前一年，不但支付賠款的德國發生困難，就在領受賠款的英法諸國，亦對賠款問題感到躊躇。姑先從這些國家說起罷。

前面講過，協約諸國要德國支付賠款，就無異要德國振興產業，發展對外貿易，亦就無異讓德國的貨物，侵奪牠們國內國外的市場。而事實正是如此。德國產業上厲行合理化政策的結果，其低廉的貨物，乃如洪水般的向外傾注，首當其衝的英法諸國，特別是大英帝國，立即感到其未經改造的主要產業，大受壓迫。因而對於道威斯計畫的償付方法，已隱露不妨修改之意。

同時，在支付賠款的德國方面，則更有此種要求。道威斯計畫未規定償付的年限，德國常爲此感到不安。加之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德國的長期、短期外債，已經突破了一百餘萬萬，每年差不多要增加一兩萬萬的負擔。道威斯計畫規定過渡期間諸年度的賠款額，逐年遞有增加。在一九二六——七年度，德國財政均衡上的不足額，已經超過九千萬馬克以上。政府在多方保育產業資本的情形之下，既不便對資本課稅，於是國家費用的大部分，就祇好直接、間接加在貧困與失業的勞動大眾身上。不向可以徵稅的地方徵收，而向無可徵稅的地方徵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雖仍不失爲「合理的」收入政策，但事實的邏輯，

却總不免要從政府的財政預算方面證明其錯誤。延至一九二八——九年度，財政的不足額數，竟超過十萬萬馬克。以上這個財政年度，正是道威斯計畫中的標準。年度德國在標準年度應支付的二五萬萬馬克中，有一半是規定由政府預算中支出。德國這一年度的預算，既虧欠十萬萬馬克以上，次一年度的不足之數，勢必更大。照此推移下去，不到兩三年之內，德國的經濟狀況，不免又要陷於安定期以前的險狀。在此情形下，改訂道威斯計畫的運動，自然要成爲德國非常緊迫的要求了。

德國的實情如此，同時英國乃至其他協約國家又因本身利害關係，覺得應對賠償問題作一個完全的最後解決，於是修改道威斯計畫的會議，乃於一九二九年二月開幕。經過多方的折衝與幾次的停頓，卒於同年六月七日成立新的賠款協定，即所謂楊格計畫（Young Plan）。楊格計畫的大體輪廓如次：

賠償期間 五十八年七個月（內分第一第二兩期）

賠償總額 一千一百三十九億五百七十萬馬克

第一期（由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到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十六年七個月

賠償金額 七百九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萬馬克

平均年金 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萬馬克

第二期（由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到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二十二年

賠償金額 三百四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萬馬克

平均年金 十五萬六千四百六十五萬九千馬克

第一期賠償金額有幾點值得注意：（一）第一年度係由一九二九年九月到次年三月底，祇七個月，所支賠款額為七萬二千四百萬，至次年則為十七萬七千萬；以後逐年度遞增，至本期最後一年度，則達到最高支付額，計為二十四萬二千八百萬。較之道威斯計畫之標準年額還少。（二）第一期的年金，分作兩個部分。其一是每年支付的金額中，有六萬六千萬馬克為無條件支償部分，即不論在任何情形下，皆不得延期。此無條件支償部分，有百分之七六，即五萬萬馬克係支給法國。除此無條件支付部分外，其餘為有條件支付部分。這一部

分在一定條件下，得延期支付。

照上面所說看來，道威斯計畫的改訂，即楊格計畫的成立，比較於德國有利，但這終是一種比較「更不利的」有利而已。況楊格計畫規定德國每年應當支付的賠款，除右述一定年次金額外，還有兩項必須分期支付的金額：一是對於履行道威斯計畫所借外債本息攤還；一是對比利時馬克協定中之金額的攤還。這兩項金額，再加上楊格計畫本體的年次金額，至第一期第二年度，就須支出十八萬萬以上的鉅額。十八萬萬較之道威斯計畫標準年度的二十五萬萬，雖然少了幾萬萬，但仍非德國的經濟財政狀況所許可。況在楊格計畫成立的前後，德國賴以恢復其資本主義經濟，賴以支撐賠款重壓的合理化政策，已經暴露了不可彌縫掩飾的破綻咧！

產業合理化的積極目的，雖然在增大勞動剩餘價值，增大利潤，增大資本蓄積，但在完成此種積極目的的當中，却顯然要造出種種矛盾：第一，合理化的推行，必然要促成資本的高度化，即固定資本對流動資本的成分加大；不幸剩餘價值即利潤，又祇有由流動資本的

使用而獲得。德國儘管在安定期間對固定設備投下了二百六十餘萬萬的龐大資本，但我們並不能由此測定其利潤的膨大程度，反之，在流動資本不能與固定資本以正比例增加，却反而以反比例減少的限度內，那恰好會顯示其總利潤額的相對減少。利潤相對減少的趨勢，是合理化過程中必然要暴露的現象。同時亦是與合理化原來目的正相反離的現象。要克服這種矛盾，當然是進一步削減勞動報酬，德國資本家確也是向着這方面努力，但無奈這裏又產生了第二個矛盾，就是勞動階級對資本家是以兩重資格貢獻其犧牲：在生產行程是生產者的資格，在流動行程則是消費者的資格。資本家在前一場合榨取愈多，在後一場合就榨取愈少。我們就以次的統計數字說明罷。

(一) 全國就業者所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五三九、七八七、五〇〇馬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四七一、五六三、三七〇馬克

(二) 全國失業人數（領有津貼者及未領有津貼者）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二、六一九、〇〇〇人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三、四六一、〇〇〇人

(三) 全國就業者及失業者之全所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五五九、二〇五、〇〇〇馬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四九五、六三二、〇〇〇馬克

(四) 就業者及非就業者之週期工資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三二・八九馬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二九・一五馬克

由右列諸數字，我們知道，德國就在經濟復興正旺期間，即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其失業人數已達到數百萬，一九二八年對一九二七年，尙是產業昂進的時期，而其失業者竟增多七八十萬，由此可見合理化對於勞動階級壓迫的程度。特此兩年度中全國勞動者總所得的減少，並不祇是由於技術機械之驅逐勞動者，使一部分勞動者失去其取得總工資之分額的資格，而同時還是由於在業勞動者之不絕減少其報酬。由(四)項數字所指示，

勞動者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之名義工資，要較其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之名義工資，減少百分之十。若其實質工資，亦將近有同一程度的減退。設以一九一三年之實質工資爲一〇〇，則一九二六年七月初爲百分之五六·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爲百分之六一·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爲百分之五五·七。照此推算，戰後經濟復興期安全期的實質工資，差不多僅及其戰前之一半了。

總工資額及各個勞動者之工資報酬，如此大減特減，我們即使暫時可以不要顧及勞動階級的苦況，但具有消費者資格之勞動階級的困乏，究不免要成爲新技術機械加緊加速造出的大量商品的障礙哩！

城市勞動大眾的景況如此，再看另一個構成國內市場之主要部分的農村罷。在都市推行合理化的過程中，農村亦在努力進行此種程序。特農村在這方面的努力，與其說是由於農業者的自發，不如說是由於金融資本家的敦促。金融資本家爲要保證其恢復戰後農業的投資，乃極力宣揚『農業工業化』，合理化機械化，但這種『工業化』的結果，農村中

遂造出了大批的失業者以及大地主大經營壓迫小農業經營的現象。而就整個農村與都市相對待言，在都市各企業之強固獨占組織下，農村不能不購買高價工業品，同時因為農村不易形成獨占局面，其所出賣於都市的農產品，又大抵祇取得低廉的價格。所以，據德意志國立統計局的統計年鑑所載：戰前德國農民之所得為八四萬萬乃至一〇一萬萬，而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各為三十三萬萬，一九二八年為三十萬萬，一九二九年亦為三十三萬萬。經濟復興期的農民所得，竟較戰前減去五分之二乃至三分之二，一部分雖由於領土的喪失，但主要原因，還是由於農業工業的合理化，以及與此相關聯之獨占金融資本的壓迫。在農村為工業品之主要國內市場的限度內，農民所得的大減特減，那不能不說是工業製品的又一個難關。

工業品因國內市場的縮小，而影響其生產結局，農產品之國內市場，亦相因而發生縮小的現象。在此種情形下，德國由合理化努力所生產的大量工業品與農產品，就只好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向海外各國傾銷。然而「第三期」的命運，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同遭

遇的。在德國開始其合理化之復興程序時，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也都不期然而然的從事此種努力，特其厲行合理化之社會經濟條件與要求，不若德國之完備，故其成效和規模亦不若德國之驚人。不過，牠們實行合理化的程度雖不同，其對合理化的要求，及由實行合理化所得到的經驗則一致。換言之，就是各國都會感到國內市場的窄狹，都會在對外貿易政策上，不約而同的要求推廣國外市場，和防阻他國貨物的傾銷。德國貨物儘管再低廉，德國資本家們儘管更殘酷的壓低國內勞動大眾的生活水準，藉以增強其對外的競爭能力，但在各國自我防衛的關稅壁壘下，不久又發現不能暢通了。德國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的輸出數字，充分指證了此種事實。

德國輸出貿易額（由一九二五——三〇年）

一九二五年	八、七九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二六年	九、八七三、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二七年	一〇、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二八年

一一、三六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二九年

一一、六六三、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三〇年

一一、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至一九二九年止，德國輸出貿易額逐年遞有增加，但這種增加，與德國希望恢復並發展對外貿易的程度，乃至與德國生產擴張所實行要求擴張對外貿易的程度，顯然大相懸殊；不但如此，至德國開始支付楊格計畫中的賠款的一九三〇年度，其輸出貿易額，却轉落到一九二八年的程度，較之一九二九年的輸出額，竟減縮十分之一。

然而德國之感到國內國外市場窄狹，感到生產過剩，並還不是始於一九三〇年度哩！消費資料工業部門的生產，至一九二七年達於頂點，一九二八年則開始衰退。在一九二九年之末，重工業生產部門已顯示非常顯然的生產過剩，而着手限制。延至一九三一年，重工業部門的生產能力，只利用到百分之三九乃至四五，消費資料工業部門的生產能力，亦祇利用到百分之五〇乃至五七。而重要諸生產部門的生產量，如以一九一八年爲一〇〇，則

一九二九年一月爲九六·九，一九三〇年一月爲九三·七，一九三一年一月爲六七·七。在工業開始衰退的過程中，農業亦顯示異常的衰落。一九三〇年度對其前一年度的農業上的購買力，低減五萬萬馬克以上，而一九三〇——三一年度對其前一年度的人工肥料消費量，則減退百分之三五。

以上是德國工業農業合理化的成果。合理化把德國的工農業恢復起來，馬上又使其沉滯下去。在這種盛衰的轉變上，寄託其全生命於工農企業的德國金融資本，乃首先暴露出整個德國國民經濟的破局。

二 金融恐慌

在戰後通貨膨脹時代，曾形成了許多以商業資本爲中心的康載爾（Konzern），商業資本家對於產業資本家的支配勢力，隨膨脹程度加深而益形強化。因爲在德國未恢復其國際信用關係的當中，祇有與外國有關聯的大商業資本家，才能具有借入巨額外國高價

貨幣的勢力與機會。然自馬克一經安定，此種以商業資本爲中心的康澤爾，乃因通貨膨脹到貨幣經濟解體的程度，而大部分趨於崩潰。商業資本勢力衰微，代之而起的，則爲銀行資本或金融資本。本來在通貨安定時期，產業資本是佔着極大優勢的，但產業擴張的過程中，終究不能不與金融資本相結托，以致仰承金融資本家的鼻息。加之，德國復興經濟之唯一手段，就在合理化，合理化非增進固定設備不行，即非仰賴巨額的資金不行。在這種關聯上，金融資本勢力，乃隨產業合理化的增進而加強。換言之，就是產業合理化的過程，即大銀行資本對產業資本支配的過程。

以上是就典型的產業即工業方面的情形而言。而在農業方面，則尤屬如此。戰前德國的農村合作社，亦頗發達。農村各合作社曾爲自己金融上的周轉，設立有農業信用合作社。自經狂亂的通貨膨脹後，此種經營遂相繼歸於瓦解。迨通貨進入安定階段，農村金融異常枯竭，於是銀行資本乘機侵入，爲保證其資本並增大其有效的榨取，金融業者乃極力鼓吹「農業工業化」。他們於一九二六年組織「農用動力機金融股份公司」，直接供農業以

金融，而強制其合理化機械化。此外又有肥料公司以及穀物貿易公司的設立，對於農業上之生產過程及流動過程，簡直予以全面的控制。由是農業之合理化過程，亦就是大金融資本對於農業資本支配的過程。

金融資本在工業農業領域內的深入，誠然是金融資本家莫大的勝利。然而在他們正期望由合理化撒下的種子，獲取非常美滿的收穫時，合理化本身暴露破綻了。合理化雖然在一方面能產生出大量的廉價產品，同時，却形成了無從銷納那些產品的窄狹市場。工業上發生生產過剩的不況，在合理化形式下，凝結在農業、工業固定設備上的金融資本，隨即感到威脅。這種情形與當時國際間之不安的經濟政治狀況，連同作用起來，遂使德國整個金融系統不能不暴露牠本身的一切弱點。

德國金融資本的弱點，可由以次三方面來說明。

第一，德國貯蓄的基礎是薄弱的，銀行資本的周轉，頗需要國民貯蓄的不絕增加。在賠款的重壓之下，德國國民的一般貧乏，以致把他們的貯蓄基礎，大大剝奪了。在一九一三年，

每個國民在貯蓄金庫中的貯蓄額，約爲八百零三馬克。至戰後經濟興旺達於頂點的一九二八年，却僅只五百餘馬克。然而這還是平均額數，若加以類別，其貧弱狀況猶灼然可見。據普魯士的調查，在貯蓄者中，有百分之五〇，不足一百馬克，百分之七五乃至八〇，不過八百馬克，百分之八五乃至九〇，不足一千馬克。即在一九二七年，全普魯士超過三千馬克的貯蓄者，不過百分之三・三二。貯蓄事業既不發達，而復興途中對於資金的需要又甚迫切，故祇好仰賴外資。

第二，仰賴外資，爲德國金融資本的又一缺點。柏林五大銀行對政府及各種產業所融通的資金，計如次表：

柏林五大銀行之信用（單位：百萬馬克）				
票據之財部無利證券	信用	貿易支票		
一九一三年末	一七七六	二九四九	五一〇	七六〇
一九二六年末	一五五五	二四四八	四五七	七一八

一九二七年末	一八五七	三七九六	七七五	五三〇
一九二八年末	二四八二	四二八九	一三九七	一一二五

銀行融通的總信用既達到如此可驚的巨額，然則其財源如何呢？這可由下表而知其究竟：

柏林五大銀行之資本與債務（單位百萬馬克）

	債 務	支付支票	公司資本及公積金
一九一三年末	四八五二	一三三〇	一四九一
一九二六年末	五九六九	三二四	七二一
一九二七年末	七六〇八	三九四	七七〇
一九二八年末	九四四四	四〇四	七五七

照右表所示，銀行之資本與公積金，在安定期間的各年度，均僅及戰前之一半，而一九二八年之銀行資本及公積金之合計，尚不及其所負債務十二分之一。由此可知銀行之巨大勢力，非存於自己的資本，而是存於其由借入資本對產業所行的支配。其債務隨其勢力而增

大，德國國民之貯蓄基礎既甚薄弱，而德國銀行所借入之龐大債務，當然要仰給於外國。在一九二八年，柏林五大銀行的外國債務，竟佔其全預備金的百分之四三。銀行資本將近一半由外國供給，已經是德國金融上之一大缺陷，況且

第三，德國主要是借入短期資本，以供給生產信用哩！由一九二六年，德國向外國融通之短期信用，計共四一萬萬馬克，翌年增至六六萬萬，延及一九二九年，竟增至一一七萬萬馬克，皆係短期外國信用。此種短期信用，因係由擁有巨大銀行資本之外國銀行所供給，其利率甚高，並且德國借入之短期外國信用，內中還有一大部分是經過倫敦金融家之中介，而由巴黎或荷蘭轉借而來，故由德國銀行所支配的德國國民經濟，實受到兩三重之掙取，一般國民經濟困蹶，勢將不免反過來影響金融資本。不但如此，短期外國信用，是最不穩定的。國際間某一部分金融發生破綻，此種不穩定的外國短期信用，立即會引起動搖的收回資本現象；不幸，德國銀行資本的投資形態，除一大部分義務的凝結於政府公債中以外，其餘就是在合理化的場面下，凝結於工農業之固定設備中。工農業上之生產過剩情形，或其

產品之市場窄狹情形，前面已經講過了。但我們講過的，還是就其對外貿易之輸出方面立論，若將輸出與輸入一加比量，則更可顯示德國金融資本深入工農生產事業之危機。

德國之對外貿易（單位百萬馬克）

	輸 出	輸 入	差 額
一九二五年	八、七九八	一一、三六一	(一)三、五六四
一九二六年	九、七八三	一〇、〇〇一	(一) 二一八
一九二七年	一〇、二二二	一四、二二八	(一)四、〇〇六
一九二八年	一一、三六七	一四、〇五一	(一)二、六八四
一九二九年	一二、六六三	一三、四四七	(一) 七八三
一九三〇年	一一、三三八	一〇、三九三	(+) 九三五

除了一九三〇年因輸入激減而表示些許的出超外，其餘都是入超，即都要資金輸出國外。德國對國外是負有龐大的債務與賠款負擔的，其對外貿易又復一味入超，故德國金融資本上的漏洞，完全是靠借外債來彌縫，換言之，就是德國金融的安全，完全要依存於外國金

融的安全，及其與借資國之政治關係的協調，這兩個前提條件一旦發生問題，德國金融就會陷於破局的絕地。而事實的邏輯正是如此。

早在一九二九年之秋，誇稱「永遠繁榮」之世界資本主義王國——北美合衆國，首先由交易所的恐慌，爲資本主義第三期開一序幕。在此種恐慌爆發的場面下，構成整個資本主義連鎖之最弱一環的德國經濟，乃從種種方面受到極其不利的影響。例如美國金融上既暴露破綻，牠馬上就對國外停止借款，這對於靠外債——特別是靠美國外債——維持其周轉活動的德國金融，實爲非同小可的打擊。況且，以美國資力的雄厚，尙釀成恐慌現象，對德國融通資金者，自然會神經過敏，而忙於收回其對德的短期借款，同時德國國內的資金，亦殆難免不預先尋找穩固場所；而各國在此情形下，爲穩定本國金融所施的高銀行利率政策，尤足以促使德國短期外債的收回與內國資金的逃避。單就前者而論，在一九三〇年，其短期外債已由一九二九年之一一七萬萬減落至一〇三萬萬。非經常增加不可的外債，竟被提四十餘萬萬之鉅，而同年由楊格計畫規定的十八萬萬以上的賠款，乃至長短

期積累的外國借款利息，亦非支付不可。在這種金融緊迫的情形下，與德國有密切關聯之奧國最大銀行即信用所（Kredit-Anstalt），忽然在一九三〇年度的決算上，表露非常大的缺損。這對於德國之內資逃避與外資收回，發生了莫大的促進影響。一九三一年五月，聳動世界聽聞的德、奧關稅同盟成立；德、奧兩國攜手，在法國是極度感到不安的。法國曾經直接、間接借與了德國鉅額的短期借款，這時牠當然要發揮其金融上的威力，予德國以懲創。自是德國資金愈益向外流動，以致演成金融上不可收拾的破局。

同年六月五日至十五日的十日間，德國國家銀行之金保有額，竟失去五萬三千四百四十萬馬克，即正貨準備額，由百分的五九·二激減到百分之四八·一。延至六月十七日，國家銀行之金及匯兌之喪失，居然突破十萬萬馬克。為挽救此種危機，興登堡大總統乃向美國胡佛（Hoover）大總統電訴德國破產的危局。同月二十日，胡佛發表賠款及戰債延期一年的宣言，一時曾使德國金融界驚喜若狂，即世界一流政治家如麥克唐納之流，亦高嚷「胡佛景氣。」然短短一年期間的附有條件的賠款支付的延緩，那對於德國固定資本

的過剩問題，對於其商品市場狹窄問題，乃至對於德國金融資本之根本缺陷問題，究不能有所期待，所以，延至七月六日，民間外資之收回，約達十萬萬馬克，而國家銀行準備金的喪失，竟及十五萬萬馬克，法定準備金，激減到百分之四十的程度。爲防止外資收回與內資逃亡，一方面發布確保經濟之大總統令，一方面則由國家銀行總裁親到倫敦巴黎作五千萬鎊之借款活動。當這種活動宣告失敗，外國債權者乃紛向國家銀行收回其債權，至七月十一日，同行之貸方計算，竟一舉而喪失一萬萬馬克。由是金融危機爆發。次日雖爲星期日，柏林交易所仍不能不迫而召集緊急理事會，決定交易所停開兩日，此後又決定繼續停開一週。就在交易所停閉的當中，支配德國產業三分之一，且在全國主要都市擁有六十二支店之塔拿信託銀行亦宣布停業。此種巨大銀行沒落，致德國全般信用發生無可彌縫之破綻。由是，政府發布緊急令，禁令向該行提起請求支付的訴訟。同時並命令全國金銀機關，在十四十五兩日概行休業。德國全國之金融機能，至是乃完全停止活動。此後雖接一連三發布緊急命令，如停止一般支付，禁止匯兌買賣，並取締新聞雜誌關於助長國民不安之記事的

揭載，然此等強心注射手術，只能使病體暫時表示昏迷假眠的平靜，而其致命的患處，則日見其沉重。

在金融恐慌壓迫下，工業生產一般減退。固定資本利用之比率，竟由一九三一年七月之百分之四八·六，減至十一月之百分之四〇·三。其結果，失業大增，在同年八月之失業人數為四百二十萬，至十二月則增至五百七十萬，幾及工資勞動者總數二千一百萬之三分之一。產業全般萎縮，國家財政收入已大形減退，同時其失業救濟費用，又續有增加，致財政困難日甚一日，而短期資本停付協定與胡佛延緩賠款戰債一年的期限，轉瞬（一九三二年二三月）即將屆滿。在此經濟萬分危難的局面之下，德國資產階級對於其御用的政府機關，究作怎樣的期待呢？而後者又將怎樣完成其任務呢？其實，經濟之實質變了，經濟上之政治要求亦隨之改變，早在經濟發生破綻的一九二九年，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權，不已經是在逐漸改變其本質麼？

三 由經濟危機到政治危機

在所謂經濟安定期的德國政治，確曾在民主議會制的形式下，保持了幾年的小康局面。擁護議會制度的黨派，爲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及民主黨，就中社會民主黨常在議會中擁有大多數的議席。在政府內閣的更迭上，雖然祇擁有少數議席的黨派，也曾出組內閣，但那種內閣往往總不免因社會民主黨的反對，而無法繼續維持。故事實上，社會民主黨成了德國民主議會制的臺柱。社會民主黨勢力的盛衰，遂無形決定了德國議會制度之命運。

社會民主黨在韋瑪憲法制定以後，一方面儘管是和其他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忠實的曲盡其對資產階級所賦與的使命，但同時却仍宣言是代表無產勞動大眾的利益。這種兩面討好主義，在資本主義安定期間，雖然不妨根據所謂勞資協調理論，圓滑運行，並賴以博取兩方面選民之擁護。但一到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破綻，即勞資利害關係發生無可調解之衝突時，這自命爲代表勞動大眾利益之政黨，遂逐漸顯出其本來的面目，而大大失去勞動

大眾的同情。結局，這失去了勞動大眾擁護的社會民主黨，同時，其本身亦相因而失去了可供資產階級利用的功能，由是在勞動大眾固視之爲「內奸」，而在資產階級亦棄之如敝屣。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在這種轉變下沒落的，德國議會制度亦是在這種轉變下瓦解的。

在事實上則是依着以次的順序而展開。

德國合理化運動在一九二八年已經充分暴露了破綻，這是我在前面講過的。合理化之直接惡果，即是造出大批的失業者，使國家救濟失業的負擔加重，使生產品銷售市場益形窄狹。市場窄狹，當然會由生產過剩，生產限制，而阻止剩餘利潤或資本的蓄積。資本蓄積爲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之前提條件，這種前提條件發生問題，當爲德國資本家階級之致命打擊。加之，外債的積累，賠款的負擔，國內資本的缺乏，均於資本蓄積有莫大的障礙；由是，益加增大資本家階級之顧慮，使他們感到：加強獨占活動，加強合理化活動，固爲他們自己必須採行的救濟步驟，但同時還不能不求政府斷行有利於他們的社會政策、賦稅政策。所以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之德意志全國工業同盟例會席上，查本家對於政府之優柔

寡斷的態度，會多所非難，他們都認為「無力的政治，類於無樂器的演奏。」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柏林召集之德意志全國工業同盟之臨時會議上，他們更力言德國財政經濟之危機，不容掩飾，並敦促政府速籌有效的救濟方策。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二日，身任內閣總理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米勒（Herman Müller）氏，曾把他奉承資本家意旨作成的大眾稅增加案，擱進議會，作以次的聲明：「我們確信採用楊格計畫之一結果，就是向着安定的堅實的情勢之復歸；特這種復歸，一定要在遠大的企圖之下，從事財政經濟的改革，始有可能……德國政府重復聲明：德國的經濟，要求切實解除其負擔，並要求從速解除其負擔。資本的蓄積，不能不予以促進；政府的支出，不能不在可能範圍內，勇敢的加以節縮……」

這所謂「財政經濟改革」的「大企圖」，當然是指着「增進」資本蓄積，「節縮」政府支出（按即失業救濟稅等，非社會民主黨所極力反對的官吏薪金）這對於前面資本家在德意志全國工業同盟會議席上所宣示的意旨，恰好是一種「如響斯應」的回答。

然在他的「勇敢」節縮政策尙未見諸實行以前，以他爲首班的內閣，終於在七萬萬以上之財政赤字之前，自行瓦解了。

三月二十七日，中央黨之布魯甯(Bruning)繼米勒出組內閣。布魯甯內閣的財政經濟改革計畫，大體係蹈襲米勒內閣的原案，不過更表現「勇敢」一點。照此案的規定，啤酒稅、販賣稅、清涼飲料稅等等大衆稅之增加與新設，計可增收四萬六千八百萬馬克。然在實際還不只此數。據釀酒業者的報告，啤酒稅表面雖祇增加百分之七五，而實際的增加可以轉嫁於大衆方面者，將近達到五倍六倍。對大衆的課稅儘管「勇敢」增加，同時對所有者的負擔，則「勇敢」縮減。農企業者八千五百萬以上之永敦銀行債務，工業上之七千萬馬克債務，統行鈎銷。對於附有確定利息證券之資本收益稅廢止，資本流通稅減輕。僅此數項，已貢獻所有者一萬三千萬馬克。此外布魯甯內閣並還保證在一九三一年以前，輕減所有者稅六萬萬馬克。

然而這還是布魯甯內閣的第一部傑作。在同年六月，又有新的賦稅案提出。此案除由

煙草稅等增加收入四萬零八百萬外，同時還對失業保險給付額縮減一萬七千萬馬克，對疾病保險縮減二萬萬馬克，對疾病金庫與醫師組合之支出縮減五萬萬馬克。

布魯甯氏的這種「勇敢」的非常手段，當爲資本家階級所大大激賞，但在議會中如沒有擁有最多數議席之社會民主黨的贊助，決不容易見諸實行。德國是一個多黨多派的國家，議會中贊成布魯甯之財政經濟改革案的黨派，只有布魯甯自己所屬的中央黨，其餘都表示反對。然布魯甯組閣之始，即預知數黨聯立制的議會政治，不宜於當機立斷，打破危難局面，所以他聲明要使新內閣變爲「行動的政府」，換言之，就是獨斷獨行的獨裁政府；他的打算，是曲解並活用韋瑪憲法第四十八條，即政府不能由議會得到信任時，得依大總統之名，斷行其政策，此即通常所謂「大總統內閣」。這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大總統內閣」實現，即無異議會制度的沒落。議會制度沒落，在議會中擁有最多數議席的社會民主黨，自受莫大的打擊，但要贊成政府的政策（即前述諸改革案），勢必失却勞動大眾的同情，在此種進退維谷的情形下，同黨終於對政府採取所謂「寬容政策」，冀以挽回議

會政治的末運。然而，議會對於政府愈遷就，即愈失却了議會政治的精神，愈加促成布魯甯的專斷。

不但如此，社會民主黨「助桀為虐」出賣民衆利益的結果，不久即在同年（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之總選舉中，完全反映出來。社會民主黨在此次總選舉中，雖然仍佔有第一黨的地位，但其得票數與議席數均大減特減。除政府與黨即中央黨僅增獲數席外，其餘一切中間資產階級黨派，皆告敗北，唯極右翼之國家社會黨及極左翼之共產黨，則均顯示飛躍的發展。計各黨派在此次選舉中之勢力消長情形如次：

	得 票 數	增	減	議 席	增 減
國家社會黨	七、六四〇、二〇〇	增五、五九二、〇〇〇		一〇七	減九五
德國國權黨	二、四五九、〇〇〇	減 一九二、〇〇〇		四一	減三一
地主 黨	八六七、〇〇〇	減 一三七、〇〇〇		四一	減 四
保守國民黨	三一四、〇〇〇			五	—

經濟黨	一,三八〇,〇〇〇	減	一七,〇〇〇	三三	—
德國國民黨	一,六五八,〇〇〇	減	一,〇二一,〇〇〇	三〇	減一五
中央黨	四,一二九,〇〇〇	增	五三一,〇〇〇	六八	增六
巴陽國民黨	一,〇五九,〇〇〇	增	五三一,〇〇〇	一九	增三
國權黨	一,三二三,〇〇〇	減	一八二,〇〇〇	二〇	減五
社民民主黨	八,五七三,〇〇〇	減	五七九,〇〇〇	一四三	減一〇
共產黨	四,五九一,〇〇〇	增	一,三二七,〇〇〇	七七	增二三
其他	一,九五三,〇〇〇	—	—	三一	—

這種極右極左兩翼勢力之飛躍發展，足徵德國社會政治經濟已臨到極度動搖不安的危險狀況中。但左翼勢力的伸張，在布魯甯內閣並不十分感到狼狽，因為他在防阻左翼猛烈活動的場面下，不但在在可以取得極右派及包括有社會民主黨在內之中間派的支持，同時還可藉此造成其進一步獨裁的局面。在十月十八日之新議會中，布魯甯內閣果然以三百一十八票對二百三十六票取得了議會的信用。

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中，德國經濟狀況愈形惡化，為資本家所屬望的有力的「行動政府」，又該進行怎樣的斷然處置呢？自然哪！布魯寧內閣依舊是照着原有的財政經濟改革方針，更「勇敢」的推進一步。同年十二月初，政府對於一九三一年度的預算案作成。這個新預算收入與一九三〇年的收入，在數字上表現了以次的差異：即大衆稅在一九三〇年之全收入中占百分之五八，照一九三一年的預算，則占百分之六二，同時所有者稅則由百分之二六，減至百分之二四。然稅收上之一增一減，究無多大幫助，所以與此預算同時向議會提出的，還有社會政策費之削減案，此案係以失業保險費用之削減為中心，而傍及戰爭犧牲者津貼及住宅津貼等，其節約額計達十六萬九千三百餘萬，若把同月一日由緊急令宣布停止的住宅建築扶助金五萬二千九百餘萬加算起來，此節約費用，實達到二十二萬萬以上的巨額。

對於「大總統內閣」的這種新預算與這種社會政策費用的節縮案，除了共產黨表示猛烈攻擊外，以代表勞動大衆利益相號召的國家社會黨乃至社會民主黨，均投票贊成。

延至一九三一年二月，極右翼之國家社會黨及國權黨，在議會會議進行中，半途退出。此擁有一百四十八名議員之兩黨退出，議會雖不免陷於畸形狀態，然社會民主黨猶希望與共產黨合作，以期造成形式上之左翼多數，勉維殘局。迨共產黨表示不能與社會民主黨攜手，且予以痛烈之攻擊，於是議會益弄成七分八裂形勢，使布魯甯覺得有進一步行使其『大總統內閣』手段之必要。然當時社會民主黨如能改變其對政府之『寬容政策』，布魯甯亦必有所憚而不敢爲，至少，亦必不能暢所欲言。無奈該黨一誤再誤，以爲寬容政府，即是阻止其趨向獨裁，即是對於議會政治的防衛。而不知在此種軟弱的防衛過程當中，布魯甯內閣在事實上已確立其『準獨裁』的局面。議會開至尙未滿期的三月二十六日，布魯甯又用大總統之名，發布緊急命令，使議會延休至十月十三日。議會休會後三日，布魯甯又發布對於結社集會及新聞壓制的緊急令。布魯甯內閣的這些專斷舉動，社會民主黨都在牠的寬容政策下默認了。誠如一位左翼社會民主黨黨員所說：『以議會而像德國永久患着神經病的議會主義這樣，一味演着無抵抗的角色，恐怕就在意大利亦不能見到，……把布魯甯』

甯的獨裁，看爲些細的罪過，在十二月（註）馬馬虎虎的接受其高度資本主義的綱領，那就儼然是在對希特拉的獨裁綱領，作遁逃的準備。如其說希特拉的獨裁爲大禍，這種大禍，不妨說是由十二月形成。所謂法西斯主義，就是因爲我們的弱點而成長起來。『社會民主黨的自己招供，誠不失爲爽直，但希特拉一流的法西主義，與其說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的弱點而成長起來，却倒不如說是由於資本主義第三期之要求而成長起來。』

由布魯甯所導來的那種獨裁制，不但在形式上與國家社會黨所主張的獨裁制相接近，且其內容與性質，亦無多大差異，特程度不同罷了。大總統內閣由布魯甯所創始，至巴本（Von Papen）而予以強化，延至斯萊軛（Schneicher）將軍，亦係依樣葫蘆。所以此後希特拉黨所成就的獨裁體制，實係建樹在布魯甯輩所建立的基礎之上，而爲其繼續。

（註）這裏所說的十二月，係指着前述布魯甯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所提出的財政經濟改革案。

第七章 希特拉政權之確立

一 獨占資本與希特拉

經過布魯寧所操縱之「大總統內閣」的幾度大刀闊斧的財政經濟改革，德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實際左右德國政權的大資本家們，得到了幾種經驗：第一，過去擁護他們利益的議會制度，即他們自己實行參加的議會制度，在萬分緊迫的場合，並不一定可以順利的供他們驅使；第二，民主議會制度在某種情形下，固可擁護他們的利益，其他非民主制度甚或反民主制度，亦未始不可以擁護他們的利益。然而使他們得到這種經驗的事實，同時却更加强了他們由此經驗所形成的信念或傾向。

德國資本主義自實施合理化政策，而加速的進入第三期的階段以後，其經濟上政治上之岌岌不可終日的情形，我在前面已經大體講過了。布魯寧內閣純為資產階級利益所

斷行的幾種財政案，大衆稅增加案，社會政策費用節省案，雖然在某種限度緩和了資產階級的困難，但勞動大衆的荷包，如以政治方式多搜括一分，同時就不免以經濟方式少搜括一分。結局於資產階級固毫無裨補，而於無產勞動大衆乃至一般中小資產階級，却增加了不少困厄，且由是激起了他們階級情緒的昂奮，致予資本家社會（即由資本家勢力支配的社會）以莫大的威脅。在此種情勢下，德國資產階級特別是那些獨占的大資本家們，顯然有以次幾種要求：第一，剷除或鎮壓無產勞動階級的勢力；第二，緩和中小資產階級的惡感；第三，解除凡爾賽和約的束縛。

關於這三種要求的最後一種要求，德國資產階級是存着「或有可能」的漠然希望，因為他們頗知道在當前的國際局面下，要想完全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勢所難能。而且屢作這種主張的，是強調東向政策，想與蘇俄搗手的極左翼社會主義者，這與強調西向政策，企圖與協約國妥協的資產階級的原意本來不同。不過，當德國資產階級感到經濟恐慌無法應付的時候，他們至少總期望把和約所加於德國的難堪重負減輕。

在這種重負無法減輕，以及德國對外貿易市場無法擴張的當中，他們要自救，要挽救其經濟厄運，勢不能不把他們在國家財政上課加於他們的賦稅重擔，轉嫁於中小資產階級方面。而且，他們在恐慌中，愈要行使集中的獨占，就愈不免要把中小商工業經營，乃至農業上之小農業經營，逼上破毀的旅程。中小資產階級在這種毀落的過程中，當然要對資產階級，懷抱憤怨不平的反感。中小資產階級本來是無確定立場，而徘徊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一到這種關頭，他們自不免要想投入無產階級的陣營，而大大增加資產階級死對頭的勢。所以緩和中小資產階級的惡感，亦成爲資本家階級的相當重要要求。

然而把以上這兩種要求，與其第一要求即剷除或鎮壓無產勞動階級勢力的要求，比較起來，那却祇佔着次要的地位。由羅貝爾圖（Roberto）、拉薩爾、馬克斯、昂格斯以來，被稱爲社會主義發源地的德國的民衆，多少是感受了一些不大安分的思想，阻止他們這種思想橫溢起來的堤防，大體上雖是由於德國經濟狀況的逐漸改善，但畢斯馬克所施行的社會政策，實亦具有莫大的防微杜漸作用。在大戰後數年間，德國一般勞苦民衆曾遭遇着

非常的困境，他們差不多不能自制了。但由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的數十次的暴動，終不會在德國確立起蘇維埃的政權。這原因，自然要從多方面來解釋，但俾斯麥所遺下的社會政策，即以失業保險與疾病救濟等等為中心的社會政策，究還不失為範圍人心的一種催眠法寶。第三期恐慌發生後，不就在高度施行合理化的安定期中，勞動階級所受的幾重打擊，我在前面已經解說過了。然這時一大部分的失業勞動者，還可賴這點為左翼社會主義斥為「騙局」的社會政策的恩惠，以苟延其殘喘。自布魯甯「勇敢」的削減社會政策費用，並重課大眾賦稅後，這重壓在最下層的勞動階級，實已不能隱忍吞下其飢餓的怒火。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五日之柏林金屬工人大罷工運動當中，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之魯爾礦業工人大罷工運動當中，他們已給了德國資產階級一種非同小可的威脅。共產黨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的總選舉中，居然增加其議席至七十七名之多，那說明了勞動階級之情緒，及勞動大眾勢力之昂揚。資本家階級在此種情勢下，一方面知道其所利用的議會，漸漸增添了反對其利益的敵人，而一向在議會中佔有中心勢力的社會民主黨，又不足以

把握或阻制勞動階級勢力的擡頭。他們對於其以前拚命爭取的議會政治，不但失望，而且表示厭煩了。他們要求一種能保障其利益的新政治勢力。這種勢力，主要固在爲其壓伏像野獸般的勞動大眾的擡頭，同時還得向外對凡爾賽體系鬥爭，對內能把握住中小資產階級。如其說德國獨占資本或大資本家們當時的問題，對內急於對外，他們就是要求擺成一個全國一致對付勞動階級的陣勢，或者更好是能把中小資產階級乃至無產勞動階級，都拉到他們資產階級的旗下來。

在實現這種要求的過程當中，他們自己也許不免要作否定議會政治的打算，但在維護『社會勢力』急於維護『政治勢力』的時候，在維護『財產』急於維護『政權』的時候，他們也樂得退居暗中發縱指示的地位，而把正面衝鋒陷陣責任，委諸保鏢的能手。在一九二九年特別在一九三〇年第五次總選舉以後，他們就在開始物色這種能手。『時勢造英雄』，亞朶爾夫·希特拉（Adolf Hitler）帶着時代使命登場了。

亞朶爾夫·希特拉是奧大利一個小農（後曾充當稅關小吏）的兒子，他的出身的

微賤，使他此後對勞動大眾的演說當中，頻添了不少精彩。他在身世上最感不快的事，就是他的母親是一位不會講德意志語的異種人，「據倫吉耶爾（Lengyel）推定為波希米亞人」，這對於他的「民族純血」主張，為一種致命的事實的反駁。他雖在標榜「不講謊語」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對此一筆略過不提，藉資掩飾，然其隱痛可知也。

在大戰告終，德國帝制推翻的一九一八年，他還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兵士，那時他引以自榮自豪的，則不過是佩有在大戰中受過兩次傷的十字勳章罷了。一九一九年九月，德國政局頗不安定，國內政治黨派林立，希特拉至是始加入一個稱為「德國勞動黨」（Deutscher Arbeiterpartei）的小政治團體中，而開始其政治鬥爭的生活。至同年十二月，因黨員略有增加，乃對於黨之組織加以確定。經多番討論結果，首先改黨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於「德國勞動黨」之上，復冠以「國家社會主義」字樣，蓋欲以「國家主義」為基礎，而實現「社會主義」之目的。同黨組成份子，大都為退伍軍人，他們一方面痛感國家的破碎，同時又焦心本身生活

之壓迫，故褊狹的愛國主義思想與奇幻的社會主義思想，不期然而驅迫其作政治上之冒險企圖。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這所謂「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以下簡稱國社黨）最初召開民衆大會，宣布其二十五條綱領。此等綱領包羅萬狀而大體則不外由前述兩種思想交織之花紋。反國際主義，反馬克斯主義，反猶太人，反凡爾賽體系，爲前一種思想的發露；反金融資本，反高利貸，反托拉斯，爲後一種思想的發露，至若這兩種思想有何等矛盾，他們通未計及，而其行動，則又似乎完全不受黨綱的限制。

國社黨在宣布黨綱以後，不到兩月，前述（見第四章第一節）開蒲政變發生。開蒲政變之中心人物爲開蒲，他是一位與魯敦道夫將軍有勾結的極反動的國粹主義者，他主張推翻社會民主黨之共和政治局面，而代以帝制。開蒲事變發動，希特拉一派的國社黨，即在德國南部敏亨（Memmen）一帶爲其作極熱烈之應援宣傳；開蒲後來雖告失敗，希特拉與舊軍國主義巨頭魯敦道夫將軍之政治默契與連繫，不能不說是得力於這次「應援宣傳」之功。

一九二三年十月前後，德國因法比聯軍佔據魯爾與貨幣經濟瓦解，全國頓呈混亂局面。十月二十六日萊因臨時共和政府樹立，其風聲波及南部，遂有希特拉與魯敦道夫將軍於十一月八日在敏亨樹立國民政府（National Regierung）的暴動。這暴動曾被譏嘲爲『酒窖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Bierkeller），在次日就被警察一網打盡，希特拉以叛逆罪判處監禁。希特拉入獄後，國社黨乃在『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eipartei）名義下，與反動的封建的胡根堡（Hugenberg）所領導之國權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相結托，至一九二五年希特拉監禁期滿出獄，始謀國社黨的再建。

國社黨在過去數年間之政治活動，大約不出兩個方式：一是聯絡軍國主義的封建的勢力；一是從事野戰式的暴動。希特拉出獄以後，國社黨的這兩種方式都改變了，對於後者，他漸漸採取合法的選舉鬥爭方式，而對於前者，則力圖建立起民衆的基礎。這種政治活動方式的轉變，雖然是使他與獨占資本或大資本家階級接近的一大關鍵，但在經濟安定期

間，即在德國勞動階級尚不會給予他們以難堪的麻煩的期間，他們還未感到需要這樣一個保鏢的能力，同時希特拉也還未造成保鏢能手的資格。

二 國社黨勢力之膨脹

希特拉所領導的國社黨的勢力膨脹，係與勞動大眾之勢力膨脹相平行，或者說前者的發展是以後者發展為必要條件。因為沒有猛虎，是不會產生打虎的勇敢獵夫的。

由一九三〇年至希特拉秉政的一九三三年初，德國政治危機是在不絕伴着經濟危機而益形擴展。資本家階級在維護自己利益的限度內，其唯一有效的恐慌克服方法，就是立意把恐慌的犧牲，轉嫁於勞動階級。然而，前面講過，要順利進行這種一味犧牲勞動階級的政策，一方面固須利用一個能夠鎮壓勞動階級的勢力，同時還須擺開議會政治之麻煩的掣肘。以『行動政府』相標榜的布魯甯「大總統內閣」雖然「勇敢」的成就了幾件差可人意的『革改』事體，但他不但不能完全滿足當時資本家階級的要求，且更使資本

家階級覺得有另行物色更勇敢更有能力之政治勢力之必要；事實上，就在布魯甯內閣推行財政上之斷然改革的當中，資本家階級已早認識了希特拉所領導的國社黨的真正態度。他們知道，希特拉及其黨徒們雖高呼反對大資本，反對金融資本，反對不勞而獲，都是口號，而其反對國際主義，反對馬克斯主義，反對議會制度，反對猶太人，則比較確實。而況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八日之柏林金屬工人罷工運動，及翌年一月二日之魯爾礦工罷工運動當中，希特拉已經明白表示擁護資方利益哩！魯爾大罷工運動發動後，法國不允德國開正式軍隊去鎮壓暴動，希特拉不是自告奮勇，願以其御用的突擊隊（Sturm Abteilung）開去靖難麼？

希特拉與獨占資本家的這種曖昧關係，一位左翼社會民主黨的議員，曾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社會民主黨大會中，作過以次的說明：「獨占資本主義已經知道牠的目的，不會由民主主義達到，而去依賴勞動階級之敵「國社黨」了。」然而敵黨的意見，也許不盡實在罷，現在不妨看看資本家階級自己是怎樣解說。在同年六月三日，在代表萊因

蘭·威斯特伐倫重工業者利益的「萊因蘭·威斯特伐倫共同經濟利益保全同盟」的會議中，海休鋼鐵工業股份公司常務董事，曾有以次一段演說：「以議會政治的方法，把我們與勞動階級對等看待，我們不能不表示反對。誠然，那聽說是如何美滿的家長制的組織呵……勞動階級的傳統想法，總以為在民主主義的國家組織上取得政治的代表者，是一件不得已的災難。然而，從國家的見地看來，早已無此必要了。因為在「反動的」工業者及其同志們，已有「有能的國社黨」為其好好的守備隊哩！」

這種議論明目張膽的出自重工業資本家口中，在多方想獲得勞動階級之同情的國社黨徒看來，誠未免覺得過於率直露骨了，但知遇之感，却不由得不更加賣力啊！

然而一般人對於獨占資本家的賞識國社黨，總不免發生以次的疑問：即他們為什麼不維護布魯甯、巴本，而必要維護希特拉呢？這是頗容易解釋的。布魯甯、巴本都有主張獨裁和擁護資本家利益的決心，但他們却缺乏實現那種決心的社會基礎力量。然則希特拉的社會基礎力量是什麼呢？簡言之，就是擁護他的一般中小資產階級乃至一部分無產階級，

其中包括有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官吏、職員、年金受領者、小利息收入者、農村工人和一種小部分失業的年青的產業工人。換言之，希特拉的羣衆的來源，主要是小資產階級和深受小資產階級影響的半無產階級，受小資產階級影響特別大的一部份工人階級（農村工人、家庭僱員）以及流氓無產階級。希特拉及其黨羽所擁護的是資本家階級，而擁護他們的主要羣衆，則是與資產階級利害相衝突的中小資產階級。把中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聯繫起來，那誠然是大資本家們的願望，但希特拉及其黨羽們究竟是怎樣成就這種任務哩！論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把希特拉成功的三大要素加以解述。那三大要素就是煽動的宣傳力、武力及金力。

就第一點煽動的宣傳而論，那是希特拉認爲最重要的得意之作。在我的奮鬥中，他曾說：『我加入德國勞動黨以後，馬上即負宣傳指揮的責任。我對於宣傳這個部門，認爲最關重要。』他又說：『如其運動的目的，在破壞舊世界，而建設新世界去代替，那指導者就不能不熟知以次的根本命題，即一切運動，須先把那些活動於運動中的人們，分爲兩大羣，一爲

「追隨者」(Anhänger) 爲黨員宣傳的任務，就在獲得追隨者，而組織的任務，則在募集黨員。此外他還說：「宣傳所能鼓勵的人數愈多，從事實際鬥爭之組織愈堅固，則精神的勝利，愈有提早之可能。」誠如希特拉所云，宣傳爲獲得「追隨者」和爭取「精神勝利」之唯一有效方法，然則他與其黨羽究竟是怎樣進行宣傳咧！我們姑不論其雜多的宣傳工具，只一述其宣傳原則。國社黨的黨綱是多方面的。牠的宣傳目的，既在取得「精神勝利」，故對於各社會階層，都盡量予以精神的滿足。對於愛國主義者，提示以軍國主義時代之強盛德意志的再興；對於無產勞動者，提示以先公益後私利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的意識；對於中產階級，極力保證其社會的及經濟的地位之安定；對於國粹主義者高呼排斥猶太人，以滿足其人種的偏見；對於農業者，特爲制定農本主義的政策，使其懷抱莫大的昭蘇希望。至於大資本家階級，則更從反馬克斯主義與撲滅共產黨方面，以證示其忠誠。八面玲瓏之高與卑，在異常感到動搖不定的德國社會中，當然不難獲得多數的「追隨者」。但希特拉之基礎羣衆，究還是那些動搖或徬徨於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中等社會階層。

他們在政治上無確定立場，而同時在經濟上又遭受多方之壓迫與打擊，在沒落過程中的苦悶，使他們不能不關懷於政治。國社黨一方面巧妙的予以精神的滿足，同時又保證其困苦的生活，將由該黨的勝利而改進，他們當然願意投在國社黨的旗下。

不過，煽動宣傳雖為國社黨獲得羣衆的有效方法，但這種方法能够順利施行，究還有賴於武力的輔助。因為國社黨在德國開始政治活動的時候，其死對頭共產黨已在全國各地成就了廣泛堅實的組織。國社黨由種種宣傳刊物所發的空頭支票，隨時會碰到其死對頭之破壞其信用的指斥。而且，民衆集會是施行煽動宣傳最好的場合，但他們在這種場合的牢騷與狂叫，更容易受到其死對頭的破壞與妨害。在此種情形下，國社黨之「精神勝利」或成功的第二個要素即是武力大肆活動了。本來德國的政黨裏面，一方面有種種職業團體為其基礎，同時還有直接支持政黨本身的政黨援助團體，以擔當前衛的鬥爭。就社會民主黨說，「全德意志勞動組合同盟」(A. D. G. B. —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 屬於前者，國旗隊 (Reichsbanner) 屬於後者。國社黨之相當於社會民主

黨之「國旗隊」的組織，就是突擊隊 (S. A. — Sturm Abteilung) 與親衛團 (S. S. — Schutz Staffeln)。但國社黨的這種前衛團體的組織，與其他政黨所屬的同類團體，有許多不同的點，就是其組成份子，多為退伍軍人，而其編制則與正式軍隊相類似。在正式軍隊受到了凡爾賽和約限制的情形下，希特拉之黨軍組織是曾經國防軍默許過，甚且加以鼓勵過的，這對於希特拉黨勢力之擴張，實給予了不少方便。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總選舉的時候，其黨軍人數，已達到了十萬左右。黨軍活動結果，其聲勢既壯，而「赤色棍徒」的擾害，又復受到防止；此後對於摧毀左翼右翼政黨之支援團體的工作，差不多都是由其黨軍特別是 S. A. 所一手作成。就在強調煽動宣傳之偉大功能的國社黨要角戈培爾 (Goebbels)，他亦力言彼黨之成功，頗得力於黨軍之組織。

然而煽動宣傳也好，個人軍隊也好，都非有大宗金錢，無從推進。希特拉黨的詳細財政收支狀況，終始未見明文報告。黨員的黨費，街頭巷口邀劫式的募捐，以及開民眾大會的入場金等收入，那不過祇佔有其浩大費用的極有限部分罷了。然則該黨之主要黨費來源，究

在那裏呢？據奧托·發爾特（Otto Wahl）的記載，遠在一九二八年，希特拉即由敏亨地方之大出版業者紡織業者，以及著名的洗染業者和大磨石工業家，取得十萬馬克以上的捐款。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之德國某雜誌中，漢斯·柏特爾極（Hans Betelzen）亦發表希特拉由工業資本家，舊帝政時代之貴族，和其他財閥，取得數百萬馬克之捐款。其實，萊因柏林等地之產業資本家，愛森之重工業者和鑛業聯盟，漢堡之合同製鋼工廠主，乃至全國的大貴族大地主們，殆莫不對希特拉提供過鉅額資金。在大地主之中，單是易北河流域東部一帶，就曾提供過二千萬馬克。此種事實，連希特拉之左右手的黨羽如奧托·希特拉塞（Otto Thrause）亦不否認。但他不過祇說希特拉由萊因重工業家們所通融的運動費，在一九三二年末，已達一千二百萬馬克罷了。此外，在金錢籌集上，與德國許多重工業家及舊貴族有來往的胡根堡氏，實有莫大的助力；說者且謂希特拉正式充當大資本家們的警衛，還是由於胡根堡的先容哩。事實究竟如此，雖尚存有幾分疑問，但國社黨運動費用之主要來源，是出自大資本家大地主貴族，那却是千真萬確的。

希特拉黨有如此可靠的財源，無怪其在更充實的武力與煽動力下『所能鼓動的人數愈多』，其『精神的勝利』亦『愈有提早的可能』了。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第四次總選舉中，社黨所獲得之議席僅爲十二席，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第五次總選舉中，增至百零七席，至一九三二年七月第六次總選舉之成績，且增加至二百三十席，然當同年十一月之第七次總選舉，則復降爲一百九十六席。迨至一九三三年第八次總選舉，更突增至二百八十八席。國社黨這種『精神的勝利』實令人不勝驚愕；然而試一分析此種『精神勝利』之物質基礎，則又恍然而悟其無可駭異了。

在第七次總選舉以後，國社黨開始實質的取得了德國的政權。政權到了手，其第一步工作還不在對民衆履行其諾言，而在要求自我政權之強化。

三 議會政治沒落與統一國家出現

原來希特拉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第六次總選舉大勝之後，他即與興登堡大總統作政

治的折衝。他向大總統要求「政府之指導權及全國家權力之委任。」大總統不予承認，結局仍由巴本繼續維持內閣。同年十一月巴本內閣崩潰，希特拉與大總統之間，又作同一的政治折衝；當時國社黨已由第七次總選舉（同年九月）失去其議會中絕對多數之地位，故奧登堡對於希特拉之同一要求，更有反對的理由。在此第二度宣告政治折衝破裂的當中，以「社會的將軍」(der Soziale General) 自許之斯萊韋(Schneicher)將軍，乃出組內閣。這位「社會的將軍」在議會中雖無與黨，且又與共產黨、社會民主黨乃至國社黨之間，不能發現妥協的途徑，但他除國防軍的武力外，還有「國家非常時」理論(Befehl noisands-Theorie)。據此理論，「國家非常時」可以無須取得議會或任何政黨的同意，而以強權厲行獨裁政治。在此種認識下，他於翌年一月二十八日向大總統要求兩種權力：一是解散投不信任案之國會的權力，一是防衛新暴行並長期確保國內和平的權力。在國防軍的聯繫上，奧登堡總統是應當對斯萊韋將軍特予優容的。但本身即為一東普魯士大地主的大總統，却又不便過於放任這位不採行擁護大地主政策的將軍。結局，斯萊韋內閣

崩潰了。

政局動搖不定，極左翼的活動，乃更形猛烈。在此情形下，為獨占資本及舊貴族之衝鋒的巴本與胡根堡一流人物，乃知政局非從速使其安定，並立即喚起國民或國家意識，以期鎮定無產勞動大眾之階級情緒不可，他們由是慫恿希特拉出任國民內閣首班。希特拉及其黨羽自前兩次政治折衝失敗，及第七次總選舉喪失數十名議席後，其意興已不若前此之激昂，而其對此後總選舉之勝算亦頗無把握。況政局愈成僵局，即愈會予極左翼以活動之機會，而使其被擁護之大資本家感到不快的驚惶。在這多方面的計算上，希特拉軟化，右翼聯合內閣成立了。

在這個聯立內閣中，國社黨祇佔有三席。巴本以副總理兼普魯士總監，而胡根堡則以經濟部長兼食糧與農林部長。事實上，聯立的國民內閣，是以希特拉巴本及胡根堡為三大支柱。所以希特拉於就任內閣總理的一月三十日，曾對其黨羽作以次的演說：『我黨同志諸君！我們經過德國歷史上無與比倫的十四年的政治奮鬥，現在算達到一大政治成果。大

總統與登堡任命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即我為德國內閣總理。國民的諸團體與諸黨派，共同為德國的更生，而團結鬥爭。」這所謂「國民的諸團體與諸黨派，」當然含有兩層意義：一是希特拉內閣還是由右翼諸團體黨派的湊合，而並非國社黨一家的天下；一是為德國更生而從事鬥爭，祇有同「國民的」團體黨派相團結，至若那些非國民的左翼諸團體黨派，則不過是我們團結鬥爭的對象。

所以組閣後二日即二月一日，希特拉政府首先解散國會（Reichstag），更於同月六日解散邦議會（Landeslag），同時並依大總統之緊急令，使普魯士之布諾（Braun）政府的行政事務，統委之於當時由國社黨戈林格充當之國統監處理（按布諾為社會民主黨領袖人物，希特拉政府此種處置，蓋不外削奪社會民主黨政權之第一步。）同日又發布對於集會及出版自由之限制令，且對共產黨本部及支部大肆搜查。不但此也，在解散國會的二月一日，這所謂「國民政府」（Die Nationale Regierung）曾發表一篇堂哉皇哉的長『檄文』（Anfruf），昭告國民及友邦。全文計分三章，第一章係把戰後十四年之德國頹廢

歷史，歸罪於馬克斯主義（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第二章係闡述德國國民經濟復興的方針；第三章則係提倡外交關係之親善。關於第二第三兩點，我們以後還有述及的機會；其實希特拉國民政府發布此檄文的主旨，要不外強調第一點。因為這是『國民的』諸團體諸黨派所最齊心努力的。

希特拉對於這造成『德國頹廢歷史』的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並非同時進攻；他是採行各個擊破的策略，首先從消滅前者的勢力入手。二月四日，希特拉師布魯甯的故智，以大總統內閣的形式，發布『關於保護德國國民之大總統令』；據此法令，凡屬示威運動及戶外政治集會概行禁止，新聞及其他出版物停止，以政治為目的之金錢物品的捐助募集禁止。但這諸般限制，究不足以消除共產黨之潛勢力。希特拉知道要對共產黨作澈底的清算，勢不能不找得一個大口實，即舉國對共產黨表示非議的口實。延至同月二十七日，忽有國會議事廳焚燬事件發生；有了這湊巧的理由，政府乃于翌日發布『關於保護國民及國家之大總統令』。據此法令，政府得限制個人一切發表意見的自由，得檢查書信電報電

話，且得於必要時搜查家宅，押收財產。政府根據此法令搜查共產黨本部即李卜克內西廳（Liebknecht Haus）的結果，居然認定該黨有計畫的焚燬國會議事廳的形跡，且發現了他們要在全國發動革命之文件。共產黨的罪狀昭然，於是政府迅速撲滅其新聞，佔據其本部，並逮捕其幹部及百餘名議員。其首領得而曼（Ernst Thälmann）亦於是逮捕入獄。此後國社黨及政府對共產黨之彈壓與干涉，雖惟日不足，但三月十五日總選舉之結果，該黨猶因五百萬選民之擁護，而保有其第三黨的地位。此種勢力，使希特拉政府感到異常狼狽不安，乃進一步在全國各邦作同一之撲滅「赤色匪徒」大活動，自此以後，希特拉政府之隱憂，始在表面上完全消去。

「國民」之勁敵祛除，在其他「國民的諸黨派諸團體」也許覺得於願已足，但希特拉黨不僅視共產黨為敵人，即掛着馬克斯主義招牌，而常開資本主義藥方的社會主義黨，亦因其擁護議會政治，和擁有廣大的勞動羣衆，而早成爲國社黨之次於共產黨的死對頭，所以在共產黨撲滅之後，希特拉即着手清除這個保育於第二國際之下的敵人。社會民主

黨經過數十年的政治活動，其社會地盤比較強固。希特拉雖把對付共產黨的前述兩大總統令，用以對付社會民主黨，停止其新聞，禁止其集會，妨害其選舉，但三月五日總選舉結果，該黨仍有七百餘萬選民的擁護，而保持住其第二黨的地位。前述國旗隊是社會民主黨的唯一支授團體。希特拉知道要消滅社會民主黨，先須剷除其國旗隊。三月中旬，希特拉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散國旗隊。國旗隊解散，為社會民主黨之核心的『全德意志勞動組合同盟』，乃因毫無防衛，而在多方壓迫與誘導的情勢下完全落在國社黨手中了。然這還是五月初間的事。社民黨既無職業團體為基礎，又無支援團體作防衛，而其黨幹部意見叢生，許多負責領袖，且事先逃遁國外，予敵黨以攻擊的口實。延至六月二十二日，希特拉黨以社會黨逃往國外份子，與國內黨員相策應，而共謀不利於國民及國家的舉動為藉口，由是社會民主黨之一切活動，概行停止，由該黨選出的議員，亦停止職務。有六十餘年歷史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至是竟告終結。

造成『德國頹廢歷史』之馬克斯主義諸團體諸黨派肅清以後，希特拉之魔手，漸漸

要向「國民的諸團體諸黨派」活動了。這些團體黨派既都是站在反國際主義反馬克斯主義的「國民的」立場，希特拉又會宣言要與牠們共同爲德國的更生而團結奮鬥，那末，他將怎樣向牠們進攻呢？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得出國社黨戰略的高明了。德國議會中比較有力的右翼政黨，當推中央黨與德國國權黨。中央黨領袖開斯（Lud. Kass）在希特拉組閣之頃，曾與希特拉作政治的折衝；開斯因懷疑希特拉對於韋瑪憲法的態度，而拒絕入閣。在議會擁有七十餘席之中央黨的向背，於政府法案的通過上，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勢力。所以希特拉在摧毀社會民主黨的過程中，即已安排好了對中央黨進攻的陣勢。原來中央黨是以德國南部及萊因等地之舊教勢力爲中心，而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政黨，黨內構成的要素，多爲與舊教有關係之資本家、勞動者、農民以及中等階級。其所屬的職業團體與支援團體，計有基督教勞動組合，加特力教會及其他諸種加特力教團體。希特拉對於中央黨的進攻，首先就是從這些團體入手。他把基督教勞動組合，統一於其新設之「德意志勞動戰線」（Deutsche Arbeitsfront）中，（前述社會民主黨之「全德意志勞動組合同盟」亦

被統一於其中，而其他加特力教會等組織，則由國立教會（Reichskirche）予以劃一之支配。這所謂『國立教會』之表面目標，原不外爲全德意志國民作成一路德派教會。然使全國信仰教義不同之諸宗教，統一於單一之教會，當然不免激起國內各種教派之猛烈反對運動。中央黨當時自謂利用此反政府運動之得計，而不知正墮入希特拉之計中。六月三十日希特拉利用反政府的口實，命令封鎖普魯士之『德國加特力教徒和平同盟』、『十字架隊』、『德國加特力教國民協會』加特力教青年會等等，所有此等團體之書籍與財產，統行沒收。此後，普魯士以外各地之加特力教會機關，都慘遭同一命運。中央黨之根基既拔，當然只好迫而自行解散。七月六日中央黨本部之自動解散宣言發布。前此一日，與該黨攜手而構成其一分派之巴陽國民黨（Bayrische Volkspartei），亦自動解消。

實際上，在中央黨正式宣言解散以前，在國民內閣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德意志國權黨，亦經壽終正寢了。國社黨與國權黨的苟合，其共同目的本在對付共產黨。胡根堡兼任食糧農林部及經濟部，同時又兼國統監（與部長地位相當），其腰包人物即鋼盔團（Stahl-

(helm) 領袖佛蘭茲·色爾特 (Franz Seldte) 復充當勞動部長。在內閣中國權黨居然據有四個重要位置，那在一方面可以說明希特拉對於胡根堡如何遷就，另一方面却又可說明希特拉黨對於胡根堡如何必欲去之而後快。果然在共黨勢力將告肅清的三月，希特拉即以共黨份子混入鋼盔團的理由，而開始對該團行使種種壓迫。鋼盔團團長色爾特為保全其勞動部長之地位計，乃於四月二十七日發表宣言，率其團員加入國社黨。為國權黨之支援團體的鋼盔團既投降希特拉，胡根堡在政府中之政治地位，自不免大大降落。但胡氏特其過去與希特拉的關係，特其有德國重工業家及反動大貴族之奧援，尙圖作最後掙扎。但他所兼的重要職位太多了，同時，食糧農林部與經濟部的職務，在經濟恐慌日益加深擴大的德國當時狀況下，不獨要代國社黨受過，且還要被視為阻止國社黨之有效經濟政策推行的障礙。國社黨與胡根堡之間發生齟齬，需要統一的強有力政府的德國資本家階級，必然認為是一種不能忍受的混亂，為求終止此種不安定狀態，他們要一個有力的無條件的忠於獨占資本的政府。在種種打算上，他們情願犧牲其忠實的僕人胡根堡，而給希特拉

以全權令希特拉及其黨羽負保護資本主義的全責。資本家階級既有此成算，希特拉更自無須作任何顧慮。六月下旬，政府開始對胡根堡的國權黨及其所屬的支援團體，執行種種彈壓手段。其所持之唯一理由，仍為容混共黨及社民黨份子，企圖『赤化』。同月二十一日，同黨之青年部即『德意志國權黨鬥爭團』（Kampf Ring）被迫解散，並由警查隊及S. A.與S. S.肆行搜查此鬥爭團之本部支部，逮捕許多幹部及黨員。此外，『國權黨工業中等階級鬥爭同盟』及國權黨經營集團組織，通被禁止。在政府肆行壓迫的當中，胡根堡雖曾一度提出辯駁的抗議，但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六月二十七日，他終於辭去其本兼各職，而焯赫一世的『德意志國權黨』亦於同夜宣告解體了。

七月六日，希特拉在國代理官會議席上，曾有以次的得意的講辭，他說：『現在諸政黨（die Parteien）都相繼排除了。這是一種歷史的事實。關於這種歷史事實的意義與效果，也許還有人不會完全意識到。……今後政黨（die Parteien）——即指殘留下的國社黨）就是國家。一切的權力，皆存於國家支配權的手中。』然在政治方面足為獨裁阻礙的，除議會

制度外，還有聯邦制度。『諸政黨都相繼排除了，』議會制度算從根本予以否定；然則聯邦制度怎樣呢？事實上，希特拉黨在排除其他政黨的過程中，已經在逐漸剷除韋瑪憲法所賦予各邦的權力。

根據韋瑪憲法，德意志各邦，除了外交、軍事、貨幣、郵政、關稅等項立於國政府監督之下外，其餘一切皆聽其自治，各邦都有獨立的政府與議會。這種聯邦政治狀態，頗不適於澈底推行獨裁。而況各邦的議會與政府，又多半是由他黨勢力所盤踞咧！因此，希特拉黨在掌握政權之始，即着手從行政方面立法方面剝奪各邦的權力。

在以希特拉為首班的內閣成立後一週間（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即創立所謂國統監制度（Reichskommissar），首先把社會民主黨控制下之普魯士政府的政權，移歸國統監（當時的國統監為巴本及國社黨要人戈林格）。至同年三月上旬，希特拉更乘國會總選舉的空前勝利，把這種國統監制度，擴充到普魯士以外諸邦及諸自由市。三月廿四日，政府更由議會獲得非常時期得自由行使國家權力並得任意制定法律的『國權委任法』

(Ermächtigungsgesetz) 由是在四月七日，就有兩種重要法律出現，一是『國對諸邦劃一支配的第二法律』(Zweites Gesetz Zur Gleichschaltung der Länder mit dem Reich)，一是『官吏法』(Beamtengesetz)即所謂『職能官吏制度復活法』(Gesetz fü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由前一法律，各邦(除普魯士外)都設一國代理官(Reichsstatthalter)，此國代理官乃代理國內閣總理監督各邦行政及立法，並得解散邦議會，制定邦法律及罷免各該邦所直屬之官吏；至後一法律之主旨，則不外以國社黨黨員代換各邦之非國社黨官吏。

經過這幾種進攻式的法制的變革，各邦由憲法所賦與之獨立權限，已經剝奪殆盡，但希特拉尚不敢正式廢除邦議會，廢棄聯邦制度。延至十月十四日，希特拉利用脫退國聯，在國內引起一大刺激的機會，由政府頒發脫退宣言，同時附帶兩種命令：其一是解散國會與新選舉，其一則是施行國民總投票。關於國民總投票的花樣，以後還有談及的機會，在此姑且不論。至前一命令，却似有幾分滑稽。因為各政黨次第清除後，殘骸的國會，不過是希特拉

黨徒清一色的包辦機關，解散與再選，至多也不過是國社黨內部的升沉變動，於民意無關。但希特拉必欲玩此戲法，蓋因根據三月三十一日之『國對諸邦劃一支配暫定法』，國會解散，地方議會亦相伴解散。但這伴隨國會解散之各邦地方議會，希特拉政府並未命其再選，這已大可窺見其廢除邦議會之心機。十一月十二日國會選舉，至翌年一月三十日內政部長惠爾赫姆·佛利克博士（Dr. Wilhelm Frick）所提的『聯邦制度改革法案』（Das Gesetz über den Neuanfang des Reichs），輕快的在國社黨清一色的國會中通過。此法案的序言是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國民投票與國會選舉，證明德意志國民超越了一切內政上的限界與對立，而融合為緊密的內部統一體。』至其大體內容則是：各邦議會廢止；各邦統治權移屬於國，各邦政府從屬於國政府；國代理官由國內務部長監督；國政府得制定新憲法。依此幾項條文，德意志聯邦制度已完全廢止。俾斯麥企圖完成而卒未完成的德意志的實質統一，居然由希特拉實現了。這是希特拉黨最得意之作。

然而希特拉由奪取政權到獨裁強化，始終是在獨占資本的要求與贊助下逐步推行。

危害資本家階級勢力之摧毀，雖然在消極方面滿足了資本家的要求，但他們在積極方面對於經濟改善，和國際關係改善等問題，還頗有賴於希特拉黨的努力；同時希特拉黨自身對於資產階級以外的各社會階層所類發的空頭支票，亦需要作某種限度的兌現咧！

第八章 國社黨綱領之試鍊

一 民族主義與反猶太人運動

前面講過，希特拉黨是非常重視煽動宣傳的。煽動宣傳除了把事實（歪曲並造作的事實）做材料外，同時還不能不有一定的主張或理論作基礎。國社黨在一九二二年宣布出來，並在一九二六年附以『永不變更』之決議的二十五條綱領，大概可以視為該黨領袖及其黨羽所奉為坐言起行之金科玉律罷。在這裏，我們用不着把這綱領逐條抄寫出來。只要是肯耐性將牠通讀一遍的人，他一定會覺得這個綱領中的積極成分太少，消極成分太多，換言之，就是只有破壞而無建設。其消極破壞方面的經緯，可歸納而得以次諸要點：

（一）反凡爾賽體系；

（二）反議會制度；

(三) 反猶太人

(四) 反大資本家及地主

奇怪得很，希特拉黨做得有聲有色的反馬克斯主義反共產黨原則，在綱領中訖未有一字提及。據說這有幾種原因：其一是，反馬克斯主義與反大資本家及地主的原則相矛盾，而綱領則是不便矛盾的；其二是，反馬克斯主義與其標榜的「社會主義」意識，特別是與「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這個名稱，多少有點衝突，所以只好一筆抹過不提。但這都是從理論上立論，而實際則據說還是因為在此黨綱領創建的時候，德國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已遍及於資產階級以外的各社會階層，如希特拉當時未顧慮及此，一定會使黨綱成爲其吸收黨員及「追隨者」的障礙。爲遷就事實計，自不妨在綱領上留下此一漏洞，況此漏洞後來已由事實予以彌縫補充了呢！

至若上面四項中之(二)項反議會制度，前章已經解釋過了。特反議會制度主張之實現，雖然是綱領一部分的實現，但就取得政權，並使獨裁強化上講，這還祇算是取得了實

施其他綱領之政治基礎。換言之，即國社黨之綱領的現實性，乃取決於其反大資本家及地主，反猶太人，反凡爾賽體系的成果。反大資本家及地主，是國社黨之「社會主義」的理想；而反凡爾賽體系及反猶太人，則是其「民族主義」或「大日耳曼民族主義」的理想。現在姑先就其反猶太人運動的全般情形，加以解說。

如說，由希特拉所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不外是一種反猶太人運動，那雖不免有點過火，（其實國社黨的臺柱奧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就曾憤激的說，該黨缺乏大眾基礎，勢將成爲「一個純然反猶太人的經濟黨」）但他那種運動，至多也祇能算是一種反猶太人運動的擴大。整個國社黨的二十五條綱領，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涉及猶太人，或對應着猶太人而制定的。其中明白直接反對猶太人的地方，爲第二十四條，「本黨反對猶太人之實利主義精神……」及第四條，「凡國民之同類，始可作德意志國民，凡屬德意志血統者（不論其信仰如何），始得爲國民之同類，故猶太人不能視爲國民之同類。」第四條是反猶太人的骨幹，由這條引伸出來的，如「非本國國民，祇可在德國作客居留」

(第五條)如「倘全德國人口之扶養不能維持時，即應將居留在德國之外國人驅逐出境」(第七條)如「一切「非德國人」對德國新聞發生經濟關係或影響時，均予以法律之禁止，……並將該非德國人驅逐出境」以及「凡以德文發刊之新聞，其機關中之編輯與職員，均須爲國民之同類」(第二十三條)除此以外，如「撲滅利息的奴隸制」(第十一條)如「沒收一切因戰爭而獲之贏利」(第十二條)如「主張將大百貨公司立即收歸市區所有」(第十六條)如「凡是國民之共同罪人，盤剝重利者及奸人等等，不論其信仰與種族如何，均應處以死刑」(第十八條)凡此等等，均莫不是或明或暗的指斥猶太人，並剝奪猶太人的權利。

抱着征服世界雄圖的國社黨，竟對於散處國內的弱小猶太人大張撻伐，殊未免有獅子搏兔之感。至猶太人之所以成爲國社黨攻擊之敵，據國社黨領袖希特拉的一再聲明，似乎就是爲了猶太人之嗜利而忘義；這種嗜利而忘義的氣質，不但會在日常生活中，使高潔的德國人受到影響，且會由婚娶的方式，使純粹的德國人的血液受到玷污。所以排斥猶太

人，不外是使日耳曼民族聖潔化。至猶太人根據其嗜利的氣質用種種方式剝削德國國民，那當然也是愛國主義的希特拉所難容認的。要之，希特拉之反猶太主義，完全是立腳於民族主義。

但希特拉黨徒關於反猶太人之政策，却又曾以下面這樣新奇的論調，答覆其質問者說：「試想，如我們的政策，單單反對猶太人，那已不合於二十世紀的精神。但我們是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猶太人根本不能並存；如要達到社會主義，即使德國無產階級得到解放，或使德國民族自由，非反對猶太人不可。我們既希望德國獲得自由和社會主義之實現，勢不能不倒猶太人。猶太人當然爲人類，但正如蒼蠅爲動物一樣，不是可愛的東西……我們不懼怕二百萬的猶太人，我們要向其拚命奮鬥，那樣，他們才會懼怕我們這六千萬德國人哩！」（見 Living Age, Jan. 1932, "What Hitler will do?" p. 391）

從此看來，反對猶太人，除了爲實現民族主義的理想外，還爲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然據說，同時也據國社黨的宣傳，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的馬克斯爲猶太人，却又是猶太

入應被打倒的理由之一。除此以外，主張政黨議會制度的愛柏爾特（德國第一任大總統）爲猶太人，代表簽訂凡爾賽條約的爲猶太人，起草韋瑪憲法的亦爲猶太人，議會制度、凡爾賽條約、韋瑪憲法都是國社黨所反對的，故這些通常也被視爲希特拉黨反對猶太人的原因。然一揆諸實際，這都祇算是偶合的皮相觀察，或者是國社黨藉以淆人視聽之宣傳。希特拉黨反猶太人運動之真正動機，蓋不外以次諸點：

第一，提高民族情緒。民族的國家的或國民的諸意識，那都是緩和一般勞動大眾對資本家階級之深刻不滿的有效鎮定劑。但要高揚這種意識或情緒，頂好是把握一個反對對象；在此對象上所進行的摧毀工作愈緊張，就愈會使一般勞動大眾忘懷於其正面的壓迫者；況由糟塌猶太人所陪襯出的德國民族之優越性，更大可給這般物質上之苦惱者以精神的安慰咧！

第二，見好一般民衆。大戰後的德國中小商工業者、農業者，大都是靠借債維持或恢復其業務，在通貨動搖不定的當中，在貨幣資本異常枯竭的情形下，以金利生活著稱的猶

太人，當然會要求過重的利息，以致增加這些中產階級的困苦，從而引起他們莫大的反感。當時想拉引中小資產階級爲其社會羣衆基礎的希特拉黨，自然知道「反猶太人」是這般民衆所要求的口號。

第三，解決一部分的人口問題與失業問題。德國人口是相當稠密的（每方英里爲三百六十一名）。希特拉在其黨綱中雖曾貿然的提出殖民地與土地的要求，但他自己亦知道不容易實現。同時爲培養對外實力計，他又嚴格規定每個家族要從事有四個小孩子的競賽；在這種情形下，把佔有德國人口三分之一的兩百萬猶太人（關於猶太人在德國的實在人數，其說不一，就前述國社黨所舉的數字爲兩百萬），驅逐出去，當不失爲解決一部分人口問題的有效方法。加之，德國失業問題的苦痛，是我們屢經講過的。「從國家機關中，市政府中，銀行中，以及與政府有任何一種關係的工廠中，甚至於在有些與政府有關係的私人企業中，把「馬克斯主義者」和猶太人驅逐出去，而代以國家社會主義者」（見時事彙編一卷三期瓦加爾著德國法西斯主義執政後的前顧與展望）那不但可以解決一

部分失業問題，且可解決國社黨內部之位置黨羽問題呢！然而反猶太人還有最基本的原由在，即

第四，滿足大工業資本家的要求。我們在前面已述及德國大工業資本家們資助希特拉的情形。當時這些工業資本家的『慷慨』一方面固在要求他代為處罰不安分的勞動階級，同時並還要求他懲治那些侵蝕『民族』資本的猶太人。猶太人在德國的資本形態，主要是金融資本與商業資本，這在資本的陣營內，恰好與產業資本相對立。如說希特拉政權的特質，就在對於獨占資本從事防衛，那這種排斥猶太人的原由，就算是最本質的原由了。由是可知，猶太人的實利主義精神，不但德國的大工業資本家染上了，就連希特拉自己亦染上了。

然而出乎意外，希特拉黨對於反猶太人的前三個要求，都相當有所成就。而對於最後一個最本質的要求，却似乎尚未收到滿意的結果。被指斥為猶太人的大學教授，公司職員，衙門官吏，乃至工廠及小舖店中的工人店夥，旅館使者，都成千成萬的放逐出了『光輝的

第三德意志國家，但猶太系的大金融資本家、大房產所有者、大百貨公司老闆，却仍安然無恙的，在利用其「不勞而獲的收入」以度其爲「純血德意志人」所艷羨不置的驕侈淫佚生活。

希特拉黨這樣寬容有錢有勢的猶太人，也許不單純是因爲中了猶太人「拜金主義」的毒，或如國外社會民主黨所宣傳的，受了他們的賄；而主要是由於猶太系的金融資本與商業資本，早已在德國築起了不容易顛仆的基礎；並且德國猶太系的資本，又與國際猶太系的資本結成了堅固的陣勢；希特拉黨要動搖這基礎，突破這陣勢，勢必招致政權瓦解的危機。這樣，以反猶太人運動爲骨幹的希特拉黨的民族主義，結局不但變成了一種「單純反猶太人的經濟」主義，而且是一種太不澈底的經濟主義哩！

現在，我們再看看希特拉黨之民族主義向外活躍的成績罷。

二 反凡爾賽體系與外交孤立

以大民族主義大國家主義爲中心，而大施其煽動宣傳技倆的國社黨，其對內着重在反對「非我族類」的猶太人，而對外則着重在反對束縛其自由發展的凡爾賽體系。國社黨黨綱二十五條中，有一半以上是反對猶太人的，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但黨綱中最關重要的第一、第二、第三條，却都是針對着凡爾賽體系而發的。如

「第一條，根據民族自決權，吾人將促進整個德意志民族之結合，使其成爲大德意志。
第二條，吾人要求德國民族之國際地位平等，並要求廢除凡爾賽和約及聖日耳曼和約。」

第三條，爲扶植吾國民族，及移殖過剩之人口計，吾人要求殖民地。」

第二條係直接反對凡爾賽體系固不待言；第三條要求殖民地，其立意，當在恢復其由凡爾賽和約分割去的殖民地。而第一條之大德意志主義之主要動機，則在剷除凡爾賽和約對德奧兩國間所確立的分離政策。

德國自斯特萊斯曼於一九二四年確定西向妥協政策與協約諸國先後成立種種協

定以後，其國際地位，已由一九二六年之加入國際聯合會，而逐漸改善。德國最痛恨的賠款問題，在一九三二年巴本內閣時代，雖曾由洛桑賠款協定的簽訂（同年七月八日），大體告一段落（由德國支出三十萬萬金馬克），但凡爾賽和約對德國其他方面所加的束縛，却並不會有多大的減除。因此在資本主義法則支配下的德國資本主義第三期的苦痛，確較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深刻。在洛桑賠款協定簽訂的當時及在這以前不久，德國國內要求對凡爾賽和約重新予以清算的空氣，實異常濃厚。狹義的國家主義者、軍國主義者固不待言，就是那些一向支持西向妥協政策的大資本家們，爲了無法克服恐慌困難，且爲了轉嫁其對勞動階級所加的榨取責任，亦把凡爾賽和約看爲其詛咒的對象，從而始終仰其鼻息的希特拉黨，自然更好大做煽動宣傳工夫。協約諸國在洛桑會議中之所以肯對賠款問題讓步，一方面固然是深感德國經濟困難的深刻，因而逆知非如此讓步，不足以阻制其國內極左傾運動的擡頭，但另一方面却也期望能由此暫時抑制其極右翼勢力的伸展。

然而代表德國極右傾勢力的希特拉黨，終於賠款問題落着後的幾個月間，取得德國

政權了。希特拉黨無論就履行其十餘年來對民衆的諾言講，抑或轉移勞動大衆乃至中小資產階級對資本家階級之憎惡情緒講，都不能不對外勉作強硬的要求，即不能不打破凡爾賽體系所加於德國的種種束縛。

希特拉黨在破除凡爾賽體系的掙扎中，存有兩個根本要求，一是擴張領土，一是擴張軍備。前述國社黨綱領第一條的大德意志主義與第三條的殖民地要求，通爲其希望擴張領土之註脚。在大德意志主義企圖之下，除了奧大利須併合於德國版圖外，波蘭及捷克斯拉夫之領土，都須割裂，比利時法國，乃至瑞士丹麥，都不能維持其現有國境。但這種變更政治領域的企圖，就是言大而誇之希特拉及其黨徒，亦知非純用國內爭取政權之狂呼怒吼手段所能實現。在此種認識下，他們要求擴張軍備，即破除凡爾賽和約所加於德國的軍備限制。

原來德國對於這個要求，是從消極積極兩方面出發；在積極方面，牠期望能讓其軍備擴張到與他國（特別是法國）相等的程度；這層萬一不能做到，牠則期望他國縮減軍備

到與德國相等的程度。這種軍備平等要求，在德國本是理直氣壯。而且凡爾賽和約中，還顯然表明德國解除武裝，是一般軍縮的序幕。至根據此和約所成立的國際聯合會規約第八條，更實質的保證軍備之削減與限制，爲國聯主要任務之一。此外，在交戰各國言歸於好的羅加諾條約的最終議定書中，並還明確規定各國應當「一致同意於努力實現軍備之撤廢」。但這些條文儘管一再表明各國軍備當一般減除，事實上，除德國而外，一切國家差不多都在明目張膽的加緊擴充軍備；由是，德國在軍備上愈益相形見絀，而其對於軍備平等的要求，乃愈益熾烈。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的軍縮會議中，德國會重申其一九二六年軍縮預備會議所提示過的「平等權利」的主張。牠以爲要德國不增加現有軍備，必須各國縮減其現有軍備。這主張被各國拒絕後，德國即從軍縮會議退脫出來。但至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德國復因列強承認「在安全確保條件下之平等權利」的基本主張，重新回到軍縮會議來。當時英國會照此主張，作成一具體方案，規定以五年爲過渡期，此過渡期終了後，德國即可絕對自由及絕對占有與其他各國平等的權利。

然而德國這種軍備限制關係的改進，乃是希特拉未掌政權以前的事。至翌年一月希特拉取得德國政權後，情勢大變了。希特拉及其黨徒在國內盡量剷除極左翼的勢力，自謂可以邀得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情，因而允許其充實軍備，以便充當資本主義世界一方面的防衛。但希特拉的這種打算，恰好得到了反證；協約諸國不但不酬報其剷除左翼勢力的功勳，却反因其對內剷除異黨所暴露的橫暴行爲，而益加疑慮其對外的非常活動。由是，他們不獨不允許希特拉即時撤廢軍備限制的要求，且進而翻改其已經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所允許德國的相對平等方案，即經過五年過渡期間以後，德國得絕對自由，絕對與他國平等的方案。在希特拉取得政權的九個月後的一九三三年十月，英國外相西門（Simon）竟作成一個修改此方案的計畫。此計畫與原方案絕對不同之點，就是把五年過渡期，改作四年監督期，其大意是監督德國，看德國在此四年期中，是否完全遵照條約，未增加軍備；如德國果未增加軍備，然後協約諸國乃開始縮減軍備。至此四年後，德國究竟能否取得絕對平等自由權利，其他各國究竟縮減軍備到若何程度，皆未明白確定。列國這種態

度的轉變，牠們曾直言不諱的說是：過去所允許的「平等」現在不能適用與保證，換言之，就是希特拉勢力支配下的德國，頗使牠們發生疑慮。

以爭取國家自由平等相號召的希特拉黨，在其取得政權後，反而使國家自由平等的權利，進一步受到限制，這不能不使牠們感到憤激與失望；這種對外的碰壁，與前述對內劃一政權的要求，加以爲要對國民表示對外政策上之強硬的與斷然的決意，希特拉政府卒於同年十月十四日宣佈退脫軍縮會議及與軍縮會議相關聯的國際聯合會。德國退出軍縮會議退出國際聯合會，已經表示是法西斯蒂外交之孤立，而牠這種脫軌的超躍舉動，却更增加列國的疑慮，使牠們更加對德國行使警戒。因此，希特拉黨企圖藉外交上的冒險政策，來加強其國內的「尊嚴」；且在國家如何危險，列國如何壓迫德國的龐雜宣傳中，「選出」新國會，宣示「國家的統一」（參照第七章第三節），誠然是着着成功了，但德國外交上的孤立與失敗，却爲不可掩飾的事實。

不但如此。希特拉政府一方面與日內瓦切斷聯絡，同時在另一方面却又幾與維也納

切斷聯絡。前面講過，希特拉黨對凡爾賽體系的掙扎，原是存着擴大領土與擴大軍備的兩種願望。如其說擴大軍備是作爲擴大領土的手段，那在軍備不能自由任意擴張之前，要想藉武力擴張領土，顯然是沒有多大希望的。在此種情形下，勢不能不採取比較可能的途徑，即揚起大德意志主義的旗幟，而先從奧大利下手了。

德奧合併的企圖，在布魯甯內閣時代本已開其端緒。然自「合併」第一步之德奧關稅同盟痛遭法國反對後，希特拉對於強行併合奧大利的念頭，似乎知道爲國際情勢所不許。由是他在取得德國政權後的對奧政策，僅是企圖在奧國造成一個完全受德國支配的政治局面，換言之，就是在奧國確立一個奧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的政權。在此種計畫下，受希特拉影響與指導的奧國社黨，乃開始在奧國作奪取政權的猛烈活動。但論到這裏，我們應當先把奧國國內的政情，描畫一個輪廓。

奧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完成德國式的共和革命後，共和國家的政權，亦和德國一樣，大體是掌握在社會民主黨的手中。凡爾賽和約的結果，奧大利已喪失其大部分

的國土與經濟資源，從而，德國在戰後所經驗過的痛苦，奧國實更悽慘的經驗到了。沿着歷史的自然趨勢，在德國發生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亦同樣發現於奧國。出現於奧國西部諸州的所謂「鄉土軍」(Heimwehr)，其口號是「擁護鄉土」，由奧國馬克斯主義(Austro-Maximus，——按指奧國社會民主黨)手中奪回其鄉土奧國。他們這種口號，雖然大體與德國以退伍軍人為基礎的國社黨的主張，若合符節，但其形成決定的政治勢力，却是與基督教社會黨(Die Christliche Soziale Partei)合流以後。原來在基督教社會黨之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ß)內閣出現以前，奧國的政局，是受着兩種外國勢力的支配；這所謂兩種外國勢力，一是以工業資本為背景的德國勢力，一是以金融資本為背景的英法勢力。在希特拉黨尚未取得政權，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尚未完全失勢的當時，奧國內受德國勢力支配，從而主張與德合併的，是社會民主黨及大德意志黨；而同時受英法——特別是法國勢力支配，從而反對與德國合併的，則是基督教社會黨與鄉土軍。這對立的兩種勢力，在前原是前者佔有優勢，然自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奧大利信用所(Kredit-Anstalt)發

端的金融恐慌爆發後，自己正爲金融恐慌所苦的德國既無法救濟，於是法國及以法國爲
中介之英國金融勢力，乃乘機侵入。法國救濟奧國金融所附之唯一條件，就是要奧國放棄
親德政策。在此種情勢下，第二次布勒奇（Bursch）內閣卒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塌臺，而代
之以陶爾斐斯內閣。

特陶爾斐斯內閣雖有法英諸國之金融資本撐腰，然陶爾斐斯所屬的「基督教社會
黨」及「鄉土軍」一類右翼團體在國會中所佔的席數，還不及其反對黨派所佔議席之
多。加之，德國國社黨勢力之膨脹，不旋踵即使奧國國社黨異常活躍；由是在對外政策上，不
啻爲其反對派加一助力。「小拿破崙」陶爾斐斯知道要打開此種政治難局，第一步不能
不採行德國布魯甯巴本內閣的辦法，施行頒佈緊急命令式的獨裁，如此種獨裁方式發生
障礙，則照希特拉的辦法，剷除一切反對政黨。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政府黨與反政府黨因
鐵道工作人員之薪金問題發生爭執，結局，政府不問議會意嚮，自由裁處，同時並調武裝鄉
土兵警戒維也納全市，押收檢查反對黨之新聞，搜索反對黨新聞編輯所，且逮捕其人員。至

同月下旬，陶爾斐斯政府更利用鄉土軍，斷然解散社會民主黨之唯一武力「共和國防衛團」(Der Republikanische Schütz-bund)。社會民主黨之武力解除後，陶爾斐斯的決定反對黨，就不是社會民主黨，而是勃然興起的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了。

奧國社會民主黨的親德政策，照理應為希特拉影響下的奧國社黨所擁護。但因前者係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支配，故在國內剷除社會民主黨的希特拉黨，在奧國亦袖手坐視親德的社會民主黨之挫敗，且利用社會民主黨挫敗之機會，而益擴充其勢力。同年春季在各大都市進行的選舉，國社黨皆對他黨佔有優勢，同時 S. S. 及 S. A. 則到處橫行，並在各地設立褐色館 (Braunes Haus)，以為發縱指示的總部。陶爾斐斯在懲治社會民主黨的當時，本對國社黨無特別敵視的惡感，他曾說：「壓迫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而與現在擊退的社會民主黨以再挽回其勢力的機運，是乃愚策，吾人決不願為；存在於國家社會主義中之正當而健全的要素，曾為我們基督教社會黨之綱領。」然而陶爾斐斯對於國社黨的這種善意的寬容，實足以增加希特拉對奧國行使劃一支配的熱望。自是國社黨的活動，益無忌

憚了。

至四月中旬以後，陶爾斐斯的態度突然改變，基督教社會黨之機關報德國聞報（Reichspost）曾作以次的攻擊論調說：『指導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們，竟為推翻陶爾斐斯政府，強行新選舉，而在我國設立強有力的德國宣傳機關。他們由那種選舉所期待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依照巴陽的方式，把奧大利編為德國的一個屬邦。』這是代表陶爾斐斯的言論。陶爾斐斯之所以敢斷然與德國反目，乃因他在這以前，曾經往意大利旅行過，由慕沙里尼得到了某種默契。然自陶爾斐斯旅行意大利後，國社黨因疑慮其或與意大利結有不利於該黨的企圖，遂益拚命作反陶爾斐斯活動。由國社黨指揮之S. S.與S. A.到處與警官及由鄉土軍編成之補助警官衝突。延至五月上旬，國社黨之大暴動計畫發覺；適會巴陽的司法部長佛蘭克（Frank）及普魯士的司法部長克爾（H. Kerrl）同游奧國，在維也納及其他各地作打倒陶爾斐斯內閣的演說。由是奧國之輿論大譁，陶爾斐斯政府乃斷然對佛蘭克及克爾下逐客之令，同時並阻制國內各地懸掛德國國社黨黨旗及佩用國社黨黨章。延及

六月，陶爾斐斯政府更因國社黨在因斯布諾克（Innsbruck）襲擊鄉土軍幹部及在維也納市內類作暴動企圖，乃毅然封鎖國社黨之發動機關「褐色館」，拘押其幹部，驅逐德國駐奧公使館之情報部長，即奧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指導者哈比西脫（Habicht），此外並嚴命解散 S. A. 及 S. S. 凡屬希特拉在國內用以對付異己者或異黨的手段，陶爾斐斯幾乎完全模仿過來，用以對付國社黨了。這是法西斯蒂與法西斯蒂的衝突。

希特拉對於陶爾斐斯這種出乎其意料的強硬行動，本來躍躍欲試的想加以壓力，但因懼怕英法的干涉，特別是疑忌另一個（或第三個）法西斯蒂領袖慕沙里尼的張牙舞爪，他把這口氣吞下了，他當時所能做到的報復舉動，就是逮捕並驅逐奧國駐德公使館的情報部長華色柏克（Wasserbeck）。希特拉想吞併奧國的企圖，不但變成一場惡夢，且反而逼使其同文同種同盟同患難的奧大利，仇恨德國，逐漸投向德國敵人的懷中。然希特拉對於陶爾斐斯，是不能這樣罷休的。

在同年八月（即一九三三年八月）德國敏亨之無線電臺，曾煽動奧國國內國社黨

起而反抗政府，當時雖經英法意三國之共同抗議，未惹起事變，後兩月復有陶爾斐斯遇刺受傷的消息。至一九三四年三月，陶爾斐斯第四次往訪意大利，成立意奧匈三國協定；希特拉對此已不禁眼紅；六月希特拉與慕沙里尼在威尼斯之會晤，原期對奧問題有所諒解。但當法國外長歷訪波蘭及小協約各國，提出東歐羅加諾條約，以成就其對德包圍外交之頃，陶爾斐斯忽於七月二十五日爲國社黨所戕殺。希特拉黨戕殺陶爾斐斯的動機，原冀用暴力確立國社黨在奧國之政權，但因英法的抗議，與意大利精難軍的出動，結局還是讓反對德國更形激烈的勢力統治奧國。

對奧合併企圖的失敗，由軍縮會議及國聯的退脫，以及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與波蘭成立德波協定，以自行限制其十年內不得作收回波蘭走廊及上西里西亞打算的措置，都是希特拉外交正面的結果，此外，他對外所慣用的盲動與空吼的外交戰略，還促使其敵國乃至對德本無惡意的國家，相與建立起了包圍德國的陣線。德國是異常孤立了。

然希特拉之所以採行這種冒險與輕躁的外交，我們還能由其國內的情形，找出一些

答案。

三 經濟與勞動的和平

以「國家社會主義」相號召的國社黨，在其黨綱中，可以引作此種「社會主義」之註脚的，大概是指着以次幾條：

「吾人要求，凡屬公司組合之大企業（指托辣斯等）都收歸國有」（第十三條）。
「吾人對於健全之中產階級之創立及其維持，將予以督促，並主張將大百貨公司，立即收歸市區所有。至於該項房屋，則以低價出租於小營業者……」（第十六條）。
「吾人要求一適於吾國民族需要之土地改革（Boden Reform），並為公衆利益計，制定一無代價沒收土地之法律，廢止土地租金，且阻止各種土地投機」（第十七條）。此外，如「完全沒收一切因戰爭而獲之贏利」，如嚴懲「重利盤剝者」，大概都可包括在國社黨的「社會主義」範疇裏面。國社黨在一九三三年的上半期中，其全力都集注在完成「統一支配」的

「國家革命」或「政治革命」上面，自此以後，照理總該可以毫無阻礙的進行其「社會主義」的革命吧。

然而在胡根堡下臺及國社黨以外的一切政黨均告肅清的同年七月六日，那位甯捨棄生命，不違反黨綱（註一）的國社黨領袖希特拉氏，居然對聯邦行政長官作以次的演說：說革命已經成功了；說革命不應當成爲經常的事情；說以絲毫不懂經濟的國社黨員來代替學問豐富的經濟領袖，以及「理論上的附會」經濟上的實驗，均須制止；說政綱和理想並不重要，主要的是征集工作（Arbeitsbeschaffung）；說聯邦長官應不許任何黨部或其他的團體干涉經濟事宜，干涉經濟事宜，是聯邦政府和經濟部長的唯一任務。（註二）希特拉在這裏所說的「革命已經成功了」，當然是指着劃一獨裁的政治革命的成功；至關於有經濟性的社會革命，他則以「政綱和理想並不重要」一語了之，從而，「理論上的附會」，「經濟上的實驗」均須制止；所有經濟事宜，當讓「學問豐富的經濟領袖」去處理。希特拉的這種懷抱，在其同年一月組閣的當時，已經有所表示，財政部長及國家銀行總裁

兩重要職務仍繼續讓兩位對經濟行政有高度訓練的專家即克洛希克 (Grof. Schwerin V. Krosick) 與沙哈特 (Dr. Schacht) 分任，那已顯示他對德國經濟組織的變革，有了怎樣的成算。不過，他在七月六日所說的「經濟領袖」於「學問豐富」外，還含有資產龐大的意思。

所以在同月十三日，新經濟部長斯密特博士 (Dr. Schmidt) 師承黨魁希特拉之意，對克虜伯 (Krupp)、第森 (Thyssen)、斐格勒 (Vogel) 諸「經濟領袖」很顯明表示劃一政權，推翻胡根堡一類手段的使用，除了保障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政策之順利的和無限制的執行外，別無他意。像克虜伯一流的大資本家或「經濟領袖」都曾因戰爭獲得鉅額的贏利，都是國社黨綱領載明要移歸國有之大企業公司大托辣斯的所有者。他們聽到希特拉政府中負最高經濟上責任的經濟部長的這種公開擁護他們的議論，當然表明滿意。不但如此，希特拉為進一步表明其心跡，還在這以後不久所開的經濟會議中，請這些「經濟領袖」幫同他們「絲毫不懂經濟的國社黨員」設計；此外，大資本家第森且收到北威斯發

倫 (Westfalen-Nord) 等行政區長官致他的函件，說是「自普魯士總理任命閣下爲普魯士邦顧問的經濟代表而後，閣下便是本經濟區經濟政策上最高的國家權威了。准此，我已通知所有我的服務機關，把所有關於經濟政策的問題（農業政策問題除外）完全提交尊處，並通知他們有執行尊處決定的義務。」像這樣把一切經濟政策之決定權，委之於大資本家，就是布魯甯巴本胡根堡一流人物，亦不敢公然出此；因爲如此，大資本家乃甯願犧牲他們這些「忠臣」而另行扶植能「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政策之順利的和無限制的執行」之希特拉黨了。

然則第森接到此種喜出望外的函件，該怎樣表述其意見呢？他在同月（七月）十九日的通告中，會有這樣的說辭：「我因被任命爲國務顧問，除其他職務外，有扶助國家改造經濟關係的責任和義務。要實現此種責任，只有在經濟制度的平穩而有規則的發展，不受任何方面損害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現在我們最迫切的任務，是提高經濟，而提高經濟的第一個和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乃在於將來使經濟的各分子（業主與工人）在平穩的、

於法規絲毫沒有損害的道路上發展起來。」(註三)第森這段話的着眼點，當然是求經濟「平穩而有規則的發展」或「在平穩的、於法規沒有絲毫損害的道路上發展起來。」這就是說，他最怕的是不平穩，不守法則法規(他們所定的法規)。他們扶植希特拉黨的根本目的，就在於此。其實早在他作這種表示以前，希特拉已經苦心孤詣的喊出了「經濟與勞動的和平」的口號，並還成就了種種製造「和平」的社會制度上的變革。

自社會民主黨之「全德意志勞動組合同盟」，中央黨之「基督教勞動組合」以及其他一切同性質之勞動組合團體，統被解消，且概行併合於希特拉政府所創設的「德意志勞動戰線」而後，德國在事實上已沒有擁護本身利益的勞動團體存在。「勞動戰線」裏面不但包括有在職的勞動者，僕役，失業者，領受保險金者，以及與勞動階級利益相反的企業家，甚且在國內從事某種業務的外國人，亦得加入。這種擴大「勞動戰線」的辦法，據國社黨所宣稱，是把從來擾亂「和平」的階級社會制度，改變為職能身分組織(Das berufständische System)，在這種組織中，只有職能的區別，沒有階級的分割，勞動者與企

業家一視同仁，毫無軒輊。但希特拉黨在進行這種『提高勞動者身分』的大改革以前，究竟不能不顧慮到勞動階級的反抗。所以當諸般勞動組合解消後不久的五月十七日，政府即宣言在八個星期之內，即在有機組織的經濟身分構成成就之前，所有德國之精神的肉體的勞動者，統行休戰。此種勞動休戰，在形式上，是由國經濟總監（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Wirtschaft）瓦格納博士（Dr. L. C. Wagoner）代表僱主，由『德意志勞動戰線』指導者萊伊博士（Dr. Ley）代表勞動者，共同協定成立，雙方（其實兩者都是代表獨占資本利益之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運動的指導人物）約定在八星期內，不得縮減工資，不得罷工，同時並由這兩位代表作成以次傳為美談的宣言：

『國家社會主義者諸君！精神的肉體的勞動者諸君！現在，國家是我們的國家，……經濟是我們的經濟，工廠是我們的工廠，機械是我們的機械……諸君！你們都是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鋒隊，凡有對於德國國民這些財產加以危害的舉動，你們應當毫無顧忌的予以澈底的粉碎和毀滅。休業，原始的罷工，乃至鎖閉工廠一類事體，只有破壞我們革命的敵

人，才那樣主張我們必須與之對抗。我們不要疏忽，不要寬容，因為這是關係成功勝利，乃至關係國家和民族的事體！無產勞動者驟然賦有工廠機械一類財產，同時又外鑠以「革命」、「民族」、「國家」一類神聖術語的催眠，當然只好遵令不動，而靜待「有機組織的經濟身分構造」之成就。

在勞動休戰的八週內，政府首先創造的是一種「經濟與勞動之地方監督者」(Zirkelsteiter der Wirtschaft und Arbeit) 制度；各邦各區之地方監督者，分別由代表資本家利益之國經濟總監及代表勞動者利益的「勞動戰線」指導者，各任命一國社黨黨員充任，其責務在調協勞資契約關係，以一切有效手段，阻止經濟的怠業。

這種制度，在實際儘管完全剝奪了勞動者直接向資本家爭取權益的一切手段，但形式上究還保有勞資通過所謂「地方監督者」而協定契約的關係。然勞資對立關係的存在，對於消滅階級鬥爭究是一個障礙，所以仍在勞動休戰的八週之內，政府更制定一種「勞動管理官法」(Gesetz über Trennhänder der Arbeit)，再根據此法，創設所謂「勞動

管理官制度。』照『管理官法』第一條第一項所規定，勞動管理官，純然是佔有勞資雙方以上的獨立國家機關，其第一任務，在「代替被僱者團體及個別僱傭者或僱傭者團體，以法律的拘束力，爲他們兩當事者規制勞動契約締結的條件。」此外，管理官還佔有指揮工廠監督者的地位，在爭議勃發的危急場合，他得利用警察，作臨機應變的處置。

無論就勞動管理官的名色講，抑就其職務講，其主要功用，都不外拘束勞動者，使其不作越軌的行動，換言之，就是要維持資本家們所渴望的「經濟與勞動的和平。」從此，勞動者已不復能計較其勞動條件，一切都聽政府擺佈了。

然根據這諸般法律，『地方監督』乃至『管理官』的『管理』、『監督』對象，雖爲勞動者，但同時也還在形式上把僱主或企業資本家拉入其拘束範圍中。然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希特拉政府又頒佈一種新勞動法，其根本原則雖仍不外是從限制勞動者入手，但是一步逼緊一步。同法第一條是說：『營業之企業者與工傭，共同工作，圖營業之發展，以致國家人民於福利。』第二條是說：『一種營業之領袖，對於其隨從，得依本法之規定，而

『獨斷營業中之一切事務。』前一條表明企業者與工傭是『共同工作』爲國爲民，姑且不論。至後一條則須略加解釋。希特拉是極力主張領袖制度的，就在經濟領域，他亦認爲非採行此種制度不可。每種經濟單位或經營組織，都行領袖制。從前稱企業爲僱主，稱勞動者爲僱工。他現在依此法令改變過來，稱前者爲領袖（Führer），稱後者爲隨從（Gefolgschaft），並規定領袖有不願隨從意見，而獨斷的處決一切之權。這一來，以前由『僱主』與『僱工』稱謂所顯示的物質關係，現在雖由『領袖』與『隨從』稱謂一變而爲道義關係（據希特拉說），但勞動者却更無絲毫表白意見的餘地了。他的命運，全由勞動管理官與企業領袖所決定。前述大資本家第森所要求的『在經濟制度之平穩而有規則，……不受任何方面損害的條件，』這裏算完全做到。

然獨占大資本對於希特拉政府所要求的『經濟與勞動的和平，』並不僅只關係化除勞資間的糾紛，且還關係消弭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即保證大資本對於中小資本的獨占。在『勞動管理官制度』完成以後不久的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國經濟總監瓦格納

曾在『德國中部工業聯合會』的會員大會席上，聲言『工廠的生產能率如較需要爲大，勢不能不有一個合理的計劃。加特爾是最好的方法；照那種方法，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不准有獨占外的企業，第二是不准成立新工廠。』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希特拉政府更根據這種獨占原則，頒佈『德國經濟建設法』，依照此法令，全德國的實業和商業，分組成十二個職業團體，其中有五個是分屬於職工，商業，銀行，保險及運輸界，而其餘七個則都是屬於實業界。七個大實業團體的總領袖，是委任克虜伯系的卜倫·哈爾巴哈（Krupp von Bonlen und Halbach）充當。由是我們知道這種『經濟建設法』的主要功能，不外是化除內部競爭，與促進資本集中。希特拉政府對於獨占資本所賦與的使命，大體總算完成了。但在大資本家方面，却還不能認爲十分滿足。因爲他們除要求『和平』外，還希望減輕資本之政治上的負擔與工資上的負擔咧！

關於前者，政府會根據『機器工業聯合會』的建議，減輕各種機械工業的營業稅所得稅；更根據軍事的理由，免除汽車稅，而政府要人如財政部祕書長萊因哈特（Reinhardt）

還鄭重聲明：減免汽車稅是一個端緒，政府此後將繼續澈底低減生產方面的稅收。不過關於低減總工資一層，希特拉政府始終沒有使資本家滿意；這原因，一部分雖因工資在布魯甯內閣時代已減到了不容易再減的程度，但一部分也由於希特拉懼怕勞動者發動挺而走險的反抗。

從上面這種種鐵一般的事實看來，我們已不難了解希特拉式的『社會主義』之真實性；希特拉由取得政權而在德國政治社會經濟三方面所行的『革命』，不但未損及資本主義制度絲毫，且還增添了資本主義的氣餒。然而資本主義勢力增加，其內在的矛盾與缺陷亦因而增加。結局，這建立在獨占資本基礎上的希特拉政權的危機，終於照着世界有識人士的預料，而形成而爆發了。

(註一) 在二十五條綱領之後，附有希特拉願以身殉主義的這樣一段文字：本黨領袖謹宣誓，爲求上列各條之實現，倘於必要時，以自己的「生命作抵當」，亦所不顧。

(註二) 見瓦爾加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眞面目，參照時事彙編第一卷第十期譯文。

(註三) 同上。

第九章 希特拉政權與國社黨之分裂

一 暴露在經濟復興計畫下的諸般兇相

希特拉政權之產生，原是爲應付資本主義第三期的恐慌局面。對於這種局面的打開，他如肯施行其浪漫的社會主義綱領，即實行無償的沒收土地，和把大百貨公司大企業經營移歸市有國有，那也許可以使現狀得到幾分改善，然而歷史法則是不許可他這樣跛行拐步的，他終於還是如前章所述，把全部精神努力都集注在資本主義的防衛之上。

但防衛資本主義，就等於說是鎮壓反資本主義勢力。在擁護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希特拉政權雖爲布魯甯巴本政權之繼續，可是希特拉政權之形成，却是由於一方面忠實的爲資本家服務，而一方面則不斷高呼擁護勞動者、小工商、小農以及其他一切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如其不壓榨後者，而能完成其服侍前者的任務，希特拉政府還不妨安然繼續其二

重人格的生存，但事實告訴我們，危機日益加深加大的資本主義，究非進一步增加擴大其對勞動者、小工商、小農的壓迫與榨取不行。這種無可克服的矛盾，正是希特拉政府與生俱來的致命危機。現在姑先看其為資本主義克服恐慌，所給予一般勞動大眾的困厄罷！

希特拉政權在一九三三年一月確立之始，即發表了一個長的『檄文』(Aufruf)這個『檄文』的第二章，係敘述復興經濟的計畫，其中曾把全計畫的輪廓指示出來說：『國民政府想以次兩個重要的「四年計畫」(Vierjahrespläne)解決我國國民經濟再組織的大事業，那就是為確保國民食糧上生活上的基礎救濟德意志農民，及由一個對於失業的有力而包括的對策，救濟德意志勞動者。』然則怎樣救濟呢？檄文中僅指出了兩個基本的簡單方法，即『勞役義務』(Die Arbeitsdienst-pflicht)與『移住政策』(Die Siedlungspolitik)略加分釋，就是以勞役義務救濟失業，以移住政策救濟農民。這是希特拉政府經濟復興與四年計畫的全貌。以前巴本內閣曾有兩年復興經濟的計畫，現在希特拉政府把時間延長一倍了，蓋知如此艱鉅事業，非四年莫辦也。

然而復與經濟的時期儘管拉長，這個計劃的簡陋與空漠，就在希特拉黨徒亦認為不能滿意。因為此種計畫的設計者與支持者，大體還算是當時兼食糧・農林部長與經濟部長的國權黨首領胡根堡氏。胡根堡幾乎掌握着整個經濟領域的實權，而對於打開經濟難局的方策，就是以這樣不着邊際的「四年計畫」來敷衍，無怪他除了代希特拉黨受過之外，還要受同黨之攻擊。由是，這被社會民主黨譏嘲為蘇俄五年計畫之「精神抄襲」的四年計畫，竟隨胡根堡之下臺，而變為無用了。

但胡根堡去後的希特拉政府的經濟復興計畫怎樣呢？德意志全般經濟復興計畫，我們迄今還未見宣佈出來，但就希特拉黨過去在各方面的經濟努力情形說來，似乎其所作所為，仍未大大越過胡根堡四年計畫（就說是胡根堡的四年計畫罷！）的基本原則，至多不過是對那原則予以擴充罷了。我們綜合其全般經濟設施，約可歸納為以次諸點：

（一）「創造工作」計畫 這與撲滅失業與繁榮一般工商業有關，其「工作」內容是修葺或修築地方自治團體的官廳，住宅，與橋梁；普通住宅的修葺與增建；都市郊外小

住宅的建築；河川的疏鑿整理；瓦斯水道電氣事業的供給；關於道路運河鐵道的興建；此外與軍事有關之或明或暗的工程設計，亦包括在此種計畫中。

(二) 軍需工業擴充 德國擴張軍備情形，那早已成了一件公開的祕密。此不但為解決一部分失業人口的比較實際方法，同時且為重工業資本家對於政府之積極要求。我們用不着在這裏舉述德國四周敵人如法波等國所推測的軍需工業生產增加數字，但那顯然在德國近年工業生產總額中，佔有可驚的額數。

(三) 農業自給主義 希特拉黨在取得政權以前，是給了農民不少的精神安慰與希望的。無代價沒收土地這個口號，後來雖經聲明是對於猶太人地主而發，致使一般小農與無產農民無端作一場大夢，可是救濟破碎農村之刻不容緩，希特拉黨是深深感覺到了的。為緩和龐大的入超趨勢，為開拓國內市場，以農業自給主義為中心之增大農業生產工作，實為當務之急。然阻止農業改進之大土地所有，不但與希特拉黨所竭力維繫的大工業資本，有密切聯繫，且與希特拉黨所深深忌憚的國防軍，軍國主義勢力，亦有密切聯繫；由是，

希特拉改革農業，祇有在農村既存的秩序下加一些無關大體的點綴，如整理農村債務哪！如使都市一部分勞動者從事農村勞動哪！那在實際都無補於農村狀況的改善。至其標榜的農業自給主義，更不難證明是一種散佈幻想的企圖。

(四)貿易限制政策 德國對外貿易的總額，在一九三一年爲一六、三二六百萬馬克，一九三二年爲一〇、四〇六百萬馬克，一九三三年爲九、〇七五百萬馬克；至一九三四年，其總額不但更形減少，而在上半年幾個月中，已表現了二一七百萬馬克的入超。工業國而有若是鉅額的入超，這已經大可想見農業自給主義，即農業產品不仰給外國那種企圖的成績。政府爲圖貿易決算上的平衡，乃設定輸入對輸出的比例，限制輸入。在現代國際對立關係下的限制輸入政策，就等於自行限制其輸出，結局，對外總貿易額進一步縮減，國內輸出工業以及一般商工業乃更形困難，國內市場乃更形窄狹。

總上所述，我們知道德國希特拉政府復興經濟的方策，與未標榜社會主義的國家，並沒有兩樣，從而，其所收結果，也大體相同。在希特拉掌握政權的兩年當中，德國生產似略有

起色。德國內外市場萎縮，而其生產居然有所增加，那顯然是由於國家軍用品需要的增大；換言之，就是許多大軍需工業，是靠着國庫支出來維持。國庫除了暗作軍備的支出外，同時還要供應「創造工作」所需的資金，還要償付積累的外債，此外，還得填補鉅額的貿易入超，以及準備那種為非常時期需要而擴增的政治統治的機構。這一切對內對外的龐大支出，使國庫的虧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末尾達到二、一一〇百萬馬克；由是，國家短期債務在一九三二——三年度為二、四一五百萬馬克，至一九三三——四年度乃陡增至四、一五〇百萬馬克。同時，國家銀行的金準備額，則由一九三三年六月之九萬六千八百萬，激減至一九三四年七月之四萬三千五百萬了。

國庫空竭與支出增加的背離險象，除了增課一般大眾賦稅外，計惟有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以圖挽救目前。而馬克價格隨金準備減少而跌落，更足以促成通貨的膨脹。不但此也，大工業資本家在對外貿易衰落與總工資額無法再行削減的情勢下，亦頗希望藉通貨膨脹而增進輸出，以求變相的減少工資，因此，德國目前雖尚維持着「無金」的假金本位，但

其馬克的價格，已頗有跌落。

膨脹政策與增稅政策，通會提高物價；我們如把這事實，與前述保障獨占，及由是引起獨占價格，連帶加以考察，就知道一般中小商業者乃至自由職業者所受的痛苦，實為多方面的。小農業經營者一面受大農業經營的壓迫，同時又受工業品獨占價格的剝削，在金融資本與地主勢力支配下，他們由農產品提高價格所受到的少許利益，又通被傍人榨取去了。這樣，一切中小資產階級與自由職業者，算都陷在極端困頓的境界中了，他們這時就連精神的安慰，亦不容易由統治者口中得到。

以次，再看無產勞動階級的狀況吧！使德國資產階級感到莫大威脅的，是龐大的勞動失業軍的存在。在希特拉取得政權的一九三三年一月，德國由政府方面統計的失業人數，計已達到五百五十餘萬，一年以後，政府統計又說失業人數減半了。我們姑不論這種數字真確到什麼程度，但根據其撲滅失業的方法，至少失業者應該減除不少了。其方法計有六項：

第一、「創造工作」 「創造工作」是我在前面講過的。希特拉政府對於地方或私人修築房屋，改建道路，整修河川諸種工作，分別給以補助金或貸與金。但房屋建造者如要取得政府的補助，勢須其自己使用在房屋建築上的資金（無論是自有的或借入的），爲補助金之四倍，即是說，政府如以五萬萬馬克作爲補助金而支出，結局可以在撲滅失業目的上，收到二十萬萬馬克的效果。這是德國政府不能像美國政府那樣，直接興建大規模工作的窮算盤，但其利益，顯然是屬於有錢建造房屋的人們。

第二、「國內移民」 國內移民是前述四年計畫中的移住政策，其大旨是把那些由農村驅往都市的過剩勞動者，再由都市趕回農村去；希特拉黨曾編定一種計畫，把大都市中一定年齡內之青年，派往農村工作一年，這也許是「使知稼穡之艱難」吧，但迄今尙未見諸實行。至把都市失業業者移充「僱農」（Landheiler）的人數，據「商況研究所」的調查，約有二十五萬人之多。這些人是派往大農業區作工，他們除有飯可吃外，不能由大農業經營者得到一個銅板。

第三、勞動服務 『勞動服務』也是四年計畫中的一個主要項目。大約由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頗不易找到工作，同時也不容易取得失業救濟金，他們在這無可爲生的場合，遂由政府用『勞動服務』的名義，驅往『勞動營』中，一方面從事軍事訓練，一方面則從事造路一類工作，他們也是有飯吃，有衣穿，但沒有工資拿。至一九三四年底，這種勞動人數，約有三十萬之多。

第四、驅逐異類 猶太人是『非我族類』（但祇限於窮苦的小猶太人，而掌握德國金融權衡，乃至擁有大部分大百貨公司的大猶太人，仍在希特拉黨服侍之列，）固當驅逐，即抱有國際思想的份子，亦由驅逐、拘禁、殺戮等方式，翦除不少。這類份子多翦除一個，即失業份子減少一個。其總數是不易統計的，但一定有相當數目。

第五、攤分工作 這就是把已有工作者的工作時間減少，而將其縮減去的工作時間，分攤於失業者。即使以前養活一個人的工資，能養活較多的人。這是一種攤分工作的方式。此外，凡屬丈夫有工作的婦女，通須放棄工作；其主要目的，雖還是就家庭做單位來分攤工

作，但使婦女囚居家內，多有育兒機會，亦在牧民者深思遠慮之中。

第六，縮減失業業者範圍。失業業者數字的龐大，那不獨在失業救濟金的支出上，要成爲政府的重擔，而其在心理上造成的威脅影響，在神經敏銳的統治者看來，亦是大感不安的。所以足智多謀的希特拉政府，首先把家庭僱用工人攆出失業保險之外，此後又把僱農、園丁、船夫也排除了，至其他有政治嫌疑的失業業者，當然不在救濟之列。

希特拉政府曾在取得政權的當時宣言過：失業是最嚴重的問題，爲要解決這個問題，即爲要促進勞動者的利益，一切其他不緊急的政策，都不妨暫時犧牲。這所謂不緊急政策，大約是指着沒收土地與大百貨商店之類，亦即是指着社會主義政策之類。犧牲黨綱，而成就勞動者的利益，勞動者應當感恩不盡，但上面舉述的幾種撲滅失業方法，却幾乎沒有一樣是勞動者所真正希望的。前述中下資產所有者由通貨膨脹與增稅所受到的不利影響，對於勞動者的打擊，尤爲嚴重。政府既以「攤分工作」的名義，縮減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又復以通貨膨脹、增稅，以及獨占價格形成等方式減低其實質工資；在政府及政府所擁護的

資本家方面，避直接低減總工資之名，而收其實，誠爲得計，然勞動階級的苦況，實不堪言喻了。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勞動者每星期之工資平均數，爲二十一馬克六十五分尼，但當時兩夫婦及兩小孩（而希特拉總理還要求每對夫婦要有四個小孩咧！）一星期最低的家庭生活費，却需三十八馬克四十分尼，兩相比較，可見勞動者所過的生活，已遠低於生理的水準（別於文化的水準）許多，何況此後物價還有加無已咧！

從此，我們知道，希特拉黨統治下的勞動階級，無論是失業者抑是在業者，通是在半飢餓的狀況下掙扎，他們合理的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的權利，由前述的「勞動管理官法」及「新勞動法」概行剝奪了。由是，他們的怨憤，他們挺而走險的企圖與活動，連同小農、小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的不滿情緒，早經在希特拉政權及德國獨占資本所由建立的根基之上，造成了動搖不定的險象，德國第二次革命事變，就是在这里預埋下伏線。

二 第二次革命事變

所謂第二次革命事變，即指着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爆發的事變。就「革命」的原意解釋起來，那比希特拉取得政權的第一次革命要有意義多了。

前面曾講過，希特拉政權與布魯甯巴本政權不同之點，就在其一方面擁護獨占資本（兼擁護大地主）利益，一方面却為吸收中小資產階級乃至一部分勞動階級，為其社會基礎，而提出一些反獨占資本（兼反地主）的口號。由是，在大資本家利益與中小資產階級勞動階級利益正相對立的限內，完全站在獨占資本旗下的希特拉政權，就必然要與其所領導的國社黨，即吸收了一大羣反獨占資本分子的國社黨，發生分裂，發生無可調和的衝突。事實上，在希特拉取得政權以後，不就在希特拉還未正式取得政權以前，其黨內早已發生此種破綻。在一九三〇年，被稱為國社黨臺柱的奧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早已洞見希特拉的肺腑，力詆國社黨逐漸變為『一個單純反猶太人的經濟黨』於是憤然脫離，別樹一「黑色戰線」（Schwarze Front）旗幟，從事左傾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至一九三二年秋季，奧托·斯特拉塞之兄格列戈·斯特拉塞（Gregor Strasser）又上書希特

拉，申請辭去黨幹部職務。斯特拉塞兄弟之離去，皆因不滿希特拉日益右傾的行動，然在這時以前，國社黨的下級幹部和黨員，尙未十分察知希特拉之究竟動向。

迨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拉取得政權後，其黨內認真分子，以爲政治革命成功，應當立即實行社會革命，即實現黨綱中之「社會主義」要素。同時，那些在過去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綱領，信以爲真的左傾勞動分子，亦以爲國社黨之政治革命成功，他們的解放機會已到。這兩種分子的活動，在國社黨執政後幾個月中，頗令言論左傾、行動右傾的黨首及其他黨幹部人物感到焦慮。普魯士總理戈林格所宣佈的「保障法治和平」法律，蓋不外對付這些黨內黨外左傾分子；他曾嚴重聲明：「將來凡是應受懲罰的違法行爲，無論犯者何人，均一律追究之。」這就是說，無論犯者爲非黨人抑爲黨人，皆同樣治罪。前述同年七月六日希特拉對聯邦行政長官的演說，亦力言國社黨黨員，尤其是直接參加工廠細胞組織的黨員，干預經濟事項之非。對他這次演說，德國經濟家 (Deutschen Volkswirt) 報，曾在同月十四日加以這樣的引申：

「希特拉總理對聯邦行政長官的演說，已明白肯定的把保證德國人民生活的經濟任務，擺在最重要的地位，聲明不得以任何無理的干涉和實驗來妨害此種任務的實行……特別是在經濟方面，此種黨代表的數量和權限，都不容忽視，至遲須於幾個月內，完全結束。如此，方可爲企業家的創作，造成相當的安靜、清明和自由……」(註一)由此，我們知道，妨害「企業家創作」，從而要求作社會主義經濟「實驗」的，都爲國社黨的黨代表們，但對此點發揮更明白的，是同月十日聯邦內政部長福利克(Frick)所頒佈的法令。該法令指着聯邦行政長官，特別是內政部的屬員們說：「他們的任務，照總理於七月六日所指明的，在於用全力去阻止將來任何團體和黨部冒用政府的職權。蓋因不如此，則國家社會主義的敵人，尤其是共產黨和馬克斯主義者，勢將企圖潛入國社黨，潛入「德意志勞動前線」或其他團體，以便在這些團體保護之下，不斷的擾亂德國經濟，使政府及民族革命遭遇困難。」唯其如此，所以該法令認爲「非法干涉經濟」和「忽視國家權力的規定」，以對「革命怠工論」。

這個法令算完全全是應付黨內左傾分子的。在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消滅以後，有不少左傾分子，混入了希特拉所領導的法西組織之中，那也許是事實。但受國家社會主義口號與綱領之騙，儼然是爲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加入此種組織的激進分子，亦實繁有徒。前述斯特拉塞兄弟不必說，即如國社黨有名的理論家斐得爾（Feder），他就積極「反對利息奴隸制」；農民部長達雷（Darre），他就堅決主張分割大地主的土地。至漠然對社會現狀懷抱不平，對生活感到痛苦，以及爲解決失業問題，而投到國社黨及其支援團體的羣衆，他們多少都可與那些比較左傾的激進分子，表示同情的共鳴。隨着希特拉政府對於獨占資本乃至大地主階級之過分寬容與愛戴，隨着外交政策之着着失敗，特別是隨着一般勞動大衆和中下資產階級痛苦的逐漸加深，黨團外之沉鬱、憎怨與不安的空氣，遂益發與黨團內之不滿現狀和立意變革現狀的傾向，發生對流作用，而醞釀所謂第二次革命活動。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應當知道，希特拉的黨團裏面，同時還包容了各種各色的極右傾

分子、退伍兵士、軍國主義者，以前由中央黨領導的基督教徒，以前由國權黨領導的地主貴族，殆莫不兼容併蓄於希特拉黨和其支援的團體之中。特別是以前作為國權黨之支援團體而存立的極右傾的鋼盔團，那雖在國權黨解散時以整個團體投歸希特拉旗下，但鋼盔團的名義和率領者色爾特（Solt），依舊維持原狀，不過系統上受S. A.總指揮部指揮罷了。希特拉所領導的黨團裏面，既存有這種極右傾的保守的勢力，而左右希特拉，並掌握着國社黨實權的普魯士主席戈林將軍，又因其充滿軍閥思想，反對一切左傾運動，而多方培植這種勢力。由是，在國社黨裏面，就隱然有這左右兩派勢力的對立。

自然，在國社黨內部發生分裂現象的當中，代表地主貴族勢力的巴本，代表金融資本勢力的沙哈特，斯密特，以及被希特拉尊稱為「經濟領袖」的大工業資本家克虜伯，第森，斐格爾等，都不期然而然的極力扶植黨內右傾勢力；以前他們利用希特拉黨剷除激進的左傾的勢力，現在他們又利用希特拉黨內的右傾勢力，來制服其左傾勢力了。加以這時與他們打成一片的，還有國防軍哩！國防軍與地主貴族的淵源，由奧登堡總統對於大地主與

國防軍的密切關係，可以體驗出來。S. A. 中的激進分子，往往倡言要改編國防軍，或把他們自己改爲國防軍，那已經使國防軍的尊嚴與威勢，受到莫大的挫損；至他們在街上在公共場所所表現的橫行無忌的態度，就連警察亦感到頭痛，國防軍自更不待言了。——這類舉動，雖應歸罪於整個國社黨，但其中比較有知識修養的右傾勢力，却很自然的把一切開罪社會的過失，都寫在不安本分的左翼分子的賬上了。

從上述的陣勢看來，有槍桿且有金錢屏障的右翼勢力，顯然大大的佔着優勢。不過在衝突開始時，左翼運動總表現着幾分猛烈勢頭。一九三四年初，社會上正流佈着國防軍企圖解散 S. A. 的謠言，同時，與國防軍站在同一立場的鋼盔團，又竊竊私議政府縱容 S. A. 的過失；S. A. 中的青年派左傾派，已經在不滿意政府不能實行黨的綱領，他們對於這種求全之毀，當然不免異常激怒，而首先把鋼盔團作爲其發洩憤恨的對象。由是 S. A. 與鋼盔團時常發生衝突，延至三月，這在 S. A. 系統上保持着獨立名義的鋼盔團，乃被迫取消此名義，改稱爲「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戰士同盟」(N. S. D. Frontkämpferbund)。但此兩種勢力

的衝突，不但不以名義的改易而緩和，却反因名義的改易而加厲。在同年六月間，鋼盔團之集會被禁止，以後且有『希特拉青年團』搗毀鋼盔團團長即勞動部長色爾特之事故發生。但鋼盔團與S. A.的衝突，還不過表示左右兩翼鬥爭表面化的端緒，實際在此兩派鬥爭演化的過程當中，醞釀第二次革命的左傾運動，已經在暗中達到了非常激昂的程度。所以在六月下旬，代表右傾勢力的普魯士總理戈林格及黨代表赫斯（Hase）在演說中，已經露出『第二次革命』字樣，他們並鄭重警告的說，在領袖希特拉未決定以前，大家不許亂談『第二次革命』。（註二）可見第二次革命的醞釀，在當時已成爲黨內非常普遍的事實。問題好像還要待領袖的決定。

由於戈林格的慫恿，以及國防軍的槍桿和『經濟領袖』們之金錢的『威』與『利』的作用，希特拉最後乃決定採取巴本的獻議，對S. A.的左傾運動或第二次革命運動加以制裁。這是所謂『六卅事變』的背景。至此次事變的經過，據宣傳部長戈柏爾在無線電中的報告，是下面這樣：六月二十九日，希特拉正在萊因區域之戈得斯堡（Godesberg）參

觀勞動服役的時候，柏林敏亨之間，陸續傳到緊急消息。希特拉知事不可緩，乃帶同戈柏爾及親信數人，乘飛機飛向敏亨。這時已是三十日侵晨的三四點鐘。敏亨的 S. A. 已經被謀叛的領袖召集在街上，他們用的口號是：『領袖現在反對我們，國防軍也反對我們，S. A. 衝上前去。』巴陽邦內務部長瓦格格因反對此種運動，乃立刻將領導此次叛變的 S. A. 領袖即集團長（Obergruppenführer）斯萊胡柏爾（Schneidhuber）與羣團長（Gruppenführer）斯米德（W. Schmid）免職，並遣散 S. A. 羣衆。這時希特拉正親自趕到，在盛怒之下，將爲首者的肩布扯去，嚴加訓斥，並予以拘捕。他隨即乘汽車到 S. A. 全國領袖羅姆（Röhm）所在的魏塞（Weise），當在羅姆住宅中將其逮捕，立即又乘汽車轉到敏亨，拘拿那些正在敏亨開會的（由羅姆所召集）S. A. 的上級領袖。羅姆及這些參與密謀的領袖，統被槍決。在柏林方面，希氏則命普魯士總理戈林格對於參與密謀的人，迅速逮捕處分，由戈林格逮捕殺戮的『叛黨』，始終沒有宣布，官方所宣布的，只是前總理施萊輒與羅姆串通謀叛，因拒捕被擊身死。（註三）此外，巴本亦曾暫時被捕，但不久即予釋放。至 S. A. 全體被殺的人數，傳說

不一，有的說兩百餘，有的說七百餘，而據官方公開的報告，則領袖人物除羅姆外，還有兩個集團長，四個羣團長，一個旗團長，及隊員七十人。

我們姑承認事實的經過，都是如此。就叛逆分子的口號「領袖現在反對我們，國防軍也反對我們」說，就戈林格前此演講的「在領袖未決定之前，大家不許亂談第二次革命」說，這次事變的形成，當然是由於希特拉政府的右傾舉動，即幫同獨占資本、大地主貴族壓迫一般勞動大眾的法西主義政策，不能滿足其黨內青年左傾分子的要求。希特拉這次對於其十餘年來之患難同志的殘忍處置，蓋已逆知自己不能領導第二次革命，即不免成爲第二次革命的對象。至於六月三十日事變，究竟是S. A. 先在敏亨發動，抑是希特拉與戈林格商同分途在德意志南部北部先發制人，那迄今還爲一部分人推測的疑問，不過在整個問題中，誰先發動誰後發動是無大關重要的。

經過這次事變，希特拉政權至少會發生以次幾種變化：

第一，希特拉過去賴以奪取政權維繫政權的武力，是S. A. (S. S. 當然也有不少力量)，

而此後則是國防軍。所以他在事變後的七月一日，即命令 S. A. 全體休假，在休假中，任意予以改組（即剷除其中有左傾嫌疑的分子）與縮編，且以十二條訓令致 S. A. 新總指揮洛澤（Lutze），聲言 S. A. 對國防軍須採取絕對公開與忠誠的態度。

第二，左傾分子都被屠殺清除結果，希特拉以後將不復有任何顧忌，而一心一意的忠於獨占資本之利益；而其不時尚當着勞動大眾背誦的『社會主義』綱領，此後也許不會常常提及。因為他既自行向『經濟領袖』們及國防軍繳械，當然非處處遵循其意旨行事不可了。

第三，國社黨在本質上，雖是應獨占資本需要而產生，但德國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特殊情況，却在其黨綱內注入了一些浪漫的『社會主義』的要素，從而在黨內吸入了不少的浪漫社會主義信徒。這類信徒的攙入，使國社黨頻添了許多動力與活氣，連帶着，國社黨的政權，也像在世界成爲格外引人注意甚至驚羨的目標。然而在『六卅事變』以後，這一切都消失了；國社黨現在是一個抽去了靈魂的軀殼。

因此，在撲滅第二次革命的過程中，希特拉是勝利了，但真正的勝利者還是『經濟領袖』們和國防軍，而希特拉自己則在國人及世人面前完全暴露了他兇殘與卑怯的本體。

三 一黨領袖 · 一國領袖

希特拉慘殺同志的消息，傳諸國外後，各國輿論對於希特拉痛加非難，由是，德國有一個時候，曾禁止大部分或全部的外國報紙入口。但希特拉不論如何掩飾，其衆叛親離的事實，終不免要大大減殺其在國內與國際方面的威信。爲圖補救此種缺陷，他於是企圖在國外成就一件恢復並增加其威信的事體；奧國希特拉黨徒之戕殺陶爾斐斯，那多少與希特拉這種動機不無關係。然而，如我在前面所講過的，這件事的最後結果，不過是把他那已經墜落的威信，進一步促成其掃地而已。

陶爾斐斯的戕殺，係在七月二十五日，此後一週，即八月二日，與登堡大總統忽然與世長辭。希特拉在此國內國外沉悶局面無法打開的當中，這恰好是一個大做文章的機會。因

爲與登堡死後，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後任大總統問題。這時希特拉雖自認大總統「舍我其誰」，但他究有幾種顧慮：（一）大總統是根據「韋瑪憲法」產生的，由猶太人編制的這種憲法，希特拉屢思予以破壞，現在自己又據此取得總統地位，殊未免遭人物議；（二）大總統至少應備有年高望重的條件；小兵的希特拉，決不能像大元帥與登堡那樣受人擁戴，況剛在國內國外兩件不名譽的兇殺事件之後，希特拉縱令有煽動宣傳的本領，究不能斷定人民會一致投票擁護；加之（三）人民卽令一致擁護，因而取得總統的地位，但其握有實權的內閣總理一職，却非讓給別人不可。在這幾種考慮之下，他終於還是貫徹其領袖制的主張；一方面謙恭盛德的表示大總統地位崇隆，非有德者不配充任，一方面却又力言國家不能不有一最高領袖。言外蓋表示他不配當大總統，但不妨作最高領袖。這種掩耳盜鈴的方術，原是希特拉的拿手好戲。不過以內閣總理兼充最高領袖，是沒有法律根據的，爲補救這個缺陷，他又應用以前曾經爲測驗民衆對於國社黨政策是否贊成而應用過一次的國民公決方法，由國民公選。但選舉領袖與選舉大總統不同之點，就是領袖的候

補者，祇有他一個，贊成他的，就投贊成票，不贊成他的就投否決票。投票期決定在八月十九日。

在預備投票的一個星期中，希特拉系的報紙（事實上幾無一種反對派的報紙存在），都著論力言德國國勢如何陵夷，如何需要有魄力有手腕的領袖；希特拉總理如何勤勞爲國，如何怕因家事牽累國事，而苦守獨身；此外更從反對方面嚴防投否決票的活動，並以驅逐懲罰等等恫嚇方法，預先警告投否決票的分子。不但此也，在投票舉行前三日，即八月十六日，全國各報忽然刊出了奧登堡總統的遺囑，這遺囑最後一段是說：「予對於以至誠援助德國復興之人士，深致感謝。總理希特拉，使德國各階級人民捐除嫌怨，歸於統一，其功績足以昭垂史冊。但德國前途，急待整理者，其事尚多；予竭誠希望德國於統一及復興之後能有一日使德國全體人民，均能和衷共濟，共謀國家。予一九一九年希望之事，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按即希特拉出任內閣總理之日），逐漸成熟。予今希望此後仍能繼續完成，俾德國民族，能完全盡其歷史上所負之使命，果能如是，則予雖死，當亦含笑九泉。」這段遺

囑係出於希特拉黨之矯造，德國國內乃至其隣國有識人士，殆皆認為毫無疑義。但人門不注意其矯造民意，却祇譏嘲其矯造遺囑，殊未免輕重倒置。

就在發表此遺囑的前後，柏林（全國各地大概一樣，不過作者只在柏林躬逢其盛）各車站，各大街頭，各公共場所，皆懸有惹人注意的大標語，上書：「一個意志！一個民族！一個領袖！」而挨戶舖店門口，則貼有希特拉的兩尺多高的雄姿英發的印像，其旁邊則很技術的寫着「我們追隨你！我們都說「是」」的字樣。至希特拉前此與兩個權權工人合攝的照片，這時也到處懸掛着。一切都安排好了；雄赳赳的S. A., S. S., 乃至御用警察所把守的投票機關，乃開始讓市民誠惶誠恐的進去表示對於希特拉總理可否兼攝領袖的意見。這是十九日的事。

據二十日的報告，德國人民以絕大多數贊成希特拉兼任總理及領袖兩職，為德國元首。總投票數為四三、五二九、七〇一票，其中贊成者為三八、三六二、七六〇票，反對者為四、二九四、六五四票，棄權者為八七二、二九六票。希特拉當然是大大勝利了。但

却也有美中不足之點，就是反對票居然佔總投票數百分之十，而且這次投反對票的人數，還較上一次爲多；不但如此，投反對票的居民，大都爲柏林漢堡兩大工業區域的居民。工人階級的這種執拗性，當然使這位新領袖在舉觴自祝的當中，多少感到幾分不快。

但無論如何，他畢竟是勝利了。

希特拉黨之宣傳部長戈柏爾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之大柏林地方部務會議席上說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其自體就是國家。爲國家爭取生存的這種運動，同時還可占有國家的權利……國家社會主義與德意志國家，是對於一個概念的兩種說法。」這段發生邏輯問題之議論的必然邏輯，就是要把國社黨擴充爲德意志黨，把國社黨領袖，提升爲德意志領袖。現在他們是如願以償了。依興登堡之存在而維持住的共和體制的殘壘，至是算完全崩落。同時，這已經變爲一國領袖的希特拉，國社黨在他已不是怎樣重要，也許可說，這正是黨國融合爲一之理想的實現。

然而這所謂國，是「資本主義王國」哩！

(註一) 見瓦加爾著：德國法西主義的真面目，參照時事類編第一卷第十期譯文。

(註二) 見黃立維著：德國最近政潮的因果（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八號）。

(註三) 同上。

第十章 第三帝國之前途

一 薩爾收回後之外交動向

由希特拉取得政權的一九三三年一月，到薩爾 (Saar) 收回之一九三五年一月，恰爲兩個整年。在希特拉政權存續的這兩個整年當中，足爲第三帝國 (Der Dritte Reich) 外交史上特書一筆的，還祇有薩爾收回這件事體。

然據報紙所載，當薩爾已由公民投票歸屬德國之頃，德國政府中人雖狂歡大喜，從種種方面作外交勝利之空前盛大的慶祝，但一般市民却並不甚起勁。因爲在他們看來，薩爾是於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期間票決，而投票的公民，又有百分之九十幾爲德國人，故薩爾之歸德，當爲事勢之必然。然吾人試將薩爾歸德之全般經過情形，略加考察，則知事實殊不如此簡單；而各國報紙所推測之德國人民心理，亦不一定十分正確，因爲我們與其謂德國

人民對於薩爾歸還之漠不關懷，毋寧謂其對於政府之任何舉措，皆缺少興趣。

現在姑先概述薩爾問題之癥結，然後再看薩爾復歸德國後，對於德國外交動向上，能發生何種決定的影響。

薩爾是德國毗連法境的煤礦區。薩爾與魯爾之煤，與亞爾薩斯·洛林之鐵，是德國重工業的兩大營養素。德國在戰前得加速跨上獨占資本主義的程途，主要可說是受了這些地方的煤鐵之賜。在凡爾賽和約締結的當時，法國爲要重懲德國，並佔有德國的煤鐵區域，所以於索回其由普法戰爭割去的亞爾薩斯·洛林外，同時還想染指於魯爾、薩爾，這也許是由於鐵與煤的關係過於密切吧！但收回亞爾薩斯·洛林，是理直氣壯，若索取魯爾、薩爾，却未免招人物議，於是牠藉口德國在戰時破壞了牠北部的鑛區，要求將薩爾全鑛區劃歸其採掘，以資賠償。至薩爾之土地人民，則置諸一種特別制度之下，即由國際聯盟組織行政委員會管理之。不過法國之貨幣制度關稅制度，均得施行於薩爾。這樣，薩爾在政治上雖由國聯負責，在經濟上由法國負責；但因國聯是受法國所支配，故薩爾實無異完全爲法國所

宰制。不過，凡爾賽和約對於薩爾有以次之規定：即自條約實行之日起，至十五年後，由薩爾居民投票，以決定其最後所屬主權，看是維持現狀（即由國聯法國分負政治經濟責任？）是歸併法國？抑是返還德國？

在兩年以前，布魯甯內閣曾要求薩爾提前返還德國，此後以反凡爾賽體系相號召的希特拉政府，亦會重申前請，但均遭拒絕。希特拉政府自去歲第二次革命及對奧外交失敗後，其國內國外的威信，一落千丈。為挽回其威信，並穩定其統治計，希特拉及其黨徒乃以全力應付這將屆票決期間的薩爾問題；事實上，希特拉政府之能否撐持，就要看薩爾之能否返還。這種重大關鍵，不但國際有識人士如此揣度，即希特拉黨亦不能不有此警覺。

照理，薩爾居民既有百分之九十幾為德國人，祇要法國及國聯不違反到期票決之規定，薩爾之歸還德國，應無問題。但希特拉黨很知道，在法國統治下十五年的薩爾居民，對於愛護祖國究有如何的熱情，殊無把握，況他們自己統治德國兩年所給予薩爾居民之反感，尤足以大大減低那種熱情咧！就職業上講，工業區薩爾的八十餘萬居民中，勞動者佔有一

大部分；就信仰上講，加特力教徒幾乎佔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勞動階級與加特力教徒對於德國希特拉政權，是抱有極大惡感的。此外，如猶太人，如社會主義者，固不必說，就是那些中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因為不在希特拉勢力統治之下，比較能够洞悉國內的真實情況，他們雖願意復歸祖國，但却非常不滿意希特拉的政權。加之，薩爾一旦返還德國，即無異割斷了薩爾煤礦與亞爾薩斯·洛林鐵礦之聯繫。德國國內由產業衰沉所加於一般勞動大眾之失業與增稅的壓迫，當然不免要施之於薩爾（當時薩爾雖亦有不少失業者，但與德國全國較量起來，其比率要算最小）在這種種顧慮之下，薩爾之德籍居民縱不投票合併法國，却頗有贊成維持現狀之可能。

希特拉黨也許能自知其統治所生的惡果。所以自去年冬季決定投票日期後，一方面儘管告誡其黨徒力持鎮靜，藉以緩和法國及國際間的空氣，一方面却另編組一種所謂「德意志前線隊」，在薩爾作種種利誘威嚇的活動。對於加特力教徒，他們運動本國的加特力教會長老，勸其毋訴之於宗教感情，而訴之於愛國良心，且允許薩爾歸德後，對於當地

加特力教徒不加迫害；至對於工人，對於社會主義者，對於猶太人，他們都分別施以煽動誘惑與離間的方法，結局，他們這些方法奏效了。投票於本年一月十三日開始，十四日完畢，十五日由投票委員會報告的結果，是在發出票數五二八、〇〇五張中，贊成歸還德國者，有四七七、一一九票，約當總票數的百分之九〇・〇八；贊成維持現狀者，有四六、五一三票，約當總票數百分之八・八七，贊成歸併法國者有二、一二四票，約當總票數百分之〇・〇四。其餘廢票佔二、二四九張。

投票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贊成歸還德國，在某種意義上，不能不說是希特拉黨活動的成果（其實以德國人投票返還德國，而尙待運動，這已足證其統治之失敗。）例如在十三日投票之頃，法國巴黎時報記者有這樣一段記事：「德意志前線隊」至公民投票最後時期，猶作猛烈之攻擊及宣傳，到處分發傳單，預期國社黨之勝利……火車經過處，沿途多張貼佈告，辱罵法國，並指斥維持現狀派爲叛徒。」又云：「十三日之投票，選民係在壓迫下舉行，而此等壓迫，則全係「德意志前線隊」之所施。」

不過，我們在此應發生一種疑問：『德意志前線隊』在薩爾既頻作種種違反投票規定活動，其對法國何以不加干涉呢？實際上，法國如其抱着一九二三年佔領德國魯爾時的強橫態度，利用其在薩爾統治十五年的經驗，用各種手段阻制當地居民投票返還德國，同時並嚴厲禁止希特拉黨之一切活動，則薩爾究將誰屬，殊難說定。那一來，至少總會弄到維持現狀的結果罷！由是，我們就說薩爾之返還德國，主要是由於法國採行寬容政策，或者說，法國已有讓薩爾返還德國之用意，亦不為過。然則法國為何採取此種態度呢？在解答這個問題當中，我們不但會徵知歐洲各國之鈎心鬥角情形，同時還可明瞭德國今後之外交動向。

法國肯對薩爾問題讓步，計有以次四種原因：

(一) 法國之由德割取薩爾，其動機與理由，實已不能為世界所共諒。若復以種種強制手段，使薩爾保持現狀，則德法之仇，將愈結愈深，而此後薩爾居民間，毗連薩爾之德法邊界間，將不斷發生不祥事件，致薩爾地方之秩序與和平，陷於不易維持。

(一)薩爾之煤產額，在一九三四年度，計已增至一、一三〇萬噸。薩爾歸還德國後，法國雖不免喪失一個重要財源，但根據去年十二月三日之羅馬協定，德國應支付法國九萬萬佛郎，以收買法國在薩爾投下之資金，這巨額的款項，在金融枯竭的德國，固為一大重壓，而在法國方面，却大可藉此以資周轉，並益增大其對德之金融優勢；況德國除此九萬萬佛郎以外，在五年之內，還須為法德毗連之伐恩脫礦的採掘，每年應付法國二百餘萬噸煤斤哩！

(二)法國對於薩爾不歸還德國的結果，固已預料到，但薩爾歸還會增加德國希特拉黨勢，而益促使其向外發展的趨勢，法國亦已預料到。法國在過去半年中，曾努力從事包圍德國之外交活動，去年九月之蘇俄加入國聯，俄法兩國之日益接近，東歐羅加諾保安公約之進行，在在皆係法國包圍外交之策動；至薩爾投票前數日簽訂之法意協定，其第二部分居然對德國企圖吞併之奧國，作以次規定：「法意共同建議，凡奧國各隣邦及奧國應相互訂結不干涉不侵略協定，法國、波蘭、羅馬尼亞亦得加入該協定，俾奧國土地完整遭遇威脅時，各國得與奧國舉行磋商，此種磋商辦法，以後得擴充至其他各國，以期獲得其協助。」

法國既如此步步爲營的對德設定了包圍陣勢，故在薩爾問題上，不妨表示一點紳士的寬容態度。——然而這裏還有一個促成其採取此種態度的原因在。

(四)抱持均勢主義外交傳統的英國，在戰後對德的態度，往往總表現幾分寬容。這除了抑制法國勢力過於擴張外，同時還係阻止德國逸出資本主義的軌道。薩爾如不返還德國，在英國眼光中會看出幾種嚴重結果：第一是德法愈形交惡，愈會促成法俄的親近，而使反俄戰線陷於一大混亂；其次是法國已有小協約諸國的支援，若更取得俄國的極力幫助，和意大利的相當諒解，勢將增益其在歐洲的威勢；最後第三是萬一希特拉政府因薩爾問題失敗而瓦解，德國也許不易再建立一個防衛左傾運動擡頭的有效勢力。無論那一個結果產生，英國都認爲極其不利，從而，牠對於薩爾問題極力主張妥協。在某些方面還須利用英國牽制德意的法國，自然不能不相當尊重英國意旨。

在這種種原因的錯綜作用之下，法國遂對於薩爾問題讓步，而希特拉黨乃得慶其收回薩爾運動的成功了。

希特拉黨經過此種成功運動以後，其國內及國際間之威信，自然會相當恢復過來，因而益增加其對外掙扎的勇氣。特在當前國際局面之下，即在法國已經對德施行封鎖包圍的外交策略之下，德國要想進一步發揮其擴張領土的野心，首先就要具有擴張領土的實力。換言之，就是牠在薩爾收回後的對外奮鬥，不在馬上進行合併奧國，及收回波蘭走廊，而在力求對列強的軍備平等。

而事實却也正是順着這個途徑而展開哩！

二 第二次大戰與第三次革命

德國自一九三三年十月退脫國際聯盟及軍縮會議以後，其對凡爾賽和約所加於德國之軍事束縛，雖未明目張膽宣布撤廢，但德國國內整軍經武活動，已遠超過和約所允許之限度，蓋早為各國所公認之事實。由是，在大戰中受過德國軍事教訓的協約各國，乃用三種方式來防範德國此種活動。第一是增強自己軍事設備，第二是鞏固對德防衛戰線，第三

是擁護凡爾賽和約。牠們的用意（法國尤屬如此）蓋以為德國縱不完全遵守和約，只要前面兩層做到，亦屬有備無患。在最近兩年中，德國儘管在暗中從事軍擴活動，法國則明目張膽充實兵器，建築工事，增建戰艦，且於薩爾問題解決之頃，通過二年兵役制；此外，更在德國四周建立起保安陣線。前述法意協定於一月七日成立後，同月三十一日，法國總理佛蘭亭及外交部長拉伐爾即偕赴倫敦，與英國首相麥克唐納及外相西門交換種種意見。至二月三日，法總統即以無線電播送兩國之公共宣言，其中有云：「……最近在羅馬簽訂之法意協定宣言，法意兩國政府擬發展兩國傳統之睦誼；對於此項宣言，英國閣員今代表英國政府表示誠信之接受。……英國政府認為羅馬協定規定遇奧國獨立及完整遭威脅時，多數國家應互相諮詢。英國亦當在此多數諮詢國家之內。英法閣員希望由羅馬協定所得之滿意進步，得因德國之直接有效合作，而繼續不輟。為此，英法兩國同意向德國聲明，無論任何國家，其軍備已由條約規定者，決無以單方面行動變更是項義務之權利，但以爲欲謀恢復國際信任，增強和平希望，則最善之策，莫過於由德國及其他列強間，舉行自由談判，以使

軍備問題獲得普遍之解決。惟此種解決辦法，同時必須顧及安全問題，因此有關係各國間，必須以自由談判之方式，訂立在東歐方面相互協助之公約。……同時德國軍備問題，則當依照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英法意列強宣言中之規定以解決之。此項宣言，承認在安全制度中，德國得享軍備權利之平等。其解決之方法，乃在擬定一般的軍備措置，以代替凡爾賽和約第五部分限制德國軍備及軍額之條款。此種解決方法有一要素，即德國須重新出席國聯會並積極合作是也。……更有進者，英法閣員舉行談話時，認為軌近航空事業之發展，對於和平前途甚多危險，……為擔保不發生此種危險計，英法閣員曾審議，是否可由若干國家以相互之基礎，成立一種區域協定，由簽約國相約，遇其中有一國突遭天空襲擊時，應立即調遣各該國空軍，以援助該被侵略國之空軍。……」

這個宣言，很可解作英法共同對德宣言。為法國所企圖實現的東歐保安協定，為英國所渴望成立的防空區域協定，在表面上，牠們雖然都期望德國及其他國家參加，而實際則均係想藉此防衛德國。至英國加入擔負法意對於奧國領土及獨立主權之保障，尤為針對

德國而言。此外，「英法兩國同意向德國聲明，無論任何國家，其軍備已由條約規定者，決無以單方面變更是項義務之權利。」此種論調，蓋明白警告德國，使對軍備問題，毋遽作破壞和約之軌外行動。

但英法兩國亦知德國對於軍備平等要求，異常積極，於是隱示「限制德國軍備及軍額」之凡爾賽和約第五部分，不妨取消，但「德國須重新出席國聯會，並積極合作。」因而「謀軍備之一般措置。」換言之，就是英法企圖以一種限制德國軍備的新約，代替此舊約。德國亦頗知道此種圈套，乃於二月十五日之復文中，於接受締結防空協定外，僅聲言贊成軍備問題之澈底解決，至關於重返國聯及締結東歐互助公約事，則一筆不提。此種態度，在法國雖感到非常不滿，但英國猶希望德國能勉強就範。英國西門外相擬於三月間訪德之舉，蓋不外抱有此種決心也。

在西門赴德之前，英國政府忽發表一白皮書（即關於國防之宣言），其中對陸軍預算，較上屆增加四百萬鎊，員額則增加二千數百名。據英國政界人士聲稱，英政府此種宣言

在西門赴德前發表，蓋不啻予德以警告，使知英國努力國際和解事業，並非對德國重整軍備表示退縮。但英國這種先發制人之陳舊外交戰略，不但未收到預期效果，却反而促成德國之脫軌行動。德國希特拉政府利用英國白皮書在國內引起之不滿情緒，一方面稱病請西門展緩赴德行期，一方面則預備自動撤廢凡爾賽和約之對德軍備限制。

同月十二日，德國已公然不顧和約中（第五部分）禁止其空軍復活之條款，聲言自四月一日起，整備航空部隊，分全國為五個空軍司令區，並分別設置海軍航空隊。然此尚是一個初步試探工作。至十六日下午，希特拉政府突然正式宣言撤廢凡爾賽和約之軍備條款，同時並發表重整軍備與復行徵兵制的意旨。此外，德國且以國軍擴充至五十萬之計畫，通知英國。

這種爆發宣言發表後，全歐當感受一大震動；但因德國之重整軍備，早為公認事實，而和約之軍事條款廢棄，又只係時間與手續問題，故英法等國在接到此項宣言時，雖不免感到異常周章狼狽，但彼此都未打算採行任何有效之制裁舉動。英國之緊急閣議，英意之折

衝，英法意三國會商之決定，誠然都在講求對德方策，但其最後結果，恐不外在某種條件下，承認德國撤廢和約之軍事條款為既成事實。而這所謂某種條件，大概不外（一）德國重返國聯，（二）對奧之安全保障，以及（三）德國加入東歐羅加諾條約一類之保安公約。

照目前情勢而論，法國似頗激昂，牠不但忿恨德國之越軌行動，同時且大不滿意英國之妥協態度。英國外相西門聲言對德一本友好方針，並提議德國參加英法意三國協商之舉，已使法國對英發生疑慮。但法國要對德施行某種限制或取得某種交換條件，却又不能不與英國採取一致步驟。

至於英國，牠的歐洲外交政策，一向在聯法以制德，聯德以制法，此外，並合同法德諸國以包圍蘇俄。即在阻制德國或法國之勢力膨脹的目的上，牠利用其矛盾，在包圍蘇俄的目的上，則又化除其矛盾。目前法國既不能離開英國而單獨對德作制裁的活動，同時德國又知道非聯絡或遷就英國，究不易打開包圍的難局，於是英國乃居於舉足輕重地位，而益能發揮其外交指導原理。

在英國外交指導原理活動下，德國一定非暫時放棄其合併奧國企圖，重返國聯，並參組於某種新保安公約不行。這一來，德國擴張軍備的目標，就不期然而然的要東向求得發展；德國果能暫時放棄合併奧國，和收回亞爾薩斯·洛林野心，則法國必會減少其聯俄要求，從而，英國所企圖造成的反俄陣線，就大可實現了。英國西門外相在嘗過長揖見拒的滋味以後，最近仍擬訪德磋商，蓋不外存有這種願望。

在領土割裂，殖民地喪失，以致人口過剩的德國，只要讓牠具有擴張領土的武器，牠一定是肯『負弩前驅』的。就德國目前的趨勢，以及環繞牠的國際情形言，牠確有成爲征俄先鋒之可能；在不久希特拉與西門的商談中，希特拉定然會對此自告奮勇，西門也定然會暗示『第三帝國』此後發展的途徑。『讓一個征討資本主義敵人的勢力武裝起來，有何不可哩！』西門先生在如此划算着。但這勢力被武裝起來了之後，究竟是作征俄先鋒呢？抑是在資本主義陣營內自相火併呢？這却尙待事勢的推移啊！

總之，德國撤廢和約，戮力整軍經武，那已成爲無可挽回的事態；德國如備有相當軍備，

即會發動對外戰爭（無論是對俄抑是對法或其他國家）那亦是德國國勢國情上所無可避免的必然要求。至民窮財匱的德國，在大規模軍備擴張上，無疑要加重一般勞動大眾的壓迫與榨取，從而，要招致無產勞動者更強烈的反抗。然有日益增大的國防軍或國家武力作防衛的希特拉政府，在戰爭未發動以前，牠是不難從容應付國內任何暴亂的。不過，財政的竭蹶和人民的窮困與騷動，勢將加速促成希特拉政府從事冒險戰爭。戰爭無論以那種方式爆發起來，要使受過四年大戰痛苦，及具有戰後諸般革命經驗的德國人民，還像前次大戰那樣再接再厲的爲祖國，爲希特拉所擁護的「資本主義王國」而戰，恐怕不容易做到吧。況且現在德國人民之窮困狀態，亦實在不能忍耐戰爭的大破壞大犧牲哩。

因此，關於「第三帝國」的前途，我們不妨作這樣的推論：就是，世界大戰，遲早總會爆發，但重新武裝起來了的德國，却又會在這次戰爭中立於主要發動者的地位；戰爭一旦發動起來，全部或一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的命運，將由此得到最後決定，但構成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之最弱一環的德國，又將首先結束其歷史。所以，凡爾賽條約的撤廢哪，海陸空軍的

重新整備哪，都可以說是安置第二次大戰的基石，同時亦可以說是掀種第三次革命的種子哩！

主要參考書

- 1' Gooch G. P: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928)
- 1' Schmitt B. E: England and Germany, 1740—1914 (1916)
- 1' Moulton H. G: The Reparation Plan (1924)
- 1' Brandenburg: From Bismarck to the World War——A History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0—1914 (1927)
- 1' Smith T. E. A: What Germany Thinks? (1915)
- 1' Hitler: Mein Kampf (1927)
- 1' Derselha: Was Will Adolf Hitler? (1931)
- 1' Sombart: Deutscher Sozialismus (1934)

一、有澤廣己著：世界恐慌與國際政治危機

阿部勇

一、平田富太郎著：希特拉運動史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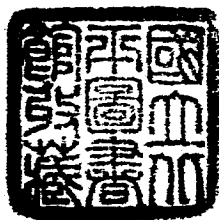
一、四宮恭二著：納粹斯

一、何炳松編：近世歐洲史

一、王亞南著：現代外交與國際關係

一、加田哲二著：德國社會經濟史

德國之過去現在與將來終



德國志略

鄭壽麟著

一冊 一元五角

本書係就德國之史地等作一系統的研究，凡史地，人口，交通，物產，政治，軍事，語言，教育，文學，宗教，禮俗，國民特性等，靡不詳述。插圖都四十五幅，圖說淺顯，易於參閱。讀本書後，對於德意志的過去及將來，可得一深切的認識。

常乃惠編 一冊 五角五分

德國發達簡史

本書敘述自日耳曼蠻族徙徙時代起，中經查理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以及中古封建時代德意志之政治經濟情形；對於近代史方面，尤為詳晰；舉凡宗教改革，建國運動，以及建國後之發展及歐戰時之情形，均詳舉無遺，直敘至最近德奧關稅協定止。全書注重近代德意志建國前後之情形，但對於古代德國史跡，亦有論及。洵為研究德國自建國時代起，中經無數波折，以迄稱雄歐陸之最系統而淺顯明瞭之書也。

中華書局出版

羅馬興亡史

王文彝譯著 一冊八角

本書共分三編，每編復分爲四章：第一編爲傳疑時代的羅馬，詳述羅馬之祖、住地、社會組織、宗教觀念，以及王政時期之大事；第二編爲共和時代的羅馬，歷述羅馬人之生存競爭，進而爲意大利半島之征服，復由意大利征服，更擴張其武力於歐、亞、非三洲之經過；最後，又從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各方面，分析其在共和末期內闕之原因與結果，詳加推究；第三編爲帝國時代的羅馬，將奧古斯都以來之帝國政治，作一概括的敘述，並將帝國衰亡之內因外力，詳加分析。末附羅馬人之遺惠一篇，所有羅馬人民對於政治、法律各方面之造詣，盡情表露。

俄國史

〔中華百科叢書之一〕

婁壯行編 一冊六角

本書自羅曼諾夫皇朝以前的俄羅斯起，至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實施止。計分十二章：第一章至第三章，敘述帝俄時代的事業；第四章敘述俄國社會革命黨及社會民主黨的組織、政策和特狀；第五、六兩章，敘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及反動政治的復活；第七章敘述世界大戰時的俄羅斯；第八章以後，分述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的經過及革命後各方面的建設。書中對於俄國革命的背景、經過、蘇聯的成立及各種建設，特別注意，敘述詳盡，尤爲特色。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發行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五九三號

國際書
德國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全一冊)

◎ 定價銀六角五分



編者 王 漁 村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 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管世楷 柳野青) (九六六八)

標商冊註



中華民國

24

八日收到